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歐茵西 博士

俄國知識份子的崛起與沒落



碩士班研究生：涂苑容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目錄

內容	頁數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2
一、研究途徑.....	2
(一) 新歷史主義.....	3
二、研究方法.....	6
(一) 文獻分析法.....	6
(二) 文本分析法.....	6
第三節 研究限制.....	7
一、知識份子之定義與指涉.....	7
二、知識份子的取樣.....	7
三、關於蘇聯共產黨的正式名稱.....	8
四、章節配置.....	9
五、文學／文化術語之差異.....	10
第貳章 十八世紀：知識份子的崛起.....	11
第一節 十八世紀俄國文化與社會.....	11
一、彼得大帝的西化政策.....	11
(一) 行政改革.....	12
(二) 教育與文化政策.....	12
二、凱薩琳女皇的教育與文化政策.....	14
第二節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定義與特質.....	17
第三節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先驅者.....	24
一、凱薩琳二世時期.....	24
(一) 諾維科夫.....	24
(二) 拉迪史契夫.....	25
二、亞歷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一世時期：十二月黨人.....	27

第參章 十九世紀：知識份子的演變.....	31
第一節 十九世紀俄國文化與社會.....	31
一、十二月黨人的影響.....	31
二、知識份子的搖籃：史坦凱維奇小組.....	33
三、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	35
第二節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世代.....	40
一、第一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斯拉夫派與西歐派.....	40
(一) 斯拉夫派.....	41
1. 斯拉夫派的中心思想.....	41
2. 代表人物.....	43
(1) 赫梅科夫.....	43
(2) 康·阿克薩科夫.....	45
(二) 西歐派.....	47
1. 西歐派的中心思想.....	47
2. 代表人物.....	48
(1) 赫爾岑.....	48
A. 思想.....	50
B. 著作.....	52
(2) 巴枯寧.....	55
A. 政治理念.....	57
(a) 自由之概念.....	57
(b) 集體無政府主義.....	57
(c) 與馬克思分道揚鑣.....	58
(3) 別林斯基.....	60
二、第二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多餘人物與虛無主義者.....	65
(一) 多餘人物.....	66
(二) 虛無主義者.....	71
三、第三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民粹主義者.....	76

內容	頁數
第肆章 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沒落	81
第一節 二十世紀初期俄國社會與文化	81
一、白銀時代的文學流派與蘇聯文藝政策	81
(一) 白銀時代的文學流派	82
1. 寫實主義	83
2. 象徵主義	84
3. 阿克美主義	85
4. 未來主義	86
5. 其他流派	87
(二) 蘇聯文藝政策	89
1. 世紀之交的文藝活動	89
2. 無產階級文化派與〈黨的文學政策〉	91
3. 〈改組文藝團體〉	93
二、僑民文學：三波流亡潮	94
(一) 三波流亡潮	94
(二) 僑民文化特徵	95
第二節 「國內流亡者」	100
一、阿赫瑪托娃	101
(一) 《安魂曲》	104
二、巴斯特納克	106
(一) 《齊瓦哥醫生》創作背景	107
(二) 《齊瓦哥醫生》的生與死	109
三、布爾加科夫	113
(一) 《致命的蛋》	114
(二) 《狗心》	115
(三) 《大師與瑪格麗特》	117

第伍章 結論	119
參考書目	125
俄文摘要	137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推動西化，大量遣送青年遠赴西歐汲取新知，開啟了知識份子¹的思想之窗。後半葉，凱薩琳二世標榜「開明的文化」，也開拓了知識份子的視野，稱之為俄國啟蒙時代並不為過。及至十九世紀中期與後期，知識份子真正成為重要的新興族群。在俄國，知識份子的地位相當特殊，與中國的「士」頗為相近，既是特定族群，也是讀書人的代稱。哲學、文學、社會學，甚至宗教、政治……等論述俄國的專書中，都看到知識份子勇於直接參與時代大事。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曾言：「俄國知識份子將成為革命風潮的酵母」。²研究俄國的學者，都發現知識份子在俄國的歷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每當俄國社會發生重大的歷史事件，面臨何去何從的嚴峻選擇之際，知識份子均深入參與，並發揮不容忽視的影響力。³而事態嚴重，一再發生的反政府行動，如 1825 年的十二月黨人事件(Восста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的民粹主義運動，亦由知識份子領導。十九世紀末期，民粹運動日盛，要求改革的聲浪漸高，政府卻以武力鎮壓百姓，震動民心；其後日俄戰爭失利，更升高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1917 年沙皇退位，知識份子⁴是反對力量的重要領導與支持者。他們是共黨革命的重要推手，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展不容小覷，然而他們也是蘇聯時期受害最深，感觸最複雜的一群。

知識份子無疑是催生現代俄國的主要力量，然而此一小族群何能以蚍蜉之身撼動根深蒂固的專制體制，引起筆者很大的興趣，決定進行研究。探討俄國知識份子的崛起、沒落，及其社會力量，是為本論文主要目的。

¹ 本論文所指知識份子皆為俄文的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指一般「知識份子」時則另加單引號，以免混淆。

² Н. А. Бердяев 原著，雷永生、邱守娟譯，《俄羅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107。

³ 葉書宗、張盛發，《錘子與鐮刀—蘇維埃文化和蘇維埃人》。台北：淑馨出版社，1991，頁 38。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論文屬文化研究範疇，因此於說明研究途徑前，先闡明何謂文化研究。美國當代學者派崔克·布藍特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⁴認為，文化研究並非周密、有條理、有特殊目的的運動，而是由眾多議論、潮流和問題組成的概念群。因此，進行文化研究時，研究主體以外，研究者必須涉獵其他學科知識，或以多種學科為途徑，才可能完整呈現此「概念群」。因此文化研究有下列顯著特性：一、文化研究是跨界研究；二、文化研究所要分析的不只是「文化」本身，還要注意研究文化的「媒介」。⁵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⁶在其文化論專書《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5）中提到，一般人熟悉的文學與藝術，僅能視為「文化」形式之一。就威廉斯的理解，「文化」為生活方式與「時代精神」（Zeitgeist, Spirit of the age）的總稱。為了解「時代精神」，必須捕捉某個文化的特殊感覺與氛圍，及人們在特定歷史時期感受的方式。為此，「記錄式文化」（documentary culture）的利用十分重要。所謂「記錄式文化」，指文學作品、建築、流行風尚等物質證據。「當活生生的見證者沉默，記錄式文化就成了直接呈現於我們眼前的生活。」⁷因此，文化研究的確需要跨界收集各式「記錄式文化」。

劍橋大學出版的文學批評理論專書（*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2004）分文化研究的理論為五種：英國文化唯物主義（British Cultural Materialism）、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美

⁴ 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英文系教授，關於維多利亞時期研究的著作為學界最常引用的書籍之一；此外，派崔克·布藍特林格在經濟歷史學、文化研究及大眾文化研究理論上亦有重要貢獻。

⁵ Wilfred L. Guerin, Earle Labor, Lee Morgan, Jeanne C. Reesman, and John R. Willingham, eds.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7-279.

⁶ 英國學者、小說家、評論家。其作對政治、文化、大眾傳播媒體及文學研究深具影響力。今日文化研究的發展原型，有不少概念出於雷蒙·威廉斯之作。

⁷ Philip Smith 著，林宗德譯，《文化理論面貌導論》（*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台北：韋伯文化，2008，頁 217。

國多元文化論 (American Multiculturalism)、後現代與大眾文化論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及後殖民主義研究 (Postcolonial Studies)。它們各有闡揚重點，本論文選擇以新歷史主義為研究方法，謹簡述此理論如下：

(一) 新歷史主義

一般公認，新歷史主義 (又稱文化詩學) 的奠基者為當代美國學者史帝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1943-)。⁸1986年，他在一場名為「走向文化詩學」(“Toward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講中，將新歷史主義更名為「文化詩學」，並強調文化詩學是一種實踐，不是學說；⁹不過多數人仍習慣稱此理論為新歷史主義。

新歷史主義出現前，學術界充斥「結構」、「解構」的形式辯論，文藝批評成了技巧、形式、語言的實驗。新歷史主義學者對「詩歌是以邏輯為核心，加上音韻排列組合之結構」的說法十分不耐。他們認為，年輕一代文學批評家因為想分析文本，卻缺乏詮釋文本的方法，只好套用結構、解構與後結構等主義，將所有文學都視為語言的實驗與遊戲。此分析法使文學淪為「文字組合」，失去了足以傳世的雋永意義。

當代新歷史主義者路易斯·蒙特洛斯 (Louis Adrian Montrose)¹⁰認為，大部分的敘述、評論和分析都無法反映真實的歷史，必須借助流傳的文學為媒介。文學作者的個人經驗、家庭史、社會史，往往可串連出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反之亦然。新歷史主義打破傳統篇章結構的分析，對文本進行綜合性的解讀，以文學與人生、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權力的關係為分析中心，將歷史還原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基礎。¹¹也就是說，新歷史主義注重文本與歷史的關係，以文本為理解某特定歷史背景的材料；

⁸ 英國文學批評家。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提出「新歷史主義」一詞，被視為新歷史主義的奠基者。專門研究莎士比亞及文藝復興時期作品。

⁹ H. Aram Veese.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89, p.1.

¹⁰ 美國學者、文學理論家，現為美國加州大學英文系教授。專門研究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戲劇，伊莉莎白一世時期文學作品。

¹¹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2001，頁 157-158。

因為特定歷史情境下產生的文學建構了當時的文化情況，反之也呈現了歷史真相。同時新歷史主義的研究主體不僅是文學或歷史，而是「歷史中的文學」(literature in history)。¹²因為歷史是社會的產物，但因政治等因素，真實的歷史往往無法完整呈現，需要借助非官方的文學，彌補這些缺洞，歷史本身得以被清楚重現。

新歷史主義的主張可歸納如下：

- 一、文學作品不是作家的無病呻吟，或形式化的書寫。重要的傳世之作必受同時代社會與文化背景影響。欲正確解讀文學作品，必須先了解當時的歷史。
- 二、不論人或文學，都經社會形塑，因此任何時代的文學都需搭配同時代的文獻資料進行解讀。
- 三、文學是小歷史 (Little History) 或微觀史 (Micro-storia)，提供有別與正統歷史的角度，觀看文化。
- 四、文學不僅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特定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文學作品常反映作者對政治權力與社會制度的質疑與壓抑。即使作者本人宣稱自己寫作不帶任何立場，新歷史主義認為，作家的政治傾向往往在作者不自覺的情況下流露於作品中，甚至佔相當重的比例。

美國梅爾斯教授 (D. G. Myers, 1958-) ¹³於 1988 年發表的論文：〈文學研究中的新歷史主義〉(“The New Historicism in Literature Study”, 1988)，詳細舉出新歷史主義的應用實例。他首先以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 為例。奧斯汀創作小說十餘部，但清一色地描寫士紳階級，奴僕階級處於邊緣地帶，幾乎被作者完全忽略。梅爾斯指出，細究奧斯汀出

¹² 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 3-4.

¹³ 目前任教美國德州農業與機械大學，專長歷史、文學批評、猶太文學研究。

身年代，當時士紳屬於社會上層階級。因此，如果奧斯汀寫底層百姓，她的小說就失去可看性，讀者也不至於包含國王喬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了。士紳階級高高在上，因此士紳與低階人士通婚困難重重。書中，作者描寫低階者希望藉通婚走向權力和名望，寫出了當時的社會實情。

梅爾斯另舉一例。他指出，蒙特洛斯曾以新歷史主義分析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1590）。《仲夏夜之夢》寫於英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時代。伊莉莎白女王是英國都鐸王朝第五位君王，史家稱其在位期間為英國的黃金時期，她是「榮光女王」（Gloriana）、「英明女王」（Good Queen Bess），又因終生未婚，也被稱為「童貞女王」（Virgin Queen）。《仲夏夜之夢》中的男性角色多滑稽、懦弱，女性角色則較強勢，勇敢追求所愛。精靈作弄下，高高在上的仙后愛上了裝扮成驢的工人波頓（Bottom，有底層、底部之意）。蒙特洛斯稱，此故事表達同時代人對女王的看法：女王統治著男性社會，眾人予以尊重，但男性實仍心存壓制女性。¹⁴

以新歷史主義分析文學作品，可以發現作品的情節與作者所處的年代，看似一致，也常隱藏作者內心改革現況的希望。譬如珍·奧斯汀雖「只」寫士紳階級，卻安排了不同階級的「通婚」，試圖打破當時的世俗觀。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表面是童話故事，卻讓一名底層男性（工人波頓）在奇幻機緣下，勝越尊貴的女皇。

政大英文系陳超明教授¹⁵在論文〈狄更斯小說中的性關係〉¹⁶中，亦以新歷史主義分析狄更斯（Charles J. H. Dickens, 1812-1870）的《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 1850）。傳統認為，「性」是狄更斯的禁忌話題。二十世紀批評家華特·豪頓（Walter Houghton）與亞歷山大·衛許（Alexander Welsh）評論維多利亞小說的「男女關係」，指狄更斯將女人描繪為家庭中

¹⁴ D. G. Myers. "The New Historicism in Literary Study", *Academic Questions* 2 (Winter 1988-89), pp. 27-36.

¹⁵ 現任政大英文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十世紀美國文學。

¹⁶ 陳超明，〈狄更斯小說中的性關係〉，《第五屆英美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書林，1994，頁 471-497。

的天使 (The Angel in the House)，刻劃「無性」(a-sexual) 的家庭生活，反映當時純潔的婚姻關係。陳教授提及，近代不少文化研究認為，維多利亞時期的性氾濫 (嫖妓、同性戀、色情文學等) 實已侵入社會各階層，影響社會的道德體系。陳教授以《塊肉餘生記》為例，說明狄更斯探討家庭關係與主角的成長過程時，勾勒出小說人物之間複雜的男女關係。這些糾纏的關係，深深影響小說人物的成長，也是形成小說衝突與張力的原因。狄更斯將女人淨化為「天使」，反映作者受當時社會主流文化影響。¹⁷書中也描寫了同性戀、性變態、亂倫，亦是當時社會的真實現象。新歷史主義使文學不只有道德論述，《塊肉餘生記》也不只敘述主角努力向上，擺脫貧窮，還是讀者可藉之窺看維多利亞時期婚姻及男女關係的微觀史。

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文學作品批判社會，社會則影響文學創作。本論文以新歷史主義觀點，利用文本、歷史以及知識份子之傳記等資料，與當時的俄國社會比較，重新界定俄國的知識份子。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有二：

(一) 文獻分析法：所謂文獻分析法是利用各種型式的檔案資料，獲取對研究對象的了解，並歸納整理其中內容。本論文探討俄國知識份子，首要蒐集論述知識份子的專書與論文。此分析法主要應用於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將俄國知識份子的由來、定義及特質，作詳細介紹。此外，第三章與第四章之第一節，亦利用此分析法，力求使讀者瞭解十八與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背景，進而理解知識份子形成的原因。

(二) 文本分析法：本論文利用文本與歷史資料穿插說明，除剖析作品表面的文字意義及作品的主題外，亦分析當時知識份子的社會理念與處世態度，並以各學者之評論為輔，瞭解當時社會大眾對知識份子的認知與期望。

¹⁷ 正因現實社會道德淪喪，當時衛道者強烈捍衛婚姻神聖性，教會也不斷提醒「貞節觀」，唯此理想並未實現於現實社會。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研究限制有三：一、知識份子一詞之定義與指涉；二、知識份子的取樣；三、關於蘇聯共產黨的正式名稱。

一、知識份子之定義與指涉

本論文題目為「知識份子的沒落與崛起」。進一步探討知識份子前，需簡述俄國知識份子形成的歷史。俄文知識份子有二種意思：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intelligentsia) 與 интеллигент (intellectual)，兩者意義不同，本論文所指知識份子為前者，論文第二章將詳細說明其定義與發展。

二、知識份子的取樣

舉凡哲學家、作家、藝術家，甚至有道德自覺的不識字農奴皆可視為知識份子。本論文於第參章「十九世紀：知識份子的演變」舉「哲學家」為例，在第肆章「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沒落」則選擇以「文學家」來呈現俄國知識份子之樣貌，理由如下詳述。

筆者在第參章以「哲學家」為知識份子典範，原因在於：十九世紀中期後，知識份子開始活躍，但此時的知識份子多為思想家，將西方哲學傳入俄國，或如斯拉夫派，以強調民族性提昇俄羅斯文化。為使論文清楚呈現知識份子之演進及思想流變過程，筆者決定十九世紀以「哲學家」為例加以探討。第肆章討論二十世紀知識份子，因政治情況特殊，當時多數哲學家已在共黨革命前後離開俄國，若以其為知識份子典範，恐有失公允，因此第肆章改討論「文學家」。另外，由於二十世紀初期社會、政治情況均複雜，以「文學家」呈現知識份子面貌有下列優點：

- 一、文學家流傳的作品最豐富，著作多能貼近生活、不晦澀難懂，為一窺真實社會情況的佳徑；
- 二、與文字著作相較，繪畫、音樂等作品給予接受者的觀感更主觀，

以之為論文分析材料恐失客觀，因此文字作品仍屬首選；

三、當時俄國期刊出版百家紛呈，文學作品是有力的大眾媒介，也反映了部分真實的社會狀況。

因此筆者論述俄國知識份子時，將兼採哲學家與文學家之作。

三、關於蘇聯共產黨的正式名稱

由於蘇聯共產黨掌權前後名稱變動繁複，本論文凡提及蘇聯共產黨，將不分時期一律簡稱「共黨」或「俄共」。提及蘇聯時期政府，一律稱蘇維埃政府或共黨政府，以與沙皇政府區別。蘇聯共產黨不同時期之正確名稱，筆者整理如下：

年代： 1917-1918

俄文：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中譯：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布爾什維克）

註解： 1903 年起，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分列為布爾什維克（Большевик，意為多數派）與孟什維克（Меньшевик，意為少數派）。布派自稱時，常在黨名後加上（布）以作區分。

年代： 1918-1925

俄文：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中譯： 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簡稱： 俄共（布）

年代： 1925-1952

俄文：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中譯： 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簡稱： 聯共（布）

年代： 1952-1991

俄文：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中譯： 蘇維埃共產黨

簡稱： 蘇共

四、章節配置

本論文研究俄國知識份子之演進過程，非一般斷代史研究，因此在章節配置上無法與斷代史一樣，將各研究重點完整切割。如第貳章「十八世紀：知識份子的崛起」第三節談到知識份子之先驅者一十二月黨人，便為一例。十二月黨人事件發生於 1825 年，隸屬十九世紀，但本文還是將其歸在第貳章之下，原因有二：一、本文將十二月黨人視為知識份子之先驅者，若僅因十二月黨人事件發生在十九世紀，便將此節歸於第參章「十九世紀：知識份子的演變」，雖時間點符合標題，但內容卻與第參章所探討議題大相逕庭；二、十二月黨人事件雖發生於十九世紀，但此為文化現象與歷史事件，導致此事件之因果關係自十八世紀已有淵源，並非無端發生於十九世紀，且參與者亦多出生於十八世紀，因此將十二月黨人事件放在第貳章「十八世紀：知識份子的崛起」較為合理。

此外，知識份子正式出現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知識份子的定義與特質」似乎放在第參章較合適，但本文將「知識份子的定義與特質」置於第貳章第二節，原因如下敘述。第貳章第一節首先敘述知識份子產生之背景，第三節討論知識份子之先驅者，因此第二節必須先界定「何謂知識份子」。譬如，學界不少人認為諾維科夫（Н. Н. Новиков, 1744-1818）、拉迪史契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及十二月黨人為俄國首批知識份子，但本論文僅將其視為先驅者，因為他們尚未正式脫離官方政權（十二月黨人皆為服公職之軍官）。有鑑於此，筆者將本論文認定之「知識份子的定義與特質」放於第貳章第二節，先使讀者清楚知識份子之定義，再為讀者介紹知識份子的先驅者與其後典範。以閱讀流程而言，此安排應屬恰當。

五、文學／文化術語之差異

本論文討論俄國文化／文學現象，故常使用文化／文學術語。然俄國文化／文學自成一格，許多觀念及思想雖承自西方，卻在細節上與西歐大不相似。如第貳章將提到凱薩琳女皇執政期間被視為俄國的「啟蒙時代」（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但真正的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開始於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其思想引進俄國時已在西歐發展近百年，若以西方文化脈絡來看，此時期之哲學思潮已由啟蒙時代漸漸邁向浪漫主義時期。稱之「啟蒙」，是由於女皇引進西學，開拓知識青年眼界，因此史學家讚其執政時代為俄國的「啟蒙時代」，其意涵與思考模式不同於西方。其他如自然學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школа）、寫實主義（Реализм）等術語，亦為俄國學者引用自西方，經文學批評家闡釋後，其意亦與西方原意不同，在此必須先提出，以免讀者閱讀時混淆。本論文所用之術語，若出自西方，將在術語之後附上英文；若引用之術語特指俄國文化／文學獨有現象時，將附上俄文，以利讀者查詢比較。

第貳章 十八世紀：知識份子的崛起

第一節 十八世紀俄國文化與社會

一、彼得大帝的行政與教育文化改革

彼得大帝（Пётр I, 1689-1725）之前的歷任君王雖已實行若干改革政策，但至十七世紀，俄國社會與文化仍處於封閉時期。儘管如此，十七世紀俄羅斯社會與文化仍產生些許改變。首先，宗教主導之世界觀已逐漸喪失領導地位，人們開始將生活重心轉為世俗生活。最明顯的轉變在於對沙皇的態度，俄羅斯人原只知皇權神授，到了十七世紀，他們承認沙皇為賢明的「世俗人」，是神權在地上的「代理人」。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則試圖走出宗教思維的藩籬，於是改變了俄羅斯文學以宗教文學為宗的局面，歌頌沙皇的詩歌出現，為俄羅斯世俗文學拉開序幕。使徒行傳與編年史仍為文學體裁大宗，但新文學形式，如歷史小說、戲劇作品的比重也逐漸增加。文學以外，印刷術興起，數學、力學、物理、化學等科學知識逐漸普及，先進醫學與國外著作先後傳入俄國，音樂與建築亦深受巴洛克風格影響，甚至自成一格（莫斯科巴洛克風格（Московский стиль），或稱納雷什金風格（Нарышкинский стиль））。俄羅斯文化從純宗教轉向世俗，西歐文化對俄羅斯文化的影響漸深，都是彼得大帝改革前的背景。¹⁸

彼得大帝的改革內容係零星提出，因而極其龐雜，不過其改革動機單純，目的在於爭取對外戰爭的勝利，¹⁹因此必先強化本身行政組織、增加財政收入、加強作戰部隊實力、力求人民為國效力。由此可知，彼得大帝之改革涵蓋了軍事、行政、經濟、教育文化與宗教各項。以下簡述行政與教育文化的改革內容。

¹⁸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77-80。

¹⁹ 李邁先，《俄國史一上冊》。台北：正中書局，1979，頁 146。

（一）行政改革

彼得親政之始，傾全力發展軍事與財政，因此將中央行政權托予貴族會議（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²⁰貴族會議為輔助沙皇治國的最高諮詢會議，擁有行政、立法、司法、外交權，沙皇不在國內時可代為行使一切政權。貴族會議早期為彼得之母系親戚壟斷，內部腐敗。為鞏固中央政府，彼得廢除貴族會議，於 1711 年成立參議院（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сенат），成員九名。比起動輒百人的貴族會議，參議院不僅行政速率快，且為彼得大帝依能力選拔，親自任命。為革除官員弊病，彼得建立以功績與能力為升遷準則的官僚制度，於 1722 年頒布官階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全名 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 всех чинов воинских, статских и придворных）。官階表之設立得以廣攬人才，提拔後進。此表將全國公務人員分三類：軍事、文職、宮廷人員；每類十四職等（класс），不論貴族平民，一律自最低級做起，再依其服務年資及表現給予升遷。升至第八等以上者可獲封地、農奴，免繳人頭稅。新興貴族²¹因此激增，打破公職人員只論出身的傳統，全國公民不分貧富與階級，晉升的機會一律平等。

（二）教育與文化改革

改革需有知識水準及辦事能力的人員推動，為此，提高教育水準與普及教育亦為彼得大帝改革重要的一環。彼得於莫斯科成立一座技術學校，專門教授數學及科學等實用課程，入學學生以曾赴海外留學的貴族子弟為主。這是俄羅斯史上第一所政府辦理的非宗教學院，打破教會壟斷教育的傳統。²²彼得命令該校畢業生兩人一組至各省城教書，短短兩年間（1714-16），俄國設立了 12 所學校，迄 1722 年增至 30 所。1722 年入學學生總數為二千人，分別來自教士、軍人、工匠等不同階級。此制度奠定了以後政府設立學校，普及教育的基礎。此外，彼得下令貴族子弟年滿十歲，必須分發至各種特設學校就讀。貴族起初排斥，逃學者眾多，於是彼得嚴令，凡初

²⁰ 「博亞貴族」（боярин）自基輔公國時期便存在，原為武士，後成為專為大公諸侯提供軍事服務的世襲食邑貴族（кормленщик）。自莫斯科公國時期，即享有召開「貴族會議」（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的參政權。

²¹ 同註 19，頁 150。

²² 賀允宜，《俄國史》。台北：三民，2004，頁 202。

等學校未畢業者不得結婚，情況才稍改善。

學校以外，彼得建立俄國首座圖書館，又陸續成立劇院、博物館、公園，並仿效法國學院制度，1724 年下令設立皇家科學院，希望藉此加強研究學術，推廣教育人民。為推廣教育，彼得簡化教會斯拉夫語字母與文法，使人民易於學習。新文字與文法審定完成後，由彼得親自批准，以之為所有非宗教性書籍印刷之標準。彼得大帝之前，出版書籍以《聖經》為主，之後因字母簡化、印刷術發達，且為配合學校課程，大量出版歷史、算術、天文、航海、文學等書籍，翻譯作品亦多。第一份報紙則出現於 1703 年，取代以往手抄的外國報紙。此外，彼得下令剃鬚，以日耳曼式服飾取代蒙古式寬長袖服飾。並在聖彼得堡舉辦大型舞會，為貴族、商人提供社交機會，邀請婦女參加，俄國婦女乃得於公開社交場合露面。為訓練青年教養，彼得甚至頒布訓令教導貴族子弟禮節，如父母問話子女如何應答，不得穿長靴跳舞，禁止以手指挖鼻等等。²³

彼得大帝的改革在俄國史中被稱為「彼得改革」(Петровские реформы)，不僅指其實際改革，亦包含文化之變革。如別爾嘉耶夫言：「過去的俄羅斯處於封閉狀態。沒有彼得大帝的強力改革，俄羅斯無法在世界上說自己的語言，無法自保，也無法發展。」²⁴從文化學角度看，彼得的改革改變了俄羅斯人的思維與生活方式。過去文化與文明僅為宗教服務，彼得大帝使之轉而親近世俗大眾：從前教士、教會獨享的特權，如讀書識字，如今俗世人民也有機會學習。透過宗教改革，教權不再高於政權，沙皇雖不再是神的化身，但身為神的「代理人」，沙皇成為神與人的溝通者，藉此，君權因此更加穩固，中央集權也更有權力。彼得大帝打破宗法制度，大膽向西方學習，為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化發展鋪設坦途。

²³ 同註 22，頁 70。

²⁴ 同註 2，頁 14。

二、凱薩琳女皇的教育與文化政策

彼得大帝去世後 37 年間，先後歷任七名統治者。皇位更迭頻繁與外國勢力滲透為此時期特色，另一特色是新皇皆需仰賴貴族軍團的支持。凱薩琳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62-1796）以前的安娜女皇（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730-1740）與伊麗莎白女皇（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1741-1761），皆仰賴這些貴族支持才順利登基。凱薩琳本人亦賴此軍團擁護，推翻其夫彼得三世（Пётр III, 1761-1762）。上任後，她被迫繼續賞賜特權換取他們的支持。1785 年，凱薩琳二世頒佈《貴族特權詔書》（*Жалов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 дворянству*），免除貴族的服役義務，並給予不繳稅，永遠擁有受封土地及對農奴的絕對管轄權。退役貴族不僅繼續保有土地，還享有土地處分權，可隨意變賣。此外，貴族在領地上享有高度自治權，後世子孫的地位與特權皆享合法保障。俄國社會遂形成兩極端：上層貴族們享受農奴提供勞役，下層農奴永遠受壓榨，對俄國以後的歷史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凱薩琳二世承繼彼得大帝的西化努力，與當時法國知名學者伏爾泰（Voltaire, 1694-1788）、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書信往返，引進西方思想作品，對俄國國內進步文化與文明的激發，產生一定影響。後世稱她在位期間為俄羅斯的「啟蒙君主專制時期」（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н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足見其對俄國西化的貢獻。²⁵所謂啟蒙思想指十七世紀晚期至法國大革命期間湧現的新思維；啟蒙運動涵蓋各知識領域，如自然科學、文學、藝術、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啟蒙時代的學者注重理性，強調系統化思考，尊重宇宙自然法則，他們承襲理性主義（Rationalism）哲學，建立了唯物哲學（Materialism）的思考方式，其思想有兩大特點：一、強調理性思考，認為理性是「人類認識真理的能力」。二、重新考證歷史。人們過去以神學、哲學解釋歷史演進，啟蒙時代的學者對此質疑，並進一步質疑歷史本身。學者開始了一連串考古研究與文物挖掘，希望以理性呈現歷史真相。

²⁵ Т. С. Георгиева 原著，焦東建、董茉莉合譯：《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Издани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 переработанно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225。

啟蒙時代哲人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後來漸由唯物思考轉向唯心，盧梭更被後世譽為「浪漫主義之父」(Father of Romanticism)。²⁶盧梭最大的貢獻在於寫作《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1762)，書中提倡民主，認為應以民主政體取代君主專制，政府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而不是統治者。他的觀念帶動西歐思想家對「君權神授」產生懷疑，更成為日後美國獨立宣言與法國人權宣言的基礎。

凱薩琳二世以開明自詡，對她而言，伏爾泰代表理性與懷疑的精神及改進社會的熱忱。於是，「伏爾泰主義」(Волтерианство)成為當時俄羅斯貴族競相討論的顯學。但是，伏爾泰思想中除了理性與懷疑的精神外，還有「反對君主制度」、「維護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尤為伏爾泰所捍衛，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²⁷更可體現其中心意旨。無論如何，啟蒙思想標榜的理性與奉獻改革社會的精神，經由女皇推廣，已在俄國貴族青年心中紮根，促使他們積極探討俄國的政治與社會各項問題。

1766年，凱薩琳二世即位第四年，女皇召開立法委員會，修訂1649年制定的法典。為了符合人道與理性主義精神，女皇以兩年時間親書六百五十五條法令，集結為《訓令》(*Наказ*)，下令委員會以之為據，擬定新法。《訓令》處處可見啟蒙思想，其中，高達五百餘條法令出自孟德斯鳩的《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 1748)。伏爾泰稱讚《訓令》是當時偉大的里程碑。《訓令》前數章將俄國定位為歐洲國家，但俄國疆域遼闊，需要獨掌大權的君主，方能順利統治，其他歐洲國家的政體，不適宜在俄國實行。第五章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民有追尋自由、快樂的權利；但同時言明，政治的自由不包含在內。第六至九章闡明立法基礎與刑罰必要性，但不容忍違反自然法則的行為，因此任何使人肢體殘障的刑罰，亦予廢止。第十四章論教育的重要性，說明教育的目的在培養理想的公民。以培養敬畏上帝的謙恭精神為基礎，然後教以禮儀，榮譽感和羞恥感，使人民遠離邪惡，成為好公民。女皇的《訓令》看似開明，卻包含許多但書。女皇甚

²⁶ Rod W. Horton and Vincent F. Hopper. *Background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75, p.358.

²⁷ 法文原文為：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至頒佈法令使農奴制度更形根深蒂固，²⁸歐洲各國進行解放農奴之際，她卻犧牲農民權益，拉攏貴族，殊甚諷刺。²⁹

《訓令》特別強調教育重要。凱薩琳認為教育首重道德、倫理與性靈的長期培養，即位第一年曾擬將學童就學年數由五年延長至十八年。但礙於當時俄國無專門負責教育之機構，此令一直未付諸實行。女皇在 1764 與 1765 年先後設立兩所專收女性學生的學院，授予閱讀、寫作、算術與管理家務之基本知識。至 1794 年，先後已有八百多名學生畢業，可謂成績斐然。凱薩琳重視女性教育，不僅在俄羅斯，甚至在當時歐洲也是一大貢獻。凱薩琳在《訓令》中提出公共教育的基本原則：一、公立學校應分小學、初中及高中；二、學校中無班級區分；三、公立學校為強迫性的義務教育。為推廣義務教育，凱薩琳於 1783 年成立師範學院培訓師資，又於 1786 年成立公共教育部，正式籌劃推動公共教育。為公共教育教材，她特別禮聘維也納大學教授，將奧地利教科書依俄國民情譯為俄文。凱薩琳時代因經年征戰財政困乏，儘管如此，公共教育仍有所進步，至 1796 年，全國已有 315 所公立學校，計一萬多名學童。然這些學校主要設立於城市，鄉村學校僅 11 所，對農民子弟幫助很小。³⁰

此時期的文學發展則受法國古典主義影響，肯定人的理性，反對宗教束縛，模仿古希臘羅馬文學體裁。古典主義以外，受啟蒙思潮影響，作家開始在作品中提出尖銳的社會問題。至十八世紀末期，俄羅斯文學則流行感傷主義（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代表著作為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的《可憐的麗莎》（*Бедная Лиза*, 1792），描寫農家少女的戀情，將文學作品由歌頌君王、歷史帶至描寫普通人的內心感受，為俄羅斯文學開啟新視界。文學以外，大小劇院林立，十八世紀末出現以俄文演唱的民族歌劇，芭蕾舞亦成藝術表演節目，奠定了俄羅斯芭蕾舞派的基礎。

²⁸ 1767 年前，農奴尚可對處罰不當的地主提出告訴；1767 年 8 月，凱薩琳二世訓示，凡未經許可控告地主的農奴，處以鞭刑，再判流放。

²⁹ C. J. Hogarth. *A History of Russia*, Vol. 5.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p. 73-75.

³⁰ 同註 22，頁 259-260。

第二節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定義與特質

俄文「知識份子」詞彙有三：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интеллигент,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指「智力高度發達的人」(человек с высоко развитым интеллектом)；интеллигент 指「勞心者」(человек ум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 或「有思考能力的人」(мыслящий челове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則指「接受過專業教育，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特殊領域具備水準以上能力的勞心者」(работники ум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 обладающ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знаниям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науки, техники и культуры)。³¹三詞雖有程度差異與不同指涉，中文卻一律譯為「知識份子」。俄文則除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較無歧義外，интеллигент 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差異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單就語意探討，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是 интеллигент 的集合名詞，俄中辭典通常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譯為「知識份子(們)」或「知識界、知識階層」。³²事實上，此二字的文化意涵並非如字典所述那樣簡單。интеллигент 可定義為受過教育的勞心者，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則代表俄國十九世紀後半葉以後出現的社會獨特現象，是一種意識型態的組合。

俄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一詞首見於 1860 年作家巴柏瑞金 (П. Д. Боборыкин, 1836-1921) 筆下，然後屠格涅夫 (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在《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 1862) 中刻意描述，而為讀者所知，並引起討論。巴柏瑞金解釋，此字取自德文，德國人用之指稱「致力於智力活動」(занимаютс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的社會階層。《韋伯字典》(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解釋：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詞源來自拉丁文 (Russian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from Latin intelligentia)，原是一般知識份子 (интеллигент) 的集合名詞，指藝術、社會或政治領域的活動先鋒與菁英。³³不過巴柏瑞金對這個詞另有看法。他說，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是具有高度智力，受倫理文化薰陶者；他們可能從事各行各業，但必具有高標準的道德精神。如今，此字在俄國的意涵早已超越拉丁文及德文原意，成為俄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了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 это чисто русский

³¹ 以上俄文解釋出自張建華等編，《現代俄漢雙解辭典》。北京：外研社，2002，頁 319。

³² 卜東新等編，《大俄漢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718。

³³ 〈intelligentsia〉，《Merriam-Webster's Online Dictionary》. 2007.02.08
(<http://www.m-w.com/cgi-bin/dictionary?book=Dictionary&va=intelligentsia>)

морально-э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³⁴

本論文探討的知識份子為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³⁵為瞭解知識份子角色的認定及其時代背景，必須說明知識份子一詞的由來、演變、定義及其在俄國歷史上的代表性。由於俄羅斯知識份子並非如一般認知的「接受過專業教育，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特殊領域具備水準以上能力的勞心者」，而是某意識形態的組合，又因學界對知識份子的闡釋常因分析角度不同，導致不同結論。因此諸如「誰是第一代知識份子」，或「第一代知識份子出現於何時」，及「如何界定孰是、孰非知識份子的標準」，各家論點紛紜。以下簡列五種不同論點：

- 一、費多托夫 (Г. П. Федотов, 1886-1951)³⁶、維爾納茨基 (Г. В. Вернадский, 1888-1973)³⁷與麥梅托夫 (В. С. Меметов, 1939~)³⁸主張，第一代知識份子出現於古羅斯時期，代表者是東正教教士。他們認為，基輔羅斯時期已出現可與拜占庭知識人相提並論的菁英份子，³⁹也就是繕寫經書的東正教教士。⁴⁰這些教士的努力，造就了基輔羅斯的文化與文明，是十四至十七世紀俄羅斯民族意識的基礎。⁴¹
- 二、梅烈日科夫斯基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⁴²、格爾申宗 (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1869-1925)⁴³、謝爾蓋·布爾加科夫 (С. Н.

³⁴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Социология》。2009.08.20
(http://www.krugosvet.ru/enc/gumanitarnye_nauki/sociologiya/INTELLIGENTSIYA.htm
1)

³⁵ 本文提及之知識份子，若無特別註記，均指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若指 *интеллигент* 將另予註釋。

³⁶ 俄國歷史學家、哲學家。

³⁷ 俄國歷史學家。

³⁸ 現為伊凡諾夫斯基大學 (Иван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俄國歷史文化系主任。

³⁹ Г. В. Вернад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Москва: Аграф, 1999, ст. 302-309.

⁴⁰ 李小桃，〈也談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發軔〉，《俄羅斯研究》，第 158 期，2009 年，頁 17。

⁴¹ В. С. Меметов,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ваново, ИвГУ, 1997, ст. 8-15.

⁴² 俄國思想家、作家。

⁴³ 路標派作家之一。《路標集》(全名 *Вех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909) 結集七位當時重要知識份子之文，討論俄羅斯知識份子在俄國歷史的角色，對當時社會發揮了重要影響力。七位知識份子因而被稱為路標派 (*вехист*, *веховец*)，包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⁴⁴與卡崗(М. С. Каган, 1921~)⁴⁵主張，第一代知識份子於十八世紀前期，代表者為彼得大帝。他們認為，彼得大帝進行改革，催生了俄國知識份子，⁴⁶他們是彼得大帝的繼承者，⁴⁷掌握了國家未來發展的路線。這些知識份子開啟面向歐洲之窗，是輸入歐洲文化的靈魂人物。⁴⁸他們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產物，影響俄國甚鉅。⁴⁹

三、別爾嘉耶夫⁵⁰、利哈喬夫(Д. С. Лихачёв, 1906-1999)⁵¹及派普斯(Richard Pipes, 1923~)⁵²主張，第一代知識份子出現於十八世紀中後期，以諾維科夫(Н. Н. Новиков, 1744-1818)和拉迪史契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為代表。凱薩琳女皇在位期間一方面以《貴族特權詔書》標榜自由開明，另一方面又賦予貴族地主更多特權，為貴族階層開啟通往自由教育之路，因而產生了具革命思想的知識份子。⁵³這些知識份子閱讀法文等西歐書刊，於是除了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之外，兼有民權自由的政治思想及革命學說也流入了俄國社會。別爾嘉耶夫曾言：「俄羅斯知識份子之始祖為拉迪史契夫。他在《彼得堡至莫斯科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и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1790)一書寫道：『我的靈魂因人類苦難而憂傷』，便誕生了俄羅斯真正的知識份子。」⁵⁴

括格爾申宗、別爾嘉耶夫、弗蘭克(С. Л. Франк, 1877-1950)、司徒盧威(П. Б. Струве, 1870-1944)、謝爾蓋·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等人，皆為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哲學家與思想家。1918年，路標派出版選集《發自內心》(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8)，討論俄國革命。

⁴⁴ 俄國宗教哲學家。

⁴⁵ 現為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教授。

⁴⁶ С. А. Аскольдов, Н. А. Бердяев, С. А. Булгаков и др.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1, ст. 81.

⁴⁷ 劉煜卿，《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悲劇》。北京：俄羅斯文藝，2002，頁49。

⁴⁸ 同上註，頁33。

⁴⁹ М. С. Каган,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приро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1, ст. 8.

⁵⁰ 俄國思想家，斯拉夫派晚期繼承者。

⁵¹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古羅斯語言學、文學家。

⁵² 猶太裔波蘭人，1943年歸化美國公民，為俄國史家，俄情研究專家。

⁵³ 同註40，頁16。

⁵⁴ 同註2，頁27。

四、米海洛夫斯基（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42-1904）⁵⁵、列寧（В. И. Ленин, 1870-1924）⁵⁶與司徒盧威（П. Б. Струве, 1870-1944）⁵⁷主張第一代知識份子出現於十九世紀四〇年代，代表者是別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赫爾岑（А. И. Герцен, 1812-1870）與巴枯寧（М. А. Бакунин, 1814-1876）。他們認為，親西化主義的西歐派知識青年接受西歐社會主義的理想，以之為建設俄國社會制度的核心。⁵⁸這些人的敵對者則是斯拉夫派，⁵⁹他們肯定東正教在俄國的悠久歷史早已深入人民生活及思想，是俄羅斯民族的真正力量，謙卑、樸實、愛好和平，肩負復興斯拉夫民族精神及領導世界文化的使命。⁶⁰

五、列瓦達（Ю. А. Левада, 1930-2006）⁶¹主張，第一代知識份子出現於十九世紀六〇年代，代表者為激進主義者。列瓦達言，俄國知識份子接受西方文化影響，有感於俄國政府腐敗，行政效率低落，農奴制度又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年輕的知識份子十分憤慨，主張以激進的行為推動改革，產生廣大而積極的影響力。⁶²

除以上論點外，現今學者對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定義也有多種看法。薛林教授（Dmitri N. Shalin, 1947~）⁶³之《俄羅斯文化的重大轉折：自相矛盾的後共產主義意識》（*Russian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 Paradox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1996）將俄國知識份子的理念與自我角色之認定歸納如下：

1. 以創新歷史為前提，批判社會事件與社會制度；
2. 以道德為最高指標，將個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下。

⁵⁵ 民粹運動理論家，文學批評家，社會學家。

⁵⁶ 馬克思主義者，俄國共產黨創立者，蘇聯建立者。

⁵⁷ 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共黨革命前贊同馬克思主義，革命後轉為自由主義者。

⁵⁸ 同註 46，頁 156。

⁵⁹ 同註 40，頁 12。

⁶⁰ 同註 19，頁 235-236。

⁶¹ 俄國社會學及政治學者。

⁶² 姚海，〈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激進主義及其根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3 年第 3 期，頁 78。

⁶³ 社會學者、美國內華達大學俄國及中東研究中心主任。

3. 號召有良心、具批評意識之人領導群眾對抗過時政權。
4. 嘲諷當權者。
5. 反對官僚習氣，並在家庭、朋友與藝術中表達抗議。
6. 以藝術及文學作為宣傳公眾意見及意識形態之媒介。⁶⁴

派普斯教授亦在其書《俄國知識份子》(*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1961)中說，部份學者認為「奉行革命主義者即是知識份子」，十分狹隘。因為事實上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期，許多知識份子不認同革命，但並不代表他們認同當沙皇政府，將這些人排除於知識份子之外顯然不合理。派普斯主張，知識份子「以西方思維爭取自由，應用理性爭取人類福祉」，但因此便將知識份子等同「革命份子」是不恰當的。⁶⁵

綜合以上各家之說，筆者認為，十八世紀為知識份子崛起的年代最有說服力。當時啟蒙思想普及，科學藝術發展蓬勃，出版界言論自由，文人思想活躍。另一方面，啟蒙運動的自由風氣與專制社會互相牴觸，政府高壓箝制，反而激起知識人的反抗之心，人們自我意識不斷強化的過程中，文學、哲學、美學連帶都為知識份子提供了充沛的知識來源與抒發意見的機會。然而，唯有經濟與思想皆獨立的情況下，才能發展獨立人格，不受政府掌控。因此彼得大帝之前，並未出現真正的知識份子；凱薩琳時代諾維科夫與拉迪史契夫也只是知識份子的先驅者。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才真正出現包括斯拉夫派與西歐派，能影響社會大眾，並獨立於國家權力以外的知識份子。

歸納各家之言，以下是知識份子至少應涵蓋下列基本特質：

- 一、道德感強烈，有深重的使命感與罪惡感：知識份子常將社會、政治問題轉化為道德問題，自認有義務為國家民族尋找美好前途；

⁶⁴ Dmitri N. Shalin ed. *Russian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 Paradox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p.52.

⁶⁵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48.

同時因無力解決社會問題，將自己與農民困苦的境界對照，產生巨大的罪惡感。這種反省與功利主義衝突矛盾，在契尼謝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 1863）與赫爾岑《誰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7）中有生動描述。

- 二、具有批判意識的少數人：由於教育條件所限，遲至十九世紀前半葉，俄國僅貴族及少數教士有機會接受啟蒙教育與思想的影響。直接受法國大革命衝擊者，僅限部分年輕貴族軍官，因此有能力思考，進而提出批判的，只是社會中的少數人。
- 三、與一般大眾疏離：知識份子的生活環境和思考模式與一般大眾格格不入，他們不贊同上層社會的世界觀，也無法融入下層階級。他們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不認同專制政權的價值觀，因而哲學、文化、宗教及政治上均與政府對立。他們接受上層社會的教育，卻一心想為下層百姓謀福利，這種矛盾使他們的思考與行動都與大眾疏離。因此，俄羅斯知識份子雖然「眾人皆醉我獨醒」，卻也被視為「多餘人物」（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 四、與官方權力隔絕：馬汀·馬里亞（Martin Malia, 1924-2004）“在〈何謂知識份子？〉（“What Is the Intelligentsia?”，1961）一文中說：與國家權力徹底隔離是成為知識份子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在政治利益之外，才能忠實批判，表達意見。十七及十八世紀有「知識」的貴族很多，但他們是聽命於國家的官僚，為國家服務，換取政府授與的權力。1785年凱薩琳二世頒佈《貴族特權詔書》後，貴族擁有較多自由，有機會出國接受西歐的啟蒙思想。上層貴族也逐漸發展出與專制制度相背的意志，表達獨立見解，於是貴族與沙皇間的關係逐漸產生裂痕。馬里亞認為，十二月黨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大部分在政府機關任職，未完全脫離政權控制（totally alienated from the state）。尼古拉一

⁶⁶ 美籍俄國史專家，1958-1991年任教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

世時代，才出現真正不依賴公職的知識份子。與官方權力隔絕雖能使知識份子暢所欲言，但他們實際上苦於無力推動理想，因此十九世紀五〇及六〇年代的虛無主義者只能鎮日清談「破壞與否定」，並無建設，為其他知識份子所不齒。

五、與暴力抗衡：知識份子既立志為大眾謀福利，故需與政權對抗，因此知識份子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受政府迫害。然而，與暴力抗衡也可能衍生「以暴制暴」的行為，十九世紀七〇年代以後民粹主義者時常採行暗殺手段，衍生了更多的破壞。



第三節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先驅者

一、凱薩琳二世時期

(一) 諾維科夫 (Н. Н. Новиков, 1744-1818)

凱薩琳二世賜予貴族特權，卻在部份貴族心中引起不同的反應。部份貴族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崇尚理性，有奉獻社會改革的思想，對所享特權內疚，遂嚴肅思考俄羅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其中許多人因此成為作家，他們勇於針砭時政，諾維科夫即為其一。諾維科夫曾於 1767 年在立法委員會中擔任書記。會議中，諾維科夫聽農民悲慘遭遇，親見貴族貪得無厭惡劣，決定獻身社會運動，致力改善農民境遇。

諾維科夫創辦《雄蜂 (Трутень)》、《畫家 (Живописец)》、《錢包 (Кошелёк)》等雜誌，為文嘲諷批判官員收賄、貴族愚行、農奴生活艱困等黑暗。他認為，俄羅斯的根本問題在於農奴制度，因此特別著文批評農奴制度。此外，諾維科夫努力將文化傳播至社會底層，協助發展國民教育。至十八世紀八〇年代，他陸續編輯辭典、文學指南、兒童書籍、婦女讀物，同時在莫斯科開辦圖書館，促進圖書流通。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凱薩琳恐俄國人民受影響，原先讚許的開明與人道思想，立即斥為亂源，停止「開明」政策，不再容忍譏諷時政的刊物，甚至關閉雜誌社和印刷廠。1792 年，諾維科夫以陰謀叛變罪名被捕，判處無期徒刑。15 年後，新皇保羅一世 (Павел I, 1796-1801) 才下令赦免出獄。

諾維科夫開啟出版自由之風，並有組織地進行慈善活動，對十九世紀人道主義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二）拉迪史契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

拉迪史契夫出身地主家庭，曾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系，對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知之甚深。回國後，先後在參政院及海關部任職。1773年至1775年，俄國發生普加喬夫事件（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война 1773—1775 годов，又稱 Пугачёвщина, Пугачёв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Пугачёвский бунт），拉迪史契夫時任軍事檢察官，有機會調閱逃兵資料。透過調查，拉迪史契夫得知逃兵出身、經歷，及逃跑原因，這些資料反映了農奴制度的弊病。普加喬夫事件結束後，拉迪史契夫返鄉，途中見兵燹後遍地殘敗，農奴無以維生，並獲悉許多地主遭農奴殺害。他認為農奴問題不徹底改善，必將發生比普加喬夫事件更大的災難。1783年，他的長詩《自由頌》（*Вольность*, 1783）直言，受束縛的人民有權將沙皇帶上斷頭台。1790年拉迪史契夫出版遊記《彼得堡至莫斯科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и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1790），《自由頌》以附錄形式發表。該書隨即遭禁，⁶⁷拉迪史契夫下獄，但《自由頌》已廣為流傳。其思想激勵了日後的十二月黨人。

《彼得堡至莫斯科之旅》為俄國第一部遊記小說，⁶⁸也是第一本描繪農奴現實情況的文學作品。他直接表達對農奴的同情和對帝制的不滿，要求政府解放農奴，認為除非「由上而下」解放農奴，否則農奴勢將「由下至上」尋求解放，事態將更嚴重。拉迪史契夫強調，在位者若不著手進行改革，農民應發動革命，推翻沙皇，代以共和政體。以下節錄小說片段：

每星期，報上必有如此公告：地方法院通告，今早十時在某上尉家中進行六名農奴拍賣，拍賣金額用以抵償某人債務。有意競標者可先參觀拍賣品……

這不是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的諷刺小說，而是常見的事實。

眾人興致昂揚，準備討價還價。拍賣品就位，競標者亦已集合。
一名拄著拐杖的七十餘歲老農奴，緊張地環顧四處，忖度自己的命

⁶⁷ 拉迪史契夫後為保羅一世下令釋放，但此書仍遭禁逾百年，期間以手抄本流傳。

⁶⁸ 同註 25，頁 251。

運將交到誰手中，會在哪裡度過餘生。老人服侍這家族業已兩代，隨老主人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拼死把受傷的主人背回來。戰後，他照顧小主人，數次將他保釋出獄。老農之妻年已八十，是小主人母親的奶媽，也是管家，始終盡心盡力地工作。他們的女兒已四十歲，是個寡婦，她照顧小主人，比他的親生母親周到。老農奴的孫女，十八歲，淚水流個不停。主人引誘她、威脅她，剝奪她的童貞，而今她懷中抱子，站在拍賣台上……

我心痛苦至極！把身上的錢給了這些可憐人，跑出拍賣場。在樓梯間，遇見一位外國朋友。

「怎麼了？你為什麼哭？」

「走！離開這裡！不要去當骯髒歷史的見證人！天啊！如果你曾為你國家販賣黑奴而忿忿不平，那麼求求你，別作這黑暗歷史的目擊者！」⁶⁹

此書拆穿女皇「開明人道」的形象，女皇怒指拉迪史契夫比普加喬夫更可惡。⁷⁰凱薩琳二世擔心引起社會不安。該書出版兩個月後，拉迪史契夫便被捕下獄，判處死刑，引起議論不斷，遂改判西伯利亞 10 年流放。1802 年，拉迪史契夫自盡而死。

⁶⁹ 本篇節錄自：А. Н. Радищ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7, ст. 161-164. 筆者縮譯。

⁷⁰ 同註 68，頁 252。

二、亞歷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一世時期：十二月黨人

凱薩琳二世之子保羅一世資質平庸，女皇原屬意的繼位者是其孫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801-1825），亞歷山大一世因此從小由女皇撫養，接受開明的啟蒙思想。1796年，女皇猝逝，未及宣佈繼位者，遂依慣例，由保羅一世繼位。保羅懷恨母親，許多政策反其道而行，平反許多政治犯，諾維科夫與拉迪史契夫因此獲釋。保羅一世雖未正式推翻凱薩琳的《貴族特權詔書》，但以各種名義削弱貴族特權。如貴族須服役、納稅，取消地方自治，削弱貴族權利，規定農奴每週工作不得超過三日等。另一方面又恣意贈送親信國有土地，導致居住其上的農民成為私人農奴。執政5年，全國農奴數目倍增。又屢屢無故爭戰，貴族、平民均怨聲載道，終引發政變而死，由亞歷山大一世繼位。

亞歷山大一世即位後進行改革，擬訂君主立憲與解放農奴方案，引起貴族不滿，不久又因拿破崙入侵，停止改革。然而，西方的自由信息已為朝野上下帶來振聾發聵的影響。十二月黨人事件（Восста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之前的起義皆為一般平民所領導，他們無知識、亦無任何政治勢力，因此很難有具體行動與影響。十二月黨人事件則由貴族知識青年領導，推翻專制、建立憲政國家、廢除農奴制度皆為其重要理念。

十二月黨人事件為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的產物。⁷¹十八世紀下半期起，俄國上層社會頻繁接觸西歐文化，不僅大批遣送留學生赴歐，延聘西方教師教導子女者亦所在多有。這些人都是早期法國人道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者。當西歐受啟蒙運動影響，產生一連串進步思想與劇烈社會改革之際，俄羅斯猶因地處偏遠，未領受啟蒙，而固守王權，一切落後。1812年俄法戰爭（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又譯衛國戰爭），俄軍為追擊拿破崙深入法國、普魯士、奧地利，從而親見歐洲社會。當時的歐洲雖因戰火蹂躪殘破不堪，啟蒙之風及理念仍感動俄國軍官與士兵。他們對西歐社會的「人權、自由與工業」印象最深。米哈依爾·馮維金（М. А. Фонвизин, 1787-1854）⁷²在其手記中紀錄了此段見聞：「由於戰爭期間駐紮在普魯士

⁷¹ 同註 19，頁 221。

⁷² 俄國少將（Генерал-майор），參與俄法戰爭，為十二月黨人之一。

與法國，我們這些年輕人開始習慣西歐文明，並印象深刻，大家將所見所聞與家鄉作比較。農奴制度、政府苛政、皇權……種種問題在知識青年心中激起強烈的反思。」⁷³回國後，他們傳述見聞，引起迴響。社會各界開始檢討各種問題，如農奴形成的國家負擔，政府組織是否應走向憲政體制，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等等。各種俱樂部及討論小組紛紛出現，更有部份青年加入共濟會，⁷⁴宣洩他們澎湃的改革理念。秘密團體—救世同盟（Союз спасения, 1816）亦在此情況下產生。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廢除農奴制度，推動君主立憲。經過一再爭論，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前者主張各種改革皆應通過教育，以穩定漸進的手段進行；後者則主張採取激進手段，直接除去沙皇，俾能立即推動改革。1818年，救世同盟改組為福利同盟（Союз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目標仍是推動各種改革，並強調培養知識份子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素養。福利同盟則認為教育是最佳手段，即兒童啟蒙時期便灌輸以道德、羞恥心和正義感等美德觀。這些主張再度引起激進派反對，1821年，福利同盟分裂成以聖彼得堡為中心的北社（Северный союз）與以烏克蘭為中心的南社（Южный союз）。

北社成員多是來自貴族階層的菁英軍官，主張溫和推動改革。創始者尼基塔·穆拉維約夫（Н. М. Муравьев, 1795-1843）曾編寫《憲法草案》（Проект Конституции），強調：「少數人享受所有權力，卻由多數人承擔義務……統治者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脫離法律管轄，是不合理的。假如法律公平，他們為何自己不遵守？假如法律不公平，為什麼強迫眾人遵守？」⁷⁵穆拉維約夫呼籲：「法律之前，所有俄國人民完全平等」，因此農奴制應立即廢除。北社希望藉由「受限制之君主權力」打造個人生命財產皆能受

⁷³ Anatole Mazour.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55.

⁷⁴ 共濟會（Freemasons）源於十七世紀英格蘭。至十八世紀，共濟會的組織遍及整個歐洲，十分活躍，極具影響力。早期領導人多為哲學家 and 牧師，他們致力於傳播牛頓、機械哲學以及自然神論的觀點。共濟會尋求某種普遍的宗教信仰，希望這種自然宗教能夠替代基督教的各種教條形式。其訓誡表達了啟蒙運動的理想：宗教寬容、人類普遍的兄弟情誼、理性、進步、完美以及人道主義價值觀。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共濟會是意圖支配世界的陰謀組織。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羅斯革命、以色列復國等歷史重大事件，皆由共濟會促成。凱薩琳女皇曾以共濟會是邪教叛亂份子為由，箝制、迫害文人，論文提及之諾維科夫即為一例。

⁷⁵ Н. М. Муравьев. Eds. and trans. W. J. Leatherbarrow and D. C. Offord. "A Project for a Constitution (Extract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Ann Arbor: Ardis Publisher, 1987, p.42.

到保護的社會，因此希望向英國看齊，保留君主政體，將其由無上皇權轉為立憲君主制。⁷⁶他們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並不特別強調階級間也應有平等權。北社除領導者尼基塔·穆拉維約夫外，並獲楚貝茲寇依親王（С. П. Трубецкой, 1790-1860）支持。南社成員以中、下級軍官為主，創立者為帕維爾·佩斯特爾（П. И. Пестел, 1793-1826）。涅齊津娜教授（М. В. Нечкина, 1901-1985）⁷⁷認為，佩斯特爾的理念，如推翻帝制、根除貴族階級與商業工會、消除國有土地，令人聯想列寧的無產階級政策與行動，⁷⁸因此佩斯特爾堪稱為列寧之前的先驅者。兩人同藉由激進手段，希望打破階級制度，進而重組現有政權，建立一無階級歧視之社會。他支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強調平民與貴族間不應有差異，因此除要求廢除農奴制度，也希望一併剷除貴族世襲特權。佩斯特爾言：「政府的角色是下達命令者，人民的角色為遵守命令者。政府為保障人民福利，有權命令人民遵守相關法規；同時人民既有義務遵守政令，也有權力要求政府的保護。」⁷⁹

1825年亞歷山大一世猝逝，一時無法確認繼承人，王位真空。此時，北社已擬藉「兵諫」強逼政府變更政體。計劃者之一楚貝茲寇依親王卻在12月14日（俄國舊曆）行事當天不知去向，北社頓時失據；南社則在遙遠的烏克蘭，無法響應。兵變迅速被新皇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825-1855）鎮壓，此即十二月黨人事件。對尼古拉一世而言，這只是一次奪權失敗的兵變。事實上，該事件非為奪權，而是上層貴族為下層農民怒吼，甚至慷慨赴義。因此十二月黨人受審時，拒絕承認是叛國者，他們強調自己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所作所為不為私利，只為國家。」⁸⁰許多十二月黨人被判流放，他們在西伯利亞生活艱苦，仍堅持繼續教育與文化的啟蒙理念。而這起事件確實震懾了許多俄國知識份子，使他們從消極的旁觀者，投入積極的行動。

細究十二月黨人失敗之因，除計畫不周外，未獲得平民響應亦為主因。十二月黨人雖為解除農民苦難而提出廢除農奴制度，但未提出詳細解釋及

⁷⁶ Leonard Schapiro. *R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n 19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89.

⁷⁷ 俄國歷史學家，曾任莫大教授。

⁷⁸ М. В. Нечкина, *Движе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55, ст. 175.

⁷⁹ Marc Raeff. *The Decembrist Movemen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6, p.125.

⁸⁰ 同註 22，頁 328-329。

執行方式。俄羅斯農民長期與土地共生，廢除農奴制度所能得到的「個人自由」於其毫無吸引力，相反地，農奴制度的廢除意味農民將失去土地之依存，必須另謀他職，當然亦非農民願意面臨的情況。在農民眼中，十二月黨人為貴族之屬，而貴族為欺壓農民者。長久以來，俄羅斯農民飽受地主貴族剝削，如今「貴族」聲稱欲予解救，不僅農民不解其意，亦無法接受。他們眼中唯一的救贖者僅有上帝的代理人—沙皇。實如列寧所言：「第一代嘗試改革俄國者為十二月黨人。然其視野狹隘，不知人民所求為何，因而與民眾漸行漸遠，未得民心。」⁸¹此外，雙方因政治理念不同導致疏於聯絡，北社起義時南社未即時響應。北社行動僅因沙皇軍隊開槍而全面停擺；南社接到消息後旋即起義，卻已是兩星期後，孤掌難鳴。不論是將希望放在「慈愛的沙皇」（a benevolent czar）身上的北社，或是將一切歸罪於資本主義與獨裁政權的南社，兩者同樣天真與盲目。⁸²十二月黨人事件為俄國史上重要轉捩點，參與者的風範鼓舞後人投入改革，由他們引進的進步思想也成日後斯拉夫派、西歐派之思想搖籃，更甚者，此亦為俄國史上首度由貴族知識青年領導之改革行動。此舉不僅標示「知識份子」之覺醒，亦是貴族階層與政府衝突的另一新階段。

⁸¹ Avrahm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p.102.

⁸² 〈The Decembrists 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Internet History Sourcebooks Project》. 2010.03.01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ayrapetova-dec.htm>〉

第參章 十九世紀：知識份子的演變

第一節 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化與社會

一、十二月黨人的影響

十二月黨人之一的別斯圖熱夫(А. А. Бестужев, 1797-1837)曾說：「我們解救歐洲(指俄國參與 1812 年俄法戰爭)，難道是為了給自己戴上鎖鏈？我們給予法國憲法，難道是為了自己無權談論憲法？我們以鮮血換取各民族的平等，難道是為了在自己家鄉備受屈辱？」⁸³這些問話不僅表達當時知識份子的情緒，也是知識份子向國家提出的疑問。無論政治或思想，1825 年都是關鍵年代。尼古拉一世的繼位開啟了集權高壓統治的序幕，同時，啟蒙思潮退去，德國浪漫主義與唯心哲學起而代之。儘管政府層層設防，西方思潮卻湧進俄國如故，尤以德國哲學最受年輕人歡迎。當時知識份子之熱愛德國哲學，主要原因有三：

- 一、由於法國啟蒙運動催生了法國大革命，因此尼古拉一世力抗法國思潮。尼古拉一世崇尚普魯士紀律化統治，也鼓勵俄國青年留德，未料留德學生並未習得普魯士的鐵腕精神，反將唯心哲學傳回俄國。
- 二、德國浪漫主義是啟蒙運動衍生的主觀思維。藉著浪漫主義，俄國興起泛神論，部份年輕人強調直觀的神秘世界，奉黑格爾哲學概念「現實皆合理，合理即現實」為圭臬，逃避不理想的現實社會。
- 三、俄法戰爭喚醒俄國民族意識，德國浪漫思想則發揚俄國的民族精神。尼古拉一世頒布「法定正統」(те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強調俄羅斯民族性，稱俄羅斯民族為上帝選民，⁸⁴

⁸³ М. Р. Зезина 等著，劉文飛等譯，《俄羅斯文化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上海：上海譯文，1999，頁 175。

⁸⁴ 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London: Penguin, 1994, p.120.

俄羅斯民族的落後與受苦都是未來邁向光明的保證，為上帝的選民必經之路。尼古拉一世欲藉此轉移人民對現況的不滿情緒，羅織美好藍圖，壓制國內的反抗思潮。

尼古拉一世敕平十二月黨人事件後，決定以高壓手段鞏固政權，嚴厲阻止顛覆性思想和行動。他認為，發生該事件的原因，並非農奴制度等社會問題引起人民反彈，而是中央政府政策鬆散，因此尼古拉一世決定重拾君主獨裁權力，嚴格管制動搖國家根本與社會治安的自由思想。此舉卻更使貴族青年不滿，人心動盪，尼古拉一世被迫尋找可與十二月黨人標榜之「自由主義」相抗衡的思想體系，因而提出「法定正統」，以東正教（православие）、君主專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及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三大信條與西方思想相對抗。「法定正統」由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烏瓦洛夫（С. С. Уваров, 1786-1855）提出，原為改革教育建議書中的教育原則，為尼古拉所採用，定為全民信條，任何法律政策與人民言論皆不可與之相違。烏瓦洛夫言：

俄羅斯人民自古維持忠誠的信仰……不信仰尊敬自己的祖先，個人與民族都將滅亡。……君主專制是俄羅斯生存的主要條件，俄羅斯屹立在此基石上。人民可能因生活環境及教育程度不同而疏遠政府，但眾人堅信只有仁慈的君主能保障俄羅斯人民的生命。……與此兩原則相連接的，正是我們的民族性。⁸⁵

對尼古拉一世而言，「法定正統」以「東正教」信條最為重要。東正教信仰不僅為人民的道德準則，也是保佑與解救俄羅斯危機的屏障。俄羅斯君主體制不僅是世俗傳統政權的延續，亦是維持東正教信仰的主要力量。⁸⁶在東正教信仰中，君主是人與上帝權威的中間人：「俄羅斯沙皇為絕對的至高君王，基於敬畏與自發的良知，上帝命人民尊崇沙皇的權威。⁸⁷」

「東正教」與「君主專制」相輔相成，兩相融合，形成俄羅斯「民族性」。烏瓦洛夫將「民族性」與古老信仰結合，將俄羅斯人民定位為上帝選民，

⁸⁵ 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 - 18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74-75.

⁸⁶ 同註 22，頁 341。

⁸⁷ Riasanovsky, op. cit., pp. 96-97.

是溫順、虔誠、不怨天尤人、能吃苦耐勞，也是最堅忍強韌的民族。強調民族性的同時，為提高俄羅斯民族的文化自尊心，尼古拉一世強調俄羅斯語言的特性與美妙。「羞於以俄語說話者，即是以祖先為羞；能思考卻不願說俄語者，是無根之樹。」⁸⁸尼古拉的三大「法定正統」，原為以之平息十二月黨人事件的統治手段，卻成為日後斯拉夫派的基礎，進而引發父輩論戰，為尼古拉所始料未及。

二、知識份子的搖籃：史坦凱維奇小組

尼古拉一世視哲學為革命的肇因，遂於 1826 年廢除莫斯科大學之哲學講座，但學生對哲學的熱衷並未消滅，於是組織討論小組，傳播德國哲學思維。討論小組並非正式組織，因求知慾、理想、友情，凝聚了當時的年輕人。別林斯基對此有這樣的描述：「社會環境未予吾輩完整教育，剝奪吾輩研習西方思想的可能性。我們仇視社會，一如社會輕蔑我們……討論小組成為我們的避難所。」⁸⁹

史坦凱維奇（Н. В. Станкевич, 1813-1840）在世僅 27 年，身後未留下傳世之作，然而在莫斯科大學及德國柏林大學組成的史坦凱維奇小組，成為十九世紀三〇年代俄國自由思想的重要力量。1831 年，史坦凱維奇就讀莫大期間，組織研究文學與哲學的讀書小組，其中成員的共同特色是：熱衷德國哲學，關注俄國現實問題，主張社會正義，倡導教育與科學，最終理想為廢除農奴制度。史坦凱維奇小組成員眾多，日後多為傑出教師、詩人、歷史學家、東方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後來斯拉夫派與西歐派要角，包括康·阿克薩科夫（К. С. Аксаков, 1817-1860）、格拉諾夫斯基（Т. Н. Грановский, 1813-1855）、巴枯寧、別林斯基。

史坦凱維奇小組偏重哲學討論，由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⁹⁰、黑格爾（Georg Hegel, 1770-1831）⁹¹為代表的德

⁸⁸ Ibid., p. 131.

⁸⁹ Martin Marlia. *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1812-185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59.

⁹⁰ 德國哲學家，唯心主義發展中期的主要人物，所處年代在費希特和黑格爾之間。唯心主義指，物自體（物體本身所有之屬性）的存在不受主體認識的形式所限制。反過

國哲學，風靡當時俄國年輕人，此小組的影響功不可沒。赫爾岑雖未加入史坦凱維奇小組，也深受啟發。日後的赫爾岑—奧加遼夫小組（кружок Герцена-Огарева）則以政治目的為主要取向，雖有異於偏重文哲討論的史坦凱維奇小組，然兩小組之根本思想相當接近。史坦凱維奇本人不擅寫作，散文與詩作皆難登大雅之堂，但其人反應敏捷，對當時德國哲學能融會貫通，辯才無礙。又人緣極佳，熱心引薦同儕接觸哲學，因而頗獲敬重，小組亦以其馬首是瞻。⁹²1837年史坦凱維奇出國養病，由別林斯基與巴枯寧領導小組運作。然思想活躍的史坦凱維奇身邊又聚集一派文人，屠格涅夫亦為其一，小組遂分俄國境內與境外兩組。無論何組，皆熱衷德國哲學，關注俄國社會問題，提倡教育，以廢除農奴制度為最終目標。1840年史坦凱維奇病逝義大利，小組缺乏領導人，終告解散。



來說，我們平常在客體中發現的屬性，取決於它們出現在主體面前的方式，而不是它們自身屬性。如何發掘物體獨立於主體經驗之外的真實屬性，就是唯心主義的基本問題。謝林在哲學史上有著無可爭辯的重要性，但因風格隱晦，沒有條理，使得研究謝林哲學困難重重，因此不如黑格爾學說受歡迎。

⁹¹ 黑格爾哲學為十九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運動的頂峰，對後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之歷史唯物主義皆影響深遠。史學家將黑格爾學派分為兩個陣營，右派擁護正統的宗教觀及政治保守主義；左派（亦稱「青年黑格爾派」）繼承黑格爾學說中的革命思想，主張無神論，宣揚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追隨者包括費爾巴哈、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及恩格斯。一八三〇、四〇年代，左派黑格爾信徒經常在柏林酒吧聚會高談，日後無神論、人文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利己主義的基本觀念於焉形成。黑格爾視絕對真理（absolute Wahrheit，或譯「絕對的真相」）為萬物之源。絕對真理並非超越世界，自然、人類社會與人的精神現象都是絕對真理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表現形式。事物的更替、發展、永恆的生命過程，就是絕對真理。

⁹² 〈Станкевич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портрете》. 2010.03.10
〈<http://www.rulex.ru/01181197.htm>〉

三、平民知識份子崛起

所謂平民知識份子主要是受教育的沒落貴族、地主及神職人員後裔，他們不屬於上流社會，但有機會接受比農奴更好的教育與啟蒙思想。這些知識份子被稱為 *разночинцы*，前綴 *разно-*說明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凱薩琳二世興建學校，卻禁止平民就學，唯恐平民受教育後不再服從管制，⁹³然十九世紀六〇年代的俄國社會出現許多沒落貴族，部份以教書維生，因而將知識傳佈至其他階層。十二月黨人事件發生後，尼古拉一世將五名具貴族身份的領導者處死，但依據 1762 年頒布的《貴族特權詔書》，死刑早已不能施行於貴族。尼古拉之舉觸怒貴族階層，他們開始疏離政府，與平民階層接觸。前文提過的史坦凱維奇雖出身貴族，但特別欣賞平民知識份子，對其提拔不遺餘力，別林斯基即深受其惠，以平民知識份子身份，為俄羅斯文學與社會帶來深遠影響。這些知識份子為舊制度與農奴解放後新階層的聯繫者，他們來自上層，生活在下層，因此縮小了知識份子與平民的鴻溝。

另一方面，研究俄國知識份子，應該對俄國的社會結構與變遷有所認識。西歐步入工業時代之際，俄國由於社會發展較遲，仍維持農奴制度。加上社會階級變動緩慢，俄國社會遲未能注入新血，導致發展停滯。下表⁹⁴將以俄國社會六個不同階級，說明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社會結構變動。

⁹³ 同註 25，頁 240。

⁹⁴ 表一與表二出自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ронов 原著，張廣翔等譯《帝俄社會史：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頁 117-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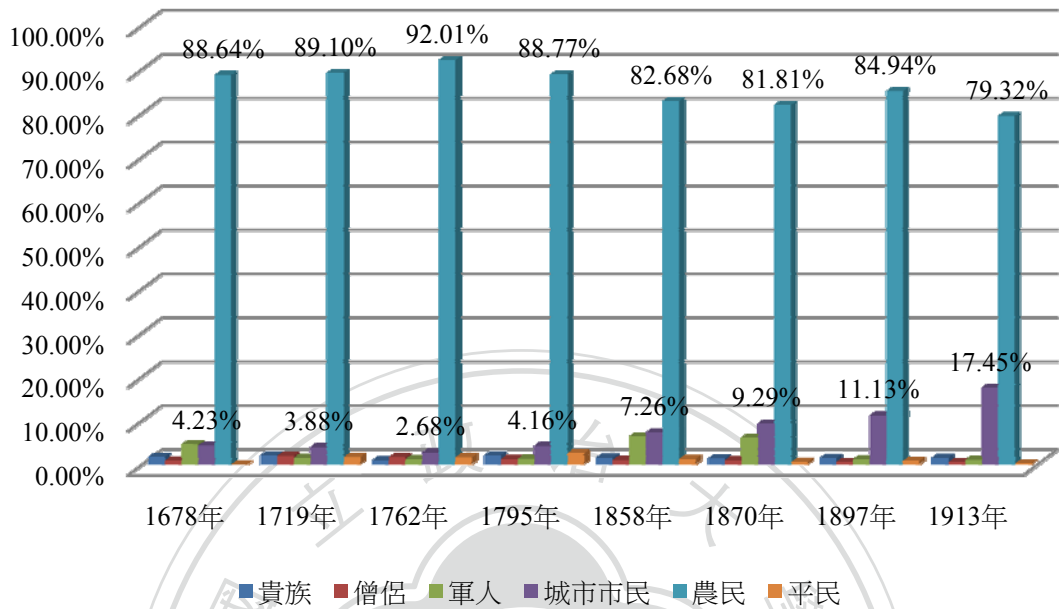
表一：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俄國居民社會結構

等級	1678年	1719年	1762年	1795年	1858年	1870年	1897年	1913年
	單位：千人							
貴族	158	304	212	720	889	861	1373	1936
世襲貴族	--	--	--	403	612	544	886	--
終身貴族	--	--	--	317	277	317	487	--
僧侶	80	280	370	434	567	609	501	697
軍人階級（含軍眷）	420	--	--	--	3767	3981	--	--
陸軍和海軍	80	219	273	449	927	704	1095	1320
城市市民	390	578	617	1482	4300	6091	10493	22716
農民	8180	13257	21175	31601	48953	53631	80081	103257
平民	--	240	366	911	730	383	738	258
總計	9228	14878	23013	35597	59206	65556	94281	130184

表二：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俄國居民社會結構（百分比）

等級	1678年	1719年	1762年	1795年	1858年	1870年	1897年	1913年
貴族	1.71%	2.04%	0.92%	2.02%	1.50%	1.31%	1.46%	1.49%
僧侶	0.87%	1.88%	1.61%	1.22%	0.96%	0.93%	0.53%	0.54%
軍人	4.55%	1.47%	1.19%	1.26%	6.36%	6.07%	1.16%	1.01%
城市市民	4.23%	3.88%	2.68%	4.16%	7.26%	9.29%	11.13%	17.45%
農民	88.64%	89.10%	92.01%	88.77%	82.68%	81.81%	84.94%	79.32%
平民	--	1.61%	1.59%	2.56%	1.23%	0.58%	0.78%	0.2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表三：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俄國居民社會結構
長條比例圖



(一) 貴族

貴族人數在彼得大帝與凱薩琳女皇時期呈倍數增加，之後逐年遞減。此因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期，彼得大帝進行大規模行政組織改革所致。彼得大帝自平民徵兵數萬人，供給文職，這些軍官只要終身服役，宣示效忠沙皇，即可成為貴族，因此貴族人數增加一倍之多。1772年凱薩琳女皇與德、奧協議瓜分波蘭，兼併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貴族因而激增五十多萬人。但貴族中也有失去領地與農奴，被剔除貴族身份者。此外，貴族人數逐漸減少原因，包括獲得貴族身份的門檻提高。彼得大帝時代只要成為軍官或文官，即屬於貴族；十九世紀中葉，除需具備文、武官身份，欲躍升貴族階級還需完成中高等教育，獲得勳章。

(二) 僧侶

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55-1881）宣佈解放農奴之時，也對社會政策做了修訂。1870年，亞歷山大二世取消僧侶繼承制，允許他們自由轉職，因此僧侶開始向其他階層流動。同時一般階層由於識字率不高，又

未必精研東正教教義，轉為僧侶比較困難，於是導致僧侶人數逐年下降。十九世紀三〇年代，政府更將不適任的僧侶除名，轉為政府文職人員或軍人、農夫、城市市民。這種僧侶流動對平民知識份子的形成甚為重要。基輔時代開始，識字是貴族與僧侶的特權，如今僧侶走向不同階層，則使知識廣泛普及。

（三）軍人

平民從軍，其家人隨之列入軍人等級，因此表中之「軍人階級」代表軍人與軍眷之總數。戰爭頻繁時，軍人人數隨招募增加。實行義務兵役制後，軍人階級則不復存在，軍人退伍回歸至原屬等級。

（四）城市市民

1775 年，俄國進行行政區改革，將 12 個大村莊改為城市，村民遂成市民。1785 年頒布「城市特權詔書」，城市數目持續增加。更因都市化與工業化，至 1913 年，市民人數已提高至 17.45%。

（五）平民

平民等級指因故脫離原等級，但人口普查時尚未列入任一等級者；另有部分平民是無官階的政府職員，他們具特殊法律地位，比農民和城市市民高，但不如貴族。平民是一種過渡階層，正常情況下，少有人一輩子是平民。

（六）農民

農民數目最多，且因不同政策的實施，比例也隨之增高或減少。1678 年至 1775 年農奴制度加強，且獲得許可向城市遷居的農民數量甚少，農民比重提高為 92.01%。後因「城市特權詔書」頒定，市民可在城市從事工商活動，農民朝向城市流動，農民人數遂因此減少，而城市市民人數增加。

十九世紀六〇年代以後，階級特權逐漸減弱，不同等級之間出現融合的趨勢，包括無領地貴族與有土地富農結合，官員與商人親近，貴族成為平民階層。1861年宣佈廢止農奴制度後，貴族失去對農奴的絕對控制權，法律上農民與市民平等；1874年實施義務兵制，貴族在內亦須履行兵役，貴族特權再度減少。十九世紀末，少數貴族以外，一般貴族的財富已和勤奮的小市民相差無幾，與勤奮的企業主相較則更形沒落。部份知識份子及商人甚至蔑視貴族，商人的自我認同度大幅提高。1899年，沙皇曾賜予作家契訶夫（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貴族身份與三級勳章，契訶夫本人卻羞於提起，少有人知，此插曲說明俄國人的社會意識確實已有重要變化：人的才能與勞動累積的財富，高於貴族虛位。⁹⁵

階級流動使平民知識份子人數增多，教育則為平民知識份子帶來文化力量。現代俄國科學院院士伊凡諾夫（А. Е. Иванов）在其專書《俄國大學生：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Студен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1999），針對大學生的數量做了詳細考察。十九世紀末期，大學生數量約為3萬人，1907-1908約八萬三千人，1913年約十二萬人，至1917年已有13萬5千人左右。其中，大學生的組成份子開始平民化。1900年，非特權等級出身的大學生佔全體大學生38.6%，至共黨革命前一年，人數已佔全體55%。當時的俄國，高等學府僅設立在大城市，湧入城市就讀的學生亦歸為市民。如表二顯示，至1913年城市市民已增至近18%，他們生活在上層與下層社會之間，理性受到上層人士啟發，也遠比鄉下人更有知識，卻同情城市的弱者與鄉下的農民，因此，起義與革命事件多由城市知識份子發動，行動比單純農人迅速有效。1917年，共黨革命後雖以消除階級為口號，但深植人心數百年的宗法制，非一夕可以拔除。殘餘的階級制度與新政權推行的「無等級」政策，加上開始有所思考的農、工及知識份子，彼此不相容的力量互相撞擊，為白銀時代所有知識份子生活的時代背景，亦是無法逃避的社會動盪。

⁹⁵ 同上註，頁131-132。

第二節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的世代

十九世紀，俄國的知識份子可分三代。第一代出現於十九世紀三〇至四〇年代，第二代於五〇年代登場，第三代活躍於七〇年代至二十世紀前二十年。白銀時代至共黨革命後，由於社會情況特殊，將於第四章專文討論。

一、第一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斯拉夫派與西歐派

俄國知識份子並不必然限定為某一特定階層或族群的讀書人，但第一代知識份子多出身貴族。他們有機會前往西歐留學或旅行，接受西方文學、文化與思想的薰陶，從而深刻思考俄國社會現象與問題。面對腐化的統治階級與受苦受難的百姓和農奴，人道主義引發知識份子的罪惡感和使命感，希望以行動尋找俄國人的真正幸福。他們組成各種小團體，如：史坦凱維奇小組、赫爾岑—奧加遼夫小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кружок Петрашевского），討論各種社會問題。他們被認定假探討哲學文化之名，批判政府，意圖進行暴力行動。184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21名會員被捕，判處死刑，其中包括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執刑前，杜斯妥也夫斯基被宣佈改判流放西伯利亞。

察達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 1794-1856）為第一代知識份子之一。他出生貴族世家，1812年中止大學學業前赴戰場。1829年，他的《哲學書簡》（*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1836）先以手抄本流傳，1836年正式出版。書中嚴斥俄國文化落後，政治與社會制度野蠻，人民迷信、殘酷。「我們一向不與其他民族同行……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成為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後期至四〇年代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主要話題。察達耶夫指出，俄羅斯地跨歐亞兩洲，卻自我封閉，若不學習西方文明，提昇文化水準，建立公正開放的社會，必入絕境。《哲學書簡》道出知識份子對俄國閉塞落後的深刻憂慮：「我們是從未被教導思考的兒童：當我們長大成人，發現被授予的知識只是世間表象，靈魂深處卻空無一物。」⁹⁶察達耶夫終以精神

⁹⁶ 〈Petr Chaadaev, Philosophical Letters Addressed to a Lady, 1829.〉, 《DOCUMENTS IN RUSSIAN HISTORY》2009.10.02

病為由被捕入獄，1856 年去世。但因他的影響，俄國知識界出現西歐派（западники）與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在日後的俄國文化史上發揮重要影響力。赫爾岑曾說，察達耶夫的《哲學書簡》如黑夜槍響，⁹⁷驚醒人們心中蛰伏已久的意識，開啟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辯論。

（一） 斯拉夫派

1. 斯拉夫派的中心思想

《哲學書簡》發表後，引起心懷強烈俄羅斯民族意識的學者及作家反抗，他們轉向俄羅斯傳統文化，強調俄羅斯的民族特性，進行哲學與神學思考。這些知識份子亦是熟讀西方經典的留學生，卻放下西方哲學著作，研究俄學。康·阿克薩科夫甚至執意穿著俄國傳統服飾、蓄俄式鬍鬚，表示對傳統文化的堅決支持，一時蔚為風潮，帶動斯拉夫派知識份子效仿。斯拉夫派極力讚賞俄羅斯民族美德，認為東正教是俄羅斯民族力量的來源、俄國希望之寄託。他們主張知識份子應接近人民，贏得民心，因為思想行動若遠離人民則失去意義，且所有行動必成廢物，無法幫助人民。⁹⁸

斯拉夫派奠基者赫梅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 1804-1860）歸納斯拉夫派的中心思想，包括：「村社」（община）、「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正教信仰（православие）等三特性。

- 一、「村社」：指古羅斯時期，建立在東正教基礎上的特有社會組織。因結合形式不同，分氏族村社（родовая община）、家族村社（семейная община）、比鄰村社（соседская община）。以氏族村社為例，指同氏族者自成村落，互助合作，必要時可聯合對抗外侮。村社採自治形式，經濟上自給自足，其概念類似「部落」。赫梅科夫認為，「村社」可以保障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和睦，為人

〈 <http://artsci.shu.edu/reesp/documents/radishchev.htm> 〉

⁹⁷ 劉文飛，《伊阿諾斯或雙頭鷹—俄國文學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對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11。

⁹⁸ В. А. Малинин 原著，丁履貴，郭鏞森譯，《俄國空想社會主義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 89。

民精神一統與內部社會合作的表徵，可避免階級仇視，避免俄國走向暴力革命。另一斯拉夫派成員伊·基列耶夫斯基（И. В.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856），對村社制度有精闢解說：「家庭服從於農村公社（мир），農村公社服從於村社大會，村社則服從於市民大會……。如此由小至大，各種小團體聚集在同一中心，服膺於東正教教會。」⁹⁹

二、「聚合性」：字根來自 собор，古代指「會議」，現代則指「教堂」，都是眾人聚合之地。「聚合性」為居民的自由結合，結合基礎為共同的愛與價值觀。¹⁰⁰它不強調外部的聚合，而是精神的凝聚與意志的統一，把「多」連結為「一」（единство во множестве），在愛上帝與互愛的基礎上合為一體。聚合性其實是村社宗教層面的體現。此概念後來被公認為俄羅斯教會與俄羅斯民族的重要特性，為斯拉夫派弘揚傳統，堅持民族獨特發展之路提供了理論依據。¹⁰¹索洛維約夫（В. С. Соловьёв, 1853-1900）以「聚合性」為復興東正教的重要依據，別爾嘉耶夫亦支持此論。

三、正教信仰：斯拉夫派強調東正教是俄羅斯獨有的崇高價值體系，面對西方，俄國享有精神與道德優勢。他們認為西方過份追求個人主義，推崇理性，而尋找真理不能全靠理性，應以精神為重。況且新教激進，不似東正教保存「內在精神的完整性」，在東正教的基礎上，才能創造真正的哲學，只有東正教能肩負復興人類文明的使命。

因斯拉夫主義者的鼓吹，彼得大帝時期被視為落後的村社與東正教轉而成為俄羅斯民族驕傲的特色與精神表徵。不過，斯拉夫派雖強調重視俄羅斯的文化傳統，卻並非要返回彼得大帝之前的古羅斯文化。此外，他們雖指責彼得的改革過份傾向西化，卻並非一味否定西方文明，他們也鼓勵學習對俄羅斯文化有益的文明。

⁹⁹ 同註 18，頁 139。

¹⁰⁰ Chris Matthew Sciabarra and Ayn Rand. *The Russian Radical*.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8.

¹⁰¹ 同註 97，頁 43。

2. 代表人物

「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一詞始於尼古拉一世時期，славяно 意「斯拉夫的」，後綴 фил 有「愛好者」之意。斯拉夫派與西歐派兩派爭論時，西歐派挑出此詞，扣在斯拉夫派身上，原是嘲笑對方只知熱衷斯拉夫舊俗；同樣地，「西歐派」(западники)亦是斯拉夫派所造之詞，也有諷刺對方之意。

為斯拉夫派奠立具體的理論基礎者，則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知識份子：赫梅科夫、伊·基列耶夫斯基、康·阿克薩科夫。晚期的思想繼承者包括梅列日科夫斯基、別爾嘉耶夫、弗蘭克(С. Л. Франк, 1877-1950)等人。

(1) 赫梅科夫 (А. С. Хомяков, 1805-1860)

赫梅科夫出身貴族家庭，年少時接受良好教育。1822年，18歲的赫梅科夫入伍，結識了後來的十二月黨人，但未參加他們的組織與活動。1828年，赫梅科夫參與俄土戰爭，戰後投注心力於文學創作。三〇年代末期，他關注歷史、哲學與神學，寫了一些文章，表達自己的理論與看法。別爾嘉耶夫曾在〈哲學家赫梅科夫〉(“A. S. Khomyakov as Philosopher”, 1904)一文中提及：「赫梅科夫被公認為斯拉夫派領袖，其風範不僅為時人推崇，亦受對手尊敬。他博學多才，集哲學家、神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與詩人身份於一身。他活躍於十九世紀四〇年代，才能非凡。」受察達耶夫《哲學書簡》影響，赫梅科夫思考出系統化的斯拉夫派理論。1839年完成〈論舊與新〉(“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1839)一文，是斯拉夫派思想最早的完整表述。文中闡述斯拉夫民族的根源、俄國與西方的關係、東正教在俄國的歷史地位，彼得大帝的改革措施，是斯拉夫派思想的重要綱領。

依赫梅科夫之見，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主要不同，在於雙方對俄羅斯的認知差異。前者認為俄羅斯農村生活美好，城市秩序井然，司法公正；後者則認為俄羅斯毫無價值，到處充斥粗野、無教養的人民。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文化可以成功帶領國家走向美好的未來，無須借鏡其他民族的發展經驗，更無須學習西方文明；西歐派認為俄羅斯一無是處，唯有學習

西方的經驗與文明，才能拯救俄國。赫梅科夫指則稱道俄羅斯傳統之美，也指出落後之處；雖見西歐文明的優點，但仍強調：「俄羅斯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能遺棄自己的美好傳統。倘若執意一切學習西方，不僅不符合人民意志，且有可能如西方社會漸趨敗壞。」¹⁰²

赫梅科夫對察達耶夫《哲學書簡》的觀點不表認同，認為與西方相較，俄國有更多長處。俄國雖然飽受文盲與專制之苦，但俄羅斯民族的「正義」與「互愛」是走向光明未來的重要力量。¹⁰³五〇年代起，赫梅科夫特別關注宗教問題。他捍衛東正教的正統地位，批判天主教和新教，認為他們傾向個人主義與物質，在內心靈修與接近上帝的努力上遠不如東正教徒。赫梅科夫強調，俄國人應繼續以正教信仰為生命哲學的基礎。由此可知，其斯拉夫派理論帶有濃厚宗教色彩。



¹⁰² 同註 18，頁 135。

¹⁰³ 同註 97，頁 41。

(2) 康·阿克薩科夫 (К. С. Аксаков, 1817-1860)

康·阿克薩科夫被同時代人譽為「斯拉夫派的別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是重要的斯拉夫派文學批評家。阿克薩科夫父子三人皆為作家，且同屬斯拉夫派。當時莫斯科有所謂「阿克薩科夫周六聚會」(Аксаковские субботы)，文人名流常來聚會。三〇、四〇年代，阿克薩科夫的家成為斯拉夫派的沙龍。康·阿克薩科夫是長子，就讀莫斯科大學時，曾與別林斯基共事，參與報刊雜誌的編輯工作。他傾慕德國，曾全心投入德語詩歌翻譯。不久，他在友人處接觸赫梅科夫的〈論舊與新〉，於是改變想法，轉而投入斯拉夫派。

1842年，康·阿克薩科夫發表〈論果戈理小說的《奇奇科夫遊歷》，又名《死靈魂》〉(“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поэме Гоголя *Похождения Чичикова, или Мёртвые души*”) ¹⁰⁴，讚譽果戈理的小說如荷馬史詩，對俄國生活有「史詩般」的敘述。在《當代文學概觀》(*Обозр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57)中，他對裘契夫(Ф. И. Тютчев, 1803-1873)、屠格涅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及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都有高度評價，讚譽他們努力不懈追尋俄國人的生活真理，充分表現了「土地與人民共存」的思想。由於斯拉夫派沒有自己的印刷所，也沒有專屬刊物，康·阿克薩科夫的文章長期遭禁，直至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才得以完整發表。因此他雖被稱為「斯拉夫派的別林斯基」，影響力卻無法與別林斯基相提並論。

不同於赫梅科夫，康·阿克薩科夫未從宗教觀點闡釋斯拉夫派思想，而是從俄羅斯民族性著手。他曾在文章〈論俄羅斯觀點〉(“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 1856)中，以斯拉夫派立場對「民族觀」(народное воззрение)與「世界觀」(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воззрение)做出回應。當時有人針對「世界觀」激辯，認為知識份子的眼界不應拘泥於民族觀，而應放眼全人類，並以此為題，討論俄羅斯的觀點究竟是「民族觀」或「世界觀」。此辯論自然將矛頭指向強調民族性的斯拉夫派，康·阿克薩科夫對此發表意見：

¹⁰⁴ 別林斯基與康·阿克薩科夫皆發表過評論《死靈魂》之文章，兩者文章標題相同，並為同年發表。

……難道強調「民族觀」，就是排除「世界觀」嗎？正相反！我們常說：這是英國文學，那是法國文學；這是德國哲學，那是希臘哲學。為什麼從未有人以此說法為不妥？不論文學、哲學，如果我們強調這是「英國的」、「德國的」……難道就不是強調所謂「民族性」？如果別的民族能夠自豪於「自己的」文學，為何俄羅斯不能這樣稱呼自己的文學？若別國強調「民族觀」的同時不妨礙其「世界觀」的發展，為何在俄羅斯，「民族觀」成了邁向「世界觀」的障礙？

以文學為例，提到荷馬（Homer）¹⁰⁵ 史詩《伊里亞德》（*Iliad*, 725 or 250 B.C.）¹⁰⁶，眾人公認為全世界共享的文化，也認可其為希臘文學。談到詩人莎士比亞，誰不認為他的作品屬於全人類的傑作，又有誰能否認他不是英國文學的一部分？誰說「民族觀」與「世界觀」不能並存？¹⁰⁷

康·阿克薩科夫強調，斯拉夫派既強調俄羅斯民族性，同時贊同知識份子應發展「世界觀」；西歐派主張學習西方，卻摒棄俄羅斯民族觀，實為放棄「世界觀」的始作俑者。

¹⁰⁵ 荷馬為傳說中的盲眼詩人，據傳史詩《伊里亞德》與《奧德賽》（*Odyssey*, about 7th century B. C.）皆為其作品。生卒年不詳，一說此人約存於為西元前 850 年，一說此人應生存於西元前九世紀至八世紀間，眾說紛紜。

¹⁰⁶ 《伊里亞德》為希臘兩大史詩之一，敘述希臘邦聯攻打伊里昂（Ilium）城之故事。傳說此役一戰十年，《伊里亞德》僅述最後幾星期發生之戰事。一般人熟知之「木馬屠城記」即出於此。

¹⁰⁷ 〈Классика: Акса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 《Lib.ru》. 2010.03.09. 〈http://az.lib.ru/a/aksakow_k_s/text_0150/shtml〉

（二）西歐派

1. 西歐派的中心思想

斯拉夫派與西歐派互為因果，全盤西化說催生了斯拉夫派，斯拉夫派固守傳統文化的主張也孕育了西歐派。「西歐派」一詞源自斯拉夫派的批評，後來成為與斯拉夫派意見對立者的代稱。¹⁰⁸西歐派的主要觀點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 一、徹底否定農奴制：對西歐派而言，農奴制度是社會不公正，也是俄國落後的根由。斯拉夫派也否定農奴制度，但兩派對於應以何種制度取代農奴制度，則有根本的分歧。斯拉夫派主張返回農奴制度以前的村社制度，西歐派則認為村社制度將農民束縛於土地上，藉此強迫他們納稅服役。他們認為，解放農奴是為了創造開明人道的社會，因此不需要再創造另一制度取代農奴制度。
- 二、全盤西化：西歐派檢視俄國的歷史，認為俄國本質野蠻，西方之路才是俄國的救贖。相對於斯拉夫派之重視俄羅斯民族性，西歐派認為世界文化高於民族文化，俄羅斯應擺脫民族文化的狹隘藩籬，西歐是文明的領先者，西方社會的自由才是人類真正的理想。此外，他們也推崇西方的政府組織、經濟結構與城市生活，俄國必須師法西方才能解除困境。別林斯基曾在寫給果戈里的信中說：

俄國尋求拯救之道不能仰賴神秘主義，亦非禁欲主義，更非虔敬主義，而應仰賴文明、啟蒙教化與人道主義，服從法律和正義。俄羅斯需要的不是說教與禱告，而是健全的理智及正義，及與其相應的法律。俄羅斯需要喚起數世紀以來淹沒在污穢與垃圾中的人性

¹⁰⁸ А. Н. Николюки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НПЦ, Интелвак, М., 2001, ст. 276.

三、社會體制：西歐派以「國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與斯拉夫派的「村社」對立。強有力的統一國家應以嚴格的司法體制為基礎，以及自上而下貫徹實施的法令，才能邁向進步。並主張應效法英法國家體制，以德國理性哲學為圭臬，強調理性思辯的精神及對宗教的懷疑。受費爾巴哈(L. A. Feuerbach, 1804-1872)《基督教本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841)影響，俄國不少西歐派知識份子成了無神論者。

2. 代表人物

(1) 赫爾岑 (А. И. Герцен, 1812-1870)

赫爾岑出生莫斯科貴族家庭，家庭教師之一是法國人，曾參加法國大革命。在家庭教師薰陶下，赫爾岑從小對「自由」有模糊的憧憬，經常閱讀被當局查禁的書籍。三〇年代初期，就讀莫斯科大學時因參與地下政治活動，於1834年被捕。1835年流放西伯利亞，1842年才獲准返回莫斯科。此番經歷不僅為其日後寫作素材，也使赫爾岑的改革理念更加堅定。返回莫斯科後，即在雜誌上發表哲學性論文及以自然科學為題之文章，對俄國文藝界產生重要影響。

赫爾岑在1846至1848年間發表兩本中篇小說《柯魯柏醫生》(*Из записок доктора Крупова*, 1846)、《賊鵲》(*Сорока-воровка*, 1848)和長篇小說《誰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6)，皆從社會批評出發。別林斯基曾言，其小說的哲學性高於藝術性，即為對傳統的挑戰。¹¹⁰赫爾岑最重要的作品是《誰之罪?》，題目發人省思。《誰之罪?》情節簡單，卻成功塑造俄國社會三種不同代表人物的悲劇。青年貴族貝爾托夫(Бельтов)才能卓越，理想遠大，卻沉湎於幻想，無法在社會上施展抱負，成了「多餘人物」(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正直、善良的平民知識份子柯魯齊佛斯基

¹⁰⁹ 同註18，頁142-143。

¹¹⁰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2007，頁132。

(Круциферский) 一貧如洗，但相信生命積極面，追求自由與幸福。他及妻子柳芭(Люба)與貝爾托夫之間發生難解的三角戀情，終於走向悲劇性的結果。這是誰的過錯？赫爾岑雖未指明，但暗示了社會的責任。關於這部小說在以下赫爾岑的著作中將作較詳細的解說。

1847年3月，父亡，赫爾岑繼承大筆遺產後僑居法國。1848年法國發生二月革命，赫爾岑熱烈支持，自詡為革命家，為俄國政府通緝。法國革命失敗後赫爾岑被逐出境，先往羅馬、後至瑞士，再到尼斯(今法國南部城市，1860年前為薩丁尼亞王國領地)。這段期間，他發表了不少政治作品，這些後來都成為民粹派的理論基礎，其中以〈來自彼岸〉(德文版“Vom anderen Ufer”，1850)；俄文版“С того берега”，1855)最受重視。〈來自彼岸〉陳述了他對自由的定義與信念，同時諷刺歐洲革命者徒具熱情，行動常因缺少計畫而失敗，呼籲以清晰冷靜取代盲目的熱情。¹¹¹1852年，妻子因病過世，隔年赫爾岑移居英國，滯留十年。

針對俄國境內日益嚴苛的審查制度，他與幾位在英俄國僑民經營一家出版社(自由俄羅斯印刷廠，Вольная рус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專印俄國國內無法公開出版的書籍雜誌。1855年，赫爾岑與奧加遼夫(Н. П. Огарёв, 1813-1877)¹¹²自費籌辦《北極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雜誌，大量刊載十二月黨人的回憶錄，以及各種被俄國政府查禁的作品。雜誌由海外經各式管道進入俄國，獲得青年知識份子極大迴響，進而形成日後的民粹主義。數年後，民粹主義演變為以暗殺主導的恐怖行動，卻是赫爾岑始料未及的。《北極星》外，尚有俄文週報《警鐘》(Колокол)，以冷靜、穩重的筆調條理分析俄國政治與社會缺失，宣揚解放農奴，沙皇甚至將其列為施政參考。1861年沙皇宣佈解放農奴後，此報影響力漸衰。

1860年代，赫爾岑參加秘密團體「土地與自由」(Земля и воля,

¹¹¹ 同註 110，頁 134。

¹¹² 奧加遼夫為赫爾岑摯友，結識於莫大，為同社團成員。1834年遭流放，40至46年旅居德國。1850年被捕，旋釋回，1856年移居倫敦，與赫爾岑合開出版社、出版俄文週報《警鐘》及雜誌《北極星》。奧加遼夫提出俄國社會主義概念，為赫爾岑所發揚，是民粹主義思潮之推手。1860年，與赫爾岑一同加入秘密團體「土地與自由」，與巴枯寧一同宣傳革命思想。

1860-1861)，並與同時僑居國外的巴枯寧互通聲息。1870年，赫爾岑病逝巴黎，葬於尼斯。十九世紀後期，身為貴族卻能挺而為民發聲、公開宣揚自由思想者，赫爾岑可謂第一人。有人因而尊他為俄國貴族革命家代表。¹¹³其思想為同時代青年注入了活力，也大大影響了民粹主義者。

A. 思想

1840年代，赫爾岑與當時極富盛名的史坦凱維奇小組及別林斯基小組成員交往。當時，赫爾岑、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及赫梅科夫，都是知識界的風雲人物，在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爭論得沸沸揚揚之際，他們的思想也在知識青年身上紮根。西歐派的別林斯基與赫爾岑是黑格爾的追隨者，認同黑格爾的哲學命題（тезис）¹¹⁴，並以之解釋俄羅斯的社會現象。當時俄國社會普遍流行研究哲學，除黑格爾外，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¹¹⁵、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¹¹⁶、卡博（Étienne Cabet, 1788-1856）¹¹⁷、路易·伯朗（Louis Blanc 1811-1882）¹¹⁸等人之理念，亦傳播至俄國社會，為各文學、哲學討論小組的研究課題。史坦凱維奇小組許多人熟識赫爾岑與奧加遼夫，日後成為西歐派一員。小組其他成員則形成斯拉夫派，以赫梅科夫、伊·基列耶夫斯基馬首是瞻。儘管日後兩派爭論不斷，但兩者關係密不可分。赫爾岑曾言：「我們（指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猶如雙面亞努斯（Янус）¹¹⁹，雖各自注視不同方向，然本心跳動為一。」¹²⁰

¹¹³ 沐濤，《俄羅斯史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頁152。

¹¹⁴ 此哲學命題為：「現實皆合理，合理即現實。」

¹¹⁵ 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經濟哲學家，為第一位自稱「無政府主義者」。

¹¹⁶ 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空想主義者。批評資本主義，希望建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一致的社會。提出以婦女解放為指標，可衡量人類社會解放之程度。

¹¹⁷ 卡博（Étienne Cabet, 1788-1856），法國哲學家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伊卡里亞行動（Icarian movement）發起者。此行動始於1848年，終至1898年，初由卡博率領僑民前往美國，以建立烏托邦社會為目標。

¹¹⁸ 路易·伯朗（Louis Blanc 1811-1882），法國政治家與歷史學家。其言：「每人依其所能生產，依其所需消費」為共產主義之理念奠下基礎。

¹¹⁹ 亞努斯為羅馬神話中之雙面門神，傳說羅馬士兵出征時都要經過刻有亞努斯頭像之城門，為日後凱旋門由來。亞努斯一臉朝向過去，另一臉望向未來，因此亦掌管時間之門，英文一月（January）即源於此字根。

¹²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Единое

日後別爾嘉耶夫也在其《俄羅斯思想：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1946)一書中說：「兩派都熱愛自由，都熱愛俄羅斯。但斯拉夫主義者將她（俄羅斯）視作母親，西方主義者視她為孩子。」¹²¹

1847年，赫爾岑移居國外，但其言行仍影響俄國境內的知識份子。五〇年代以後，他的思想轉為漸進（*gradulist*）。六〇年代，甚至放棄以暴力改善社會的信念，因此與巴枯寧越行越遠。激進主義者攻擊赫爾岑，說他不願看到社會改變。赫爾岑反駁，只有循序漸進的改變，才能成功改造社會。赫爾岑曾短暫加入俄國自由主義者發起的「農民覺醒運動」¹²²，也曾在《警鐘》呼籲俄羅斯各階級團結。不過1863年，因為自由主義者牽連入波蘭革命，與赫爾岑斷了聯繫，連帶造成了《警鐘》讀者群流失。1867年，《警鐘》停刊。

八〇年代民粹主義興起，赫爾岑在著作中加入了平均地權的觀念，以為社會結構的基礎。雖然他的著作與理念影響了許多民粹主義及激進主義者，但他天性不適宜為革命領導人。他思想多變，而革命者最需要的是不變的信念。他無法理解狂熱躁進的思想，也從來不是這些人的一份子。民粹主義領導人之一契尼謝夫斯基與朵布羅留博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曾試圖拉攏赫爾岑，要求赫爾岑以《警鐘》宣揚民粹主義，但遭拒絕。赫爾岑認為，俄羅斯人民尚未成熟到能真正改變政治現況：「是的，你們追求幸福！但須知只有戰勝取得的幸福才是真實的幸福！你必須夠堅強，才能得到它。」¹²³赫爾岑擔心即使革命成功，不成熟的新政府將重蹈覆轍，成為另一個獨裁政體。列寧後來讚揚赫爾岑的言行教導了許多

Окно》，2009.12.30 〈http://window.edu.ru/window/library?p_rid=38403〉：

«Мы, как двуликий Янус, смотрели в разные стороны, но сердце у нас билось одно.»

¹²¹ 同註2，頁39。

¹²² D. Offord. *Portraits of Early Russian Libera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p. 200.

¹²³ A. Herzen.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Vol IV.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8, p. 1753.

俄國青年，為俄羅斯革命奠定基礎。¹²⁴事實上，赫爾岑一心追求的革命與共黨革命相去甚遠。

B. 著作

三〇年代，赫爾岑即開始以「伊斯康德」(Искандер)為筆名發表作品。流放歸來至 1847 年離開俄國以前，他的文章充分表達對古板學究與拘泥形式者的不滿。他不喜學院派，厭惡一心出世卻無所作為者，嘲諷寂靜主義 (Quietism)¹²⁵為無物。1846 至 48 年間，赫爾岑出版了小說《柯魯柏醫生》、《賊鵲》與《誰之罪？》，此三本小說雖無高度藝術價值，卻開啟社會批評融入小說的先例，也是俄國寫實小說之始：

俄國寫實小說沒有自然主義的偏頗，不認為生命只見黑暗與醜陋，人類非至善或至惡，在不同社會階層中，都有幸與不幸。作者的任務是描寫真實的人類世界，不必刻意美化或醜化。……所以寫實作家的重要原則是：題材完全取自真實世界。特別是長篇小說作家，必須對真正存在的問題有深切體會，將真實的感情反應清晰明確地表現出來。……俄國寫實文學因此幾乎都具備兩大特色：社會性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與平民化 (гражданский)。¹²⁶

如前所言，赫爾岑的長篇小說《誰之罪？》引發知識青年的熱烈討論，因為其中不但討論了「自由」，亦觸及家庭關係、女人在婚姻中的地位等等。此外，「多餘人物」貝爾托夫，也引起年輕人關注。

家境貧寒的平民知識份子柯魯齊佛斯基大學畢業後，到退休將軍家當家庭教師，並與將軍私生女柳芭結為連理。婚後兩人生活雖然清貧，但平靜融洽。一日，柯魯齊佛斯基學生時代舊友貝爾托夫來到他與柳芭居住的

¹²⁴ Avrahm Yarmolinsky ed. *Russians: Then and Now*.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p. 66.

¹²⁵ 寂靜主義 (Quietism)，十七世紀基督教哲學。寂靜主義者認為，哲學無法為人類釐清生命之意義，只會令人迷惑。因此，寂靜主義之目的在消除語言學與形而上學之框架，帶領人們走出哲學的迷思。

¹²⁶ 同註 110，頁 131-132。

城市。貝爾托夫出身貴族，為人熱情正直，知識廣博，極富才幹。在啟蒙思想影響下，他不滿現實，渴望有所作為。青年時代，有人曾預言貝爾托夫將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然而，他的抱負及理想在接觸現實社會後，便消磨殆盡。他涉獵醫學與繪畫，也作過許多事，卻一事無成。十年後，他依舊無法為自己找到出路。貝爾托夫決定回故鄉參加選舉，然而其言行引起當地士紳不滿，因而敗選。他對城內的庸俗生活深感失望，此時，遇見了老友柯魯齊佛斯基。對貝爾托夫而言，與柯魯齊佛斯基一家相遇像發現新天地一般有趣，尤其柳芭熱烈、豐富而又高尚的精神世界強烈地吸引著他。不久，貝爾托夫承認自己愛上柳芭。柳芭也為貝爾托夫所吸引，她開始思考問題，變得更成熟。然而，柳芭的內心充滿矛盾與痛苦。一方面，她仍愛丈夫，但他缺乏她渴望的某種東西；另一方面，她明白貝爾托夫需要的不是愛，他只希望在愛情中尋找精神寄託。同時，柯魯齊佛斯基也察覺貝爾托夫與柳芭之間的關係，因而痛苦萬分。貝爾托夫臨走前，與柳芭互訴衷情。貝爾托夫啟程離去，等著他的仍是灰色無望的人生。柳芭則一病不起，留下柯魯齊佛斯基憂傷度日。

作者雖未為結局下一註釋，然「誰之罪」猶如口號般，在讀者心中迴響。他們為主角憤恨難平，認為應振興俄國社會，百姓方能擺脫《誰之罪？》的悲劇。

赫爾岑僑居巴黎時，適逢法國大革命前夕。蓬勃高漲的革命情勢使赫爾岑對歐洲和俄國的未來產生樂觀憧憬，但他也抨擊西歐社會的資產階級及墮落的道德生活，因此與大多數西歐派產生嫌隙。法國大革命後，赫爾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作為不滿，認為他們出賣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來自彼岸》表現了他的失望與對歐洲命運的擔憂。五〇年代，赫爾岑的作品除《來自彼岸》以外，另有《俄羅斯世界與革命》(原為法文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1851; 後譯俄文，書名改為 *Le Monde russe et la Revolution*, 1860)，向歐洲讀者介紹俄國人民的反抗思想。同時期赫爾岑的「俄國式社會主義」理論已驅成熟。他主張，社會主義思想比較適合俄國人民，俄國由來已久的村社制度是「社會主義的雛型」，消滅政治專制及取消農奴制度，社會主義的理想便能在俄國實現。此學說是後來出現民粹運動的先聲，也影響了列寧的社會主義理論。

《所見所思》(*Былое и думы*, 1852-1855, 大陸譯《往事與隨想》) 是赫爾岑的自傳，不僅忠實記載他的一生，他並自言是「歷史在一個人身上的反映」，涉及的歷史事件包含 1812 年俄法戰爭，十二月黨人事件，四〇年代俄國知識分子的生活與思想，1848 年法國革命，五〇年代俄國流亡者的活動與派別，及六〇年代俄國社會的政治面貌。赫爾岑的貴族身份使他從小生活於上流社會，流放經歷卻使他得以接觸販夫走卒，使此書如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僑居海外期間，他親見 1848 年歐洲民主運動的波瀾，也目睹革命失敗後的景象。赫爾岑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描繪並評價這些事件。他說，作家首要之務是社會責任，是人類社會事業的一部分，因此《所見所思》中，政論性和哲學性議題隨處可見。



(2) 巴枯寧 (M. A. Бакунин, 1814-1876)

巴枯寧出身貴族，曾任軍官，1835年入莫大哲學系，加入史坦凱維奇小組，一同研究當代德國哲學。他們先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¹²⁷學說為探討主題，後又熱衷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¹²⁸、黑格爾等人學說。1839至40年，結識赫爾岑、奧加遼夫、阿克薩科夫。受赫爾岑影響，巴枯寧亦開始研讀黑格爾的作品，也在此時，他的「泛斯拉夫主義」(панславизм)¹²⁹思想逐漸成熟。1840年前往柏林，加入當時激進的學生組織「左翼黑格爾」(Left Hegelians)。

1842年，巴枯寧發表〈德國反動派〉(“The Reaction in Germany”, 1842)，為革命註解：「破壞之激情即創造之熱情！」¹³⁰巴枯寧在這段時期閱讀了羅倫茨·馮·史坦(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¹³¹的《現代法國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Der Soc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1842)。此書闡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概念，巴枯寧因此對社會主義產生極大熱忱，積極宣揚革命理念。青年馬克思亦受此書啟發，日後以此為綱領寫下著名的《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48)。俄國政府沒收其財產，巴枯寧逃往瑞士，後至布魯塞爾、巴黎等地。184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剝奪巴枯寧的貴

¹²⁷ 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亦為最後一位隸屬於啟蒙時代之哲學家。康德認為知識為人類透過感官與理性分析所得。經驗對知識之產生是必要的，但非唯一要素。將經驗轉換為知識需要理性，而理性為人之天賦。人類通過理性獲得外界經驗，沒有理性就無法感知世界。但他亦察覺，事物本身由不同人感受，所得不相同，因此人永遠無法確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¹²⁸ 德國唯心主義奠基者之一，被視為康德與黑格爾之間的銜接者。他曾發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1807)，主張將猶太人驅逐出德國，因而被視為德國國家主義之父。

¹²⁹ 泛斯拉夫主義為一文化及政治用語，指聯合全斯拉夫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語言體系。此觀念形成於十八世紀末期，由當時被奧匈帝國統治的捷克與斯洛伐克知識份子提出。一八七〇年代，數位斯拉夫主義學者再次提出此概念，與巴枯寧熟識之阿克薩科夫為其中一員，巴枯寧因此深受影響。

¹³⁰ 〈On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Polish Insurrection of 1830- Mikhail Bakunin 1847〉,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10.01.12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47/poland-speech.htm>〉

¹³¹ 德國經濟、社會學家，曾任日本明治天皇顧問。其保守政治觀，亦對1889年明治天皇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有深遠影響。

族特權與公民權，並沒收其土地。巴枯寧發表一封公開信，呼籲俄國與波蘭應追求民主。¹³²1847年，巴枯寧針對「十一月暴亂」(Ноябрь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¹³³一事發表演說，呼籲波蘭與俄羅斯人民共同團結對抗俄羅斯帝國。

經過多年流亡，巴枯寧於1849年被俄國以參與謀反為由，於德勒斯登被捕。遣送回俄後入獄彼得一保羅要塞，1857年，流放西伯利亞途中脫逃出境。旅英期間，與赫爾岑、奧加遼夫共同經營俄文週報《警鐘》。巴枯寧於1868年加入第一國際(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трудящихся，又稱國際工人聯合會)。巴枯寧反對私有財產，但也堅決反對同為第一國際成員的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及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872年第一國際大會中，巴枯寧派與馬克思派意見衝突，巴枯寧被開除會籍。

巴枯寧承續無政府主義之父普魯東的思想，但與普魯東不同，巴枯寧認為，無政府社會唯有以暴力推翻現有體制才能實現。他還提出集體無政府主義(Анархо-коллективизм)¹³⁴，深受俄國激進派青年歡迎。

¹³² E. H. Carr. *Michael Bakuni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139.

¹³³ 又稱「1830年波蘭暴動」(Поль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830 года)。此為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人的聯合武裝行動，爭取脫離俄羅斯帝國之附庸統治。事件發生於1830年華沙，波蘭民眾群起響應，數次取得地方性勝利，終不敵帝俄正規軍隊，1831年即被收平。

¹³⁴ 「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等等名詞都源于希臘文「an archos」意為「無法規狀態」。1840年，法國政治評論家及社會主義者普魯東在《何為私有財產》(*What Is Property?: or,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1840)一書中首次自稱「無政府主義者」。他說，真正的社會規則應由社會本身產生，與權力無關。他並預言權力終將消亡：「凡手環吾身控制我者，皆為盜匪暴君之屬，余將對其宣戰！」(Whoever lays his hand on me to govern me is a usurper and tyrant, and I declare him my enemy.)。普魯東被稱為「和平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相信，在現有社會制度基礎上可以建立新的社會組織。雖然他在《何為私有財產》中稱「私有財產即為盜竊」(Property is theft!)，但他並不贊同共產主義。普魯東倡議自治公社聯盟制度，卻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運動組織者。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稱「互助公社主義者」；日後與英國工聯主義及社會主義者一起創立第一國際勞工協會組織。

A. 政治理念

(a) 自由之概念

巴枯寧政治理念的根本，在於否定以任何名稱與形式存在的統治系統，包括政治元首與神學中的神。他在《神與國家》(*Dieu et l'Etat*, 1882)一書中說：「所謂人之自由，包含他認可並遵從的自然法則，但不包含任何以人、神、集體、個體之名義外加於身，強迫遵守之物。」¹³⁵他也反對特權階級：「任何特權與特權階級皆將扼殺人之心智。因此不論政治或經濟，擁有特權者，必已喪失心智。」¹³⁶對於「自由」，巴枯寧並非追求抽象口號，而是實際的平等權。1871年，由其親信記錄的〈人、國家與自由〉(“*Man, Society and Freedom*”, 1871)一文，提及巴枯寧對自由的定義：正面的自由指「全人類藉科學訓練及富足物質達到的健全發展」；反面的自由是「個人對神、集體或個體權力的反抗」。¹³⁷

(b) 集體無政府主義

集體無政府主義倡導廢止國家與私有階級的「生產手段」(means of production)¹³⁸，並將生產手段分給個人運用，由非中央化的集體管理。個人可依自身意願，將生產手段運用於生產計畫中，達到「生活不慮匱乏的情況下，所有孩童皆享平等之教育、機會與支持，直至成年，足以提供自己的生活所需為止。」¹³⁹巴枯寧之集體無政府主義，實從普魯東學說互助主義(mutuellisme)脫胎而來。此為以自發性秩序為基礎的社會學理論。

¹³⁵ 〈God and the State by Michael Bakunin〉, 《Anarchy Archive》. 2010.01.12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akunin/godandstate/godandstate_ch1.html〉

¹³⁶ Ibid.

¹³⁷ 〈Man, Society and Freedom- Mikhail Bakunin 1871〉,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10.01.12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1/man-society.htm>〉

¹³⁸ 生產手段為克思主義認定的生產力三要素之一，指勞動者進行生產行為時所需之資源或工具。一般包括土地、廠房、機器、原料。

¹³⁹ 〈Revolutionary Catechism-Mikhail Bakunin 1866〉,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10.01.12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6/catechism.htm>〉

這種社會不存在類似政府的中央控制機構，個體得依照各自意願追求自身利益。對普魯東而言：

資本，在政治領域上相等於政府……資本主義之於經濟，權力機構之於政治，教會之於神學，三者為同一概念。這類三位一體的專制制度於實踐者及理論者皆為有害，因為壓迫一個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同時奴役他的身體、意志與理性。¹⁴⁰

「集體」之概念與精神，主張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利益應服從集團、民族、階級及國家利益；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一切行動與言論以集體為重。原意在建立道德至上的自助生活圈，共產主義卻渲染解釋，演變成不支付勞工酬勞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巴枯寧雖認同共產主義理念，卻強烈反對此點，亦為日後他與第一國際分道揚鑣的原因之一。

(c) 與馬克思分道揚鑣

1868年，巴枯寧加入第一國際日內瓦分部。至1872年被開除會籍前，在會內非常活躍。義大利及西班牙第一國際分部即為他奔走之功。次年，巴枯寧聯合其他79名會員創立社會民主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要求加入第一國際遭拒，社會民主聯盟因此解散，會員們分別加入不同組織，部份成員後來加入第一國際，形成社會民主派(Social Democracy Section)，與反獨裁派(Anti-authoritarian Section)針鋒相對。

1869年至70年間，巴枯寧積極參與俄國境內民意黨策劃的革命行動。該組織於1881年成功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70年，巴枯寧在法國里昂領導起義失敗，但此次經驗為後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所借鏡，1871年3月至5月短暫取得政權，被視為無政府主義的里程碑，巴枯寧竭力支持巴黎公社，此舉贏得義大利共和主義者好感，吸引不少人加入第一國際，此批人士日後在義大利發起社會革命。

¹⁴⁰ Nettlau Max.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y*. London: Freedom Press, 1996, pp. 43-44.

巴枯寧與馬克思分道揚鑣的原因有二：一、內部派別糾紛，不贊同馬克思的革命手段。前言提及，第一國際分兩派：反獨裁派提倡由工人直接發動革命及組織，藉此完全廢止國家政體與資本主義，採取無政府主義手段；社會民主派則依附馬克思，贊成由工人階級奪得政治力量，再進行下一步轉型計畫。¹⁴¹二、巴枯寧雖認同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與經濟學說，但亦直指馬克思過於傲慢，其革命手段將使社會主義的理想成為「集權社會主義」(Authoritarian Socialism)。此外他無法接受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統治」(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將完全的權力置於此群激烈革命者身上，則不出一年，其惡將更甚於沙皇。」¹⁴²巴枯寧預言，馬克思主義得權者將成為「假人民意志」的獨裁政黨。¹⁴³此預言日後果然成真。1873年，巴枯寧隱居瑞士，1876年死於伯恩。



¹⁴¹ Robert Graham.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Volume One: From Anarchy to Anarchism (300CE to 1939)*. Toronto: Black Rose Books, 2005, p. 178.

¹⁴²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p.25-26.

¹⁴³ A. Lehning ed.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4, p. 268.

(3) 別林斯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

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間 (1825-1855)，政治與社會的反抗使整個帝國陷入癱瘓，藝術與文學卻特別蓬勃。沙皇與大臣們對「革命的毒素」既恨且怕，因而成立檢查制度，嚴查所有詩歌、小說、教科書。教育所受之境遇與文學相去不遠。尼古拉一世質疑大學是自由思想的溫床，學生與教授是最有嫌疑的革命份子。1848年法國大革命後，所有留學計畫一律停止，西洋憲法與哲學的課程亦受壓制。由於知識份子被限制不能反映政治與社會，所以他們藉著研究與創作另覓出路。這解釋了為何俄羅斯文學與藝術在尼古拉一世的統治下，反而造就出黃金時代。¹⁴⁴赫爾岑即為此時代表人物之一。他說：「我們潛心於科學、哲學、愛、戰爭藝術與神秘主義，藉以忘卻身畔的粗俗與膚淺。」

知識份子對哲學、歷史、政治學及文學批評表露的熱情與關注，從書籍、報紙銷路上升，文學評論激增，雜誌期刊遍佈全國，可見一斑。三〇、四〇年代的知識份子貪婪地閱讀德國哲學家的作品，年輕人對形上學的熱愛狂熱，常討論玄奧問題。屠格涅夫在《羅亭》(*Рудин*, 1855)等小說中，對這些年輕人有生動描寫；他也在回憶錄中提到莫斯科小組（即史坦凱維奇小組），說他們是「受德國哲學思想影響的小組」，¹⁴⁵是一群「風靡黑格爾哲學，有頭腦的年輕人。」¹⁴⁶這些知識份子對任何理論都加以進一步分析。黑格爾以外，還研究費希特與謝林，並潛心研讀《浮士德》第二部(*Faust. Der Tragödie zweiter Teil*, 1832)的象徵意義。像多數俄羅斯人一樣，從感情的層面上追求理念：他們熱情地沉思，想從理論的知識裡求取實用的結果，想尋求某種學說作為個人與群體的準則。俄國人視哲學為師，從各種哲學主張中尋找實用的涵義。此種心理傾向可從俄國知識份子中明顯感受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父為海軍軍醫，故幼年生活艱苦、漂泊不定。1829年入學莫斯科大學，與史坦凱維奇小組交往，受其影響而醉心德國哲學，日後成為

¹⁴⁴ Marc Slonim 原著，張伯權譯，《俄羅斯文學史》。台北：楓城，1975，頁 85-87。

¹⁴⁵ И. С. Тургенев 原著，力岡等譯，《屠格涅夫全集》第十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 552。

¹⁴⁶ 同註 145，頁 538。

西歐派主力。在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影響下，由浪漫派理想主義走向唯物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¹⁴⁷其後的文學批評也從此種哲學觀出發。¹⁴⁸1832年，因與同學創作諷刺農奴制度戲劇，被迫退學。屠格涅夫日後回憶別林斯基時提及，同時代有許多瞧不起別林斯基的人，嘲諷他是沒畢業的大學生。

別林斯基不精通外語（唯一會的法文也讀得很吃力），但在俄文書中找不到能滿足他求知慾的東西，於是不得不找朋友交談，聽他們高談闊論。他以渴望真理的心靈狂熱追求知識，因而掌握了黑格爾的部份學說。……別林斯基的知識並不廣博，但這並不奇怪。因為從小伴隨他的貧困和並非十分豐富的教育、不順遂的環境和欠佳的健康狀況，都限制了別林斯基追求知識的機會。儘管如此，他還是紮實地研究了俄羅斯文學與歷史。¹⁴⁹

別林斯基以驚人的熱情成為傑出的文學評論家。自1834年在《望遠鏡》（*Телескоп*）發表第一篇評論，至15年後去世，別林斯基發表的文學評論達一千餘篇，成為當時俄羅斯知識界的領袖，¹⁵⁰知識青年熱烈地捧讀他詮釋當代及過去文學的文章。別林斯基原先沉溺於謝林的理想主義，將詩及藝術視為宇宙精神和世界不朽實體的表現。三〇年代後期，巴枯寧向別林斯基介紹了黑格爾哲學。黑格爾強調，一切存在的事物皆有合理性，文學不應空言理想，而應表現事實及真實的人生。¹⁵¹1839年別林斯基遷居彼得堡後，已傾向黑格爾的辯證哲學，並應用於文學批評。1840年他轉向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¹⁵²的唯物（Materialism）¹⁵³思

¹⁴⁷ 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又稱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Utopia）一詞襲用十六世紀英國作家摩爾（Thomas More）的著作名稱，摩爾在該書描寫一處理想社會，而這個地方根本不存在（希臘文中 *utopia* 意指不存在之地）。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認為：競爭性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違反公平原則，鼓吹以普遍的兄弟之愛替代階級鬥爭。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用統一的計畫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組織狀態；人人都要勞動，勞動者之間的區別在於有的用手，有的用腦。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取決於出身而取決於才能。其「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成為後來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口號。他們反對使用暴力，主張和平改造社會，寄希望於資產階級的良心發現。

¹⁴⁸ 同註 110，頁 126。

¹⁴⁹ 同註 145，頁 538-540。

¹⁵⁰ 同註 144，頁 90。

¹⁵¹ 同註 110，頁 127。

¹⁵² 德國哲學家，其影響後世最大的是「無神論」觀。他將其歸結為對於知覺的無限性

想與法國的極端社會主義，將進步、落伍、積極、反動等字眼使用在文學評論中。他的結論是：「活人的關心應投向實用哲學。美、正義、真理不應高於生活，應利用它們使生活趨向美滿。」¹⁵⁴別林斯基不贊同「為藝術而藝術」，但不否定藝術，因為：「我們必須理解藝術的重要性的意義，並理解它的必然性及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因為藝術是人的個性的根本表現，是日常經驗告訴我們的自然規則之一。」¹⁵⁵因此，雖然別林斯基稱讚普希金的長詩《尤金·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1830, 或譯為《永恆的戀人》)為「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但：「就俄國社會的描寫而言，果戈里的作品比普希金重要得多，果戈里是真正代表時代精神的作家。」¹⁵⁶

別林斯基的批評沒有任何預定的體系，他對批評理論不感興趣。他認為，文學是人們生活的充分表現，因此他要求自己必須熱愛並理解人民，而不僅是研究人民和歷史。並主張，具備如此條件，批評家才有權力發表意見。¹⁵⁷別林斯基同時也是寫實主義的捍衛者，讚譽果戈里(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是「自然派」(*натурная школа*)¹⁵⁸宗師，並關切藝術的社會意義。在「貪污盛行，農奴制度安若磐石，沒有公正的司法，沒有長遠的教育政策，烏雲籠罩在學術和文學之上……人人自危，逆來順受，毫無希望」¹⁵⁹的環境中，藝術與文學是表達社會問題的重要管道。別林斯基在果戈里嘲諷、誇張的筆調下，看見對社會的批判。1847年，別林斯基在一篇

認識，在對無限的認識中，有意識的主體以自身的無限性為認識的物件。換句話說，上帝是人內在本性的向外投射。他認為，上帝之所以被當作「愛」、「法律」、「道德的存在」，是為了適應人類本性的各種不同需要。由於抨擊宗教，許多革命者視他為英雄，但費爾巴哈本人從未參加過政治活動。他明確反對君主制度，認為「無限制的君主國乃無道德之國」，法國革命失敗後，他公開斥責當時的歐洲是「空間較大的監獄」。

¹⁵³ 唯物主義主張，只有真實存在之物才有意義。所有東西必由某種物質構成，所有現象(包括潛意識)都由物質間的交互作用產生。換句話說，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物質本身。此看法與唯心論對立。

¹⁵⁴ 同註 144，頁 92。

¹⁵⁵ 同註 145，頁 557。

¹⁵⁶ Charles A. Mos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4.

¹⁵⁷ 同註 145，頁 263。

¹⁵⁸ 自然派(*натурная школа*)本為文學批評家用以批評涅克拉索夫與果戈理之詞，經別林斯基重新闡釋後，成為俄國特殊文學現象。別林斯基將自然派歸於俄國寫實主義(*реализм*)之下，作品有以下特點：一、描寫社會重大主題(多為下層社會事件)；二、以批判態度寫作；三、需以大眾化語言寫作。然而別林斯基過世後，「自然派」風潮便隨之沒落。

¹⁵⁹ 同註 145，頁 561。

文學評論中說：「有人說，果戈里是自然派（natural school）之父。」此詞原是他人提出，用以嘲諷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8），別林斯基借用「自然派」一詞，賦予它正面的意義。安年科夫（П. В. Анненков, 1814-1887）¹⁶⁰則認為，「所謂「自然派」是果戈里發揚光大的，引導果戈里走向自然派的是別林斯基。因此別林斯基才是真正的自然派之父。」¹⁶¹

別林斯基的論點引起年輕激進份子的響應，提高了四〇與五〇年代知識份子對政治社會問題的興趣。他們對政治的興趣高於玄學及美學，特別關注俄羅斯民族性的定義及俄羅斯前途。此外，他也深刻影響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劍橋大學出版的俄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1989）稱讚別林斯基驚人的直覺與判斷力決定了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批評方向。他是第一位肯定杜斯妥也夫斯基處女作《窮人》（*Бедные люди*, 1846）的評論家，鼓勵杜斯妥也夫斯基繼續創作；屠格涅夫、岡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涅克拉索夫都因他的大力推崇而受重視；也因為別林斯基，果戈里被尊為自然派宗師。四〇、五〇年代的年輕作家因此重視「小人物」，常以車夫、賭徒、小職員、農奴為作品要角。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文壇正式邁入寫實文學時代，別林斯基的影響不容忽視。

從社會階級而言，別林斯基的廣受重視代表了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屠格涅夫曾言：

別林斯基的平民出身觸犯我國文學自亞歷山大一世以來的貴族精神……

他的談吐、舉止與動作流露純俄羅斯的、純莫斯科的氣質，他的血管流動純粹的俄羅斯血統，是外國血液無法滲入的俄國神職人

¹⁶⁰ 安年科夫，俄國文學批評家與歷史學家，為屠格涅夫之友。其回憶錄《璀璨年代》（*The Remarkable Decade—1838-1848*, 1880）為研究十九世紀三〇、四〇年代文化現象的重要史料。

¹⁶¹ 同註 144，頁 195。

員階層¹⁶²（別林斯基的祖父是東正教會司祭）。

換句話說，別林斯基不僅代表平民知識份子的崛起，也代表了俄國社會內階級的流動。數百年之久，神職人員一直是人數及地位幾無變動的階級，19世紀的法規卻使神職人員人數逐漸減少，不少僧侶走入平民與軍人階層。從前識字是貴族與僧侶的特權，僧侶流動至不同階層，間接促進了知識普及和識字率提昇，對平民知識份子的形成甚為重要。

別林斯基死於1848年，年僅37歲。不久以後，俄國的文化界發生許多變故：赫爾岑移居國外，杜斯妥也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亞，果戈里於1852年去世……。1855年尼古拉一世逝世，俄國文學終於走向寫實，創造輝煌的黃金時代，其成就凌越許多西洋文學。



¹⁶² 同註 145，頁 533, 537。

二、第二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多餘人物與虛無主義者

第二代知識份子出現於五〇年代末期，其中不僅有貴族青年，還有許多平民。他們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承襲自父輩，但克里米亞戰爭失敗（1853-1856）、新皇即位（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農奴解放（1861）等事件，對子輩形成巨大的心理衝擊，使他們與父輩大為不同。他們反傳統、反權威，反對所有父輩重視的「真理」，唾棄形上學、嘲笑美學，遵奉科學主義、唯物論，強調藝術應有更積極的社會價值，扮演伸張正義的角色。¹⁶³父輩可謂是思想理論的創造與鼓吹者，子輩則是積極的實踐者。子輩多出生於四〇年代，父輩的啟蒙與亞歷山大二世的開明政策，使子輩更有活力，不再滿足於溫和的改革，他們尋求快速改變，產生否定一切權威的虛無主義思想，主張流血暗殺的恐怖行動。父輩警告子輩應停止流血手段，放棄暴力，卻被子輩批評「有知識，無意志」。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首次以「虛無主義者」（нигилист）稱呼新生代「知識份子」，西歐派則指責，屠格涅夫扭曲虛無主義者的形象，將他們塑造成空談、不務實際的一代。《父與子》的初衷原欲彌合兩代的隔閡，卻引起「父輩」與「子輩」知識份子激烈批評：「有人指責我侮辱年經一代，責斥我落後、反動……年長者卻怒指我曲意奉承這些年輕人。」¹⁶⁴

但不可否認，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及時且深刻地刻劃了俄國社會由貴族知識份子轉向平民知識份子的歷史發展。他身處俄國社會歷史發展關鍵時期：青年時，正值父輩知識份子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爭論不休；壯年時，正是子輩知識份子—虛無主義者崛起之際；晚年則目睹第三代知識份子—民粹主義者由亟欲求變轉為恐怖激進。當時俄國出現了三類人：一、極端激烈反叛者；二、個性溫軟、性格矛盾者；三、粗暴愚昧者。此三類型的知識份子透過屠格涅夫筆下呈現，即巴扎洛夫（Базаров）¹⁶⁵、多餘人物、愚昧民眾。屠格涅夫佩服前者，責備後者，對多餘人則憐憫多於責備。

¹⁶³ Stuart Ramsay Tompkin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p.40.

¹⁶⁴ И. С. Тургенев 原著，蔣路譯，《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 90。

¹⁶⁵ 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主角。

（一）多餘人物

多餘人物（或稱「多餘人」、「無用人」）出現時期應略早於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約為十九世紀二〇、三〇年代，但其概念與虛無主義者相似，且兩者互為因果演變，故於此與虛無主義者比較。多餘人物受過西歐先進文化與科學洗禮，具良好教養與卓越的思辨力，對社會問題、時代動向、哲學、美學都有出色見解；他們意識社會不公，強烈希望推動改革；大義凜然，厭惡貴族，不屑與貴族同流合污，也不向強權低頭，卻為一般大眾所排斥，因而在社會上找不到定位及歸屬，難以有所作為，與眾人格格不入，因而受到社會冷落，顯得「多餘」。這些知識份子的理念與人民脫節，其奮鬥被民眾奚落，此為多餘人物憂鬱、失望與悲哀的原因。屠格涅夫從兩個角度描繪多餘人的性格：現實社會與愛情。他將這群才智兼備、滿懷希望的知識份子推入社會，從他們熱情蓬勃、富有理想、追求真理，一路描繪至他們為社會所不容，進而失去自信和理念，最後只能自我放逐。此外加入兒女私情，細描他們纖細思緒、多愁善感、意志薄弱、矛盾軟弱的一面。

岑斯（Ellen Chances）¹⁶⁶教授在〈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2007）一文指出：

十九世紀中期，「多餘人」一詞被應用於俄國文學，為某類特殊人物之代稱，首見於屠格涅夫小說《多餘人日記》（*Дневник лишнего человека*, 1850）。此後，「多餘人」常被用來稱呼阿布洛莫夫（*Обломов*）¹⁶⁷或喬卡圖林（*Челкатурин*）¹⁶⁸之類的角色。

在其著作¹⁶⁹中，岑斯教授認為多餘人物是：「與社會格格不入的無用貴族……只會作白日夢，是無能的知識份子，只會空談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能敏銳地察覺社會及道德問題，但因自身懦弱與政治束縛而未能有所作為。」

¹⁶⁶ 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¹⁶⁷ 岡察洛夫小說《阿布洛莫夫》（*Обломов*, 1859）主角。

¹⁶⁸ 屠格涅夫小說《多餘人日記》主角。

¹⁶⁹ Ellen Chances. *Conformity's Children: An Approach to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1978.

另一位學者派特森教授 (David Patterson, 1922-2005)¹⁷⁰則說：「『多餘人』不只是文學形象，這是一個失去生活目標之人的典型代表。一言以蔽之，『多餘人』就是沒有歸屬感的人。」¹⁷¹

多餘人物的形象，在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Рудин, 1855)最能窺得其妙。前文言及赫爾岑、巴枯寧、別林斯基時，皆提到他們加入史坦凱維奇小組，彼此討論進步的西方哲學。羅亭亦是如此，他保有這些年輕人善於思考的特點，甘心為人民奉獻，大公無私，不願虛度年華，同時又辯才無礙。高爾基 (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 認為，羅亭身上有巴枯寧的特點，像屠格涅夫本人，又神似赫爾岑，為各種純真美好理想的代表，是當時的典型人物。¹⁷²這些純真美好的理想，正是熱衷討論的大學生哲學小組的代表。羅亭決心為社會獻身，但對如何具體改造社會卻沒有概念。他企圖投身社會人群，計畫改革，然而只能解決旁枝末節的小事，無法真正撼動國家制度，因此，願望與實際間存在著不可跨越之鴻溝。羅亭雖有高出同輩人之才能與天賦，但也因此履遭上級打壓與小人誣陷。他痛苦感嘆：「難道在世上我竟無事可作？我時常反問自己……為什麼我的才能總不能開花結果？」¹⁷³

高爾基為這樣的現象做了解釋：「應該說，以當時的情況而言一政府的壓迫、農民大眾的無知，理想家羅亭比行動者更有用。理想家是知識的散播者，亦是現實的批判者，但在那個時代，一名行動家能做出什麼？」¹⁷⁴涅克拉索夫評論《羅亭》時說：「羅亭是不久前還站在思想最前端的人物，曾經為社會留下重要影響……儘管這類人有著荒謬可笑之處，然而人們卻不能不為之肅然起敬。」¹⁷⁵契尼謝夫斯基則言：「若不涉及實際問題，僅以空話和幻想來消磨無聊時光，這些人都很活潑，但到了需要坦率確切表達自己願望和情感時，他們就不敢果斷行事。他們沒有實現自己願望的能

¹⁷⁰ 希伯來學者，曾任孟斐斯大學俄文系教授。

¹⁷¹ David Patterson. *Exile: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in Modern Russian Letter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p.2.

¹⁷² Н. Н. Наумова 原著，劉石冰譯，《屠格涅夫傳》(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Посobie для учащихся)。台北：國際文化事業，1984，頁 102。

¹⁷³ 孫乃修編著，《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頁 128。

¹⁷⁴ 同註 173，頁 129。

¹⁷⁵ 同註 172，頁 105。

力，只能半途而廢。」¹⁷⁶

羅亭以外，「多餘人物」也曾出現在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 1799-1837)的《尤金·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1831)與萊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的《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840)中。不過由此三部作品，也可看出「多餘人物」的轉變。《尤金·奧涅金》是普希金沈迷於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時的作品，主角奧涅金的萎靡不振與冷漠陰鬱，類似拜倫的筆下人物。¹⁷⁷奧涅金的形象是個紈袴子弟，普希金特意以「花花公子」、「裝腔作勢」、「歡樂與奢侈的兒女」形容他，同時描寫了奧涅金內心深處的徬徨：

奧涅金睡到過午才起來，那單調卻又豪華的生活又準備好等待他玩到明天清晨了……在人生的盛年，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愛的勝利和日夜歡樂的奧涅金，是幸福的嗎？不，他的熱情早已麻痺了……什麼都打動不了他的心，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了。

終日無所事事而感到苦惱與空虛的奧涅金，坐在桌前想讀書了。但沒什麼用，書櫃裡全是厭煩與欺瞞的蠢話，既無良心，亦無意義。舊書全是古董，新書追隨著往昔的幻影。奧涅金，終於如對待女人一般，把那些書棄如敝屣了。¹⁷⁸

詩中一再重複的苦悶，並非奧涅金的無病呻吟，而是作者對當時俄國的憂慮。

《當代英雄》中的彼佐林思想清晰，不似奧涅金，但他剛愎自用，終於一事無成。萊蒙托夫在此書的前言中聲明，他要描繪的並非某一特殊個人，而是代表他們那一代病態人物的肖像。¹⁷⁹比起奧涅金，彼佐林顯得更冷靜、冷漠，對一切世事冷眼旁觀，但萊蒙托夫為彼佐林加了更多內心描述：

¹⁷⁶ 同註 172，頁 113。

¹⁷⁷ 同註 110，頁 84。

¹⁷⁸ А. С. Пушкин 原著，鄭清文譯，《永恆的戀人》。台北：志文，1993，頁 56-59。

¹⁷⁹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4, ст. 19.

我剛離開父母的庇護，以金錢換得享樂，不久就厭膩了。步入上流社會後，我看多了交際場合的美女，但她們的愛只能激起我的幻想與虛榮心，內心空洞無聊……於是我開始讀書——但學問也無法深入研究！因為我看到的榮譽與幸福都不取決於學問。最得意的人是無知的草包……想要名揚天下，只需機伶取巧。於是我比以前更苦悶。……

我的心靈被上流社會毀了，剩下幻想和難以滿足的奢望。世間萬物於我微不足道，憂鬱於我習以為常，享樂也如家常便飯，我的生活一日比一日空虛。我唯一的出路只剩下旅遊，最好碰巧在半路死去……我只能相信這最後一絲慰藉。¹⁸⁰

彼佐林的無奈告白，為自己紈袴子弟形象做了交代。然而在讀者抨擊彼佐林時，亦不應否定他的才能。彼佐林的真愛維拉（Вера）為他做了客觀的辯護：

你的天賦中有種與眾不同，可引以自豪，神秘莫測的東西；無論你說什麼，你的聲音總有一種無人能敵的威嚴……沒有人能像你那麼自如地運用自身的優勢。¹⁸¹

同時，維拉亦道出彼佐林心中的寂寥：

沒有人像你一樣如此希望自己能恆久地被愛著。無論誰都不會像你一樣不幸。¹⁸²

有批評家認為，彼佐林這種沈靜剛強，心靈善感，憤世嫉俗，又忍不住悲憫為懷的人物，像一座死火山，虛有其表，不只是俄國小說的新典型，也

¹⁸⁰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原著，呂紹宗譯，《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頁 34-35。

¹⁸¹ 〈Михаил Лермонтов.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Lib.Ru: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2010.04.12

〈<http://lib.ru/LITRA/LERMONTOW/geroi.txt>〉

¹⁸² Там же.

是俄國社會的諷刺。¹⁸³

奧涅金、彼佐林、羅亭同為「多餘人物」，但我們可看見其中的轉變：奧涅金與彼佐林終日清談，流露對社會不公及小人當道的不屑，但彼佐林能自我反省，哀嘆大環境無法改變之餘，也透徹瞭解自身的力量薄弱；奧涅金則如孩童，再見塔吉娜（Татьяна）¹⁸⁴的風華，竟深深沉迷，執意追求有夫之婦，被塔吉娜嚴詞拒絕，黯然退場。比起奧涅金，彼佐林顯得進步，羅亭則更積極，空談之餘，已能投入革命行動。¹⁸⁵



¹⁸³ 同註 110，頁 113。

¹⁸⁴ 普希金長詩《尤金·奧涅金》之女主角。

¹⁸⁵ 同註 172，頁 104。

（二）虛無主義者

屠格涅夫筆下的虛無主義者，有勇於挑戰父輩權威的激情，及夢想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們不似「多餘人物」纖細脆弱，堅強與不屈不饒的精神是他們的特色。為《父與子》英文版導讀的金法博教授（David Goldfarb）¹⁸⁶也認同虛無主義者是十九世紀六〇年代部份俄國知識青年的形象，但《父與子》以外，描繪虛無主義者的還有契尼謝夫斯基的《怎麼辦？》，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 1860）、《地下室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1864）、《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866）及《白痴》（*Идиот*, 1868）等作品。大量提及虛無主義者的作品，除了反映當代知識界「虛無主義者」的氾濫，也代表對政治、社會的期望。金法博認為，上述這些小說描寫為社會努力的知識份子，但其中失敗者成了「多餘人物」，剩下的知識青年為了突破現狀，必須打破傳統，以勇於挑戰一切的「新人」（new man）姿態重返舞台，在新與舊、斯拉夫與西歐中不斷抉擇、妥協、甚至融合。

虛無主義者的形象，以巴札洛夫最為人所知。《父與子》成書於1861年，時值農奴解放之際，次年發表。巴札洛夫為貧窮醫生之子，是一個注重實際而且腳踏實地的青年，與「多餘人物」空談、不切實際的個性大相逕庭。巴札洛夫清楚自己的追求，並努力獲取，不為幻想與偏見蒙蔽。他的理性，代表十九世紀六〇年代講求實際的風氣。巴札洛夫不承認自然之美，追求實用、行動、效率與技能。他粗魯坦率，憎恨傳統，認為「行動勝於空談」。虛無主義者的定義，由阿爾卡迪（Аркадий）與父親尼古拉·基爾沙諾夫（Николай Кирсанов）及伯父帕威爾·基爾沙諾夫（Павел Кирсанов）的談話可知：

帕威爾從容問道：「那麼，這位巴札洛夫先生是怎樣的人呢？」

阿爾卡迪微笑說：「他是虛無主義者。」

「什麼？」尼可拉呆住了。

「虛無主義者。」

¹⁸⁶ 現為紐約巴納學院（Barnard College）斯拉夫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虛無主義者，」尼古拉說，「依我看，那是從拉丁文 nihil(無)來的。這字眼想必是說一個……一個什麼都不承認的人吧？」

「不如說是一個什麼都不尊敬的人。」帕威爾插嘴道。

「是一個用批評眼光看待一切事物的人。」阿爾卡迪說。「虛無主義者是不服從任何權威的人，不信仰任何原理，就算這原理被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

帕威爾插嘴說：「果然不錯，這和我們不同。我們是舊時代的人，認為一個人若不信仰一種『原理』，就無法邁步向前，連氣也無法喘。你們改變了這一切。……虛無主義者啊，我倒要看看你們如何在虛空、真空裡生存。」¹⁸⁷

瞧不起虛無主義者的人認為虛無主義者否認一切、什麼都不尊敬；崇拜虛無主義者的人認為這是一群以批判眼光審視一切的人。那麼，巴札洛夫本人又如何看待虛無主義？

(巴札洛夫與帕威爾的爭執)

帕威爾：「……我知道你對我的習慣、裝扮及整潔都感到可笑，但我的所作所為全是出自一種責任心。我雖然住在鄉下，卻不會降低自己的身份。我尊重我的尊嚴。」

「那麼我問您一句，」巴札洛夫說：「您尊重您自己，對其他事情袖手旁觀，請問這對您提到的大眾利益有什麼用處？若您不尊重自己，不也是這麼坐著嗎？」

……

帕威爾厭惡地舉起手。「您侮辱了俄國人。我實在不懂一個人怎能不承認原理與規則！您是依據什麼行動的呢？」

「伯父，我已經說過我們不承認任何權威。」阿爾卡迪插嘴道。

「我們依據我們認為有利的事情行動，」巴札洛夫說。「目前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那我們就否定——」

「否認一切嗎？」

「否認一切。」

¹⁸⁷ И. С. Тургенев 原著，江子野譯，《父與子》。台北：大漢出版社，1979，頁 28-29。

「這是怎麼回事？不僅詩與藝術……連……這太可怕了……」

「否認一切。」巴札洛夫非常鎮靜地再說了一遍。

「讓我來說兩句，」尼古拉說。「您否認一切，或正確地說，是破壞一切……但您得瞭解，破壞的同時必須建設。」

「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要做的是先把地上打掃乾淨。」

「人民目前的狀況正需要這個……」阿爾卡迪莊嚴地說。

……帕威爾又問：「那麼你們又做了些什麼？」

「告訴你吧。前不久，我們常討論官吏收賄，批評我們沒有公路、商業與公平的審判……」

「喔，我明白了，你們是改革派——這種稱呼正確吧？你們的改革我大部分同意，但是……」

「後來我們發覺永遠都只是議論，除了議論再也沒別的！對社會弊病空發議論毫無用處，過份討論只會使人變得淺薄和武斷……我們整天忙著做一些無聊事，白費時間談著藝術、議會制度、陪審制度和鬼知道的什麼東西。事實上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得到麵包。我們被迷信悶得透不過氣，政府忙著不見得有用處的『解放』，有什麼用處啊？農人還是一樣喜歡把錢送給酒吧，只為換得酩酊大醉。」¹⁸⁸

1895 年譯《父與子》為英文版的嘉爾納特（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在序言中提及，許多批評家認為巴札洛夫是「批評、無情、分析與否定精神的綜合體。」¹⁸⁹但嘉爾納特認為，巴札洛夫贊同近代科學的「懷疑精神」，並以此為思考基礎，進而否認一切，這正是思想與政治革命的起源。不過她也強調，當時唯物論不是科學的真正基礎，而是虛無主義者想要擺脫藝術、家庭、社會等傳統制度的工具。

虛無主義者的破壞力吸引十個人，卻趕走一千人。一般人害怕巴札洛夫，甚至不敢與他接觸。巴札洛夫像偶像破壞者，在自己的朋友圈內也不受歡迎。他們曾受政治壓迫或流放，在其他地方，卻

¹⁸⁸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Lib.Ru: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2010.04.12
< http://az.lib.ru/t/turgenew_i_s/text_0040.shtml >

¹⁸⁹ 同註 187，頁 6。

尚未被人認識，就受排擠了。¹⁹⁰

虛無主義者之所以招致攻訐與不滿，與他們反權威的主張有關。對當時沒有信仰便無法生活的俄國人民而言，反權威就是反帝制，反帝制就是否認統治社會與管理政治的神聖秩序，無異捨棄神的存在，強迫農人與相依存之土地分離。換句話說，反權威等同剝奪俄羅斯的根和靈魂。《父與子》的帕威爾與巴札洛夫爭論時，道出了虛無主義者的盲點：「我不相信你們這些虛無主義者真正認識俄國，我不相信你們代表他們的需要和渴望。俄國人民並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他們視傳統不可侵犯，他們服從宗教，沒有信仰便沒法生活。」¹⁹¹

《父與子》全篇採對比手法，彼薩列夫（Д. И. Писарев, 1840-1868）認為這種手法突出了巴札洛夫孤軍奮戰的形象。彼薩列夫認為屠格涅夫屬於小說中舊式貴族—基爾沙諾夫一員，因此他既能感受「新人」對老一輩的衝擊，也能站在虛無主義者的立場批判這些貴族。赫爾岑則認為：「屠格涅夫寫巴札洛夫並不是為了誇獎他，他顯然只想寫些有利於父輩的東西。但巴札洛夫吸引了屠格涅夫，於是他沒有鞭笞兒子，卻抽打了父親。」¹⁹²

父輩與子輩的爭論，在書中暫時停止，書外的兩代論戰則越演越烈，巴札洛夫的形象成長為民粹主義者的原型，影響以後的許多年輕人。

尼古拉一聲不響地偷看阿爾卡迪，心裡痛苦。

「哥哥，你知道我想起什麼嗎？有一次我跟母親爭論，她不肯聽我的話，還發了火，最後我對她說：『妳當然無法瞭解我，我們是不同的兩代人！』她非常生氣，但當時我卻想：『有什麼辦法呢？這像一顆苦藥，她只能吞進肚子接受這事實。』你看，現在輪到我

¹⁹⁰ 同註 187，頁 8。

¹⁹¹ 同註 187，頁 66。

¹⁹² 同註 172，頁 137。

們了，我們的後輩可以對我們說：『你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吞你的藥丸去吧！』」¹⁹³



¹⁹³ 同註 187，頁 72。

三、 第三代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民粹主義者

俄國民粹主義（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傳承自虛無主義，同時接受西歐派別林斯基與赫爾岑的影響。小說《父與子》中，已可看出虛無主義轉向民粹主義的趨勢：

「我們要破壞，因為我們是一種力量。力量是不需負任何責任的！」阿爾卡迪揚揚得意地說。

「不幸的孩子！」帕威爾叫著，他不能再壓抑自己了。「你有沒有想過你們這種無聊的議論會把俄國弄成什麼樣子！」¹⁹⁴

十九世紀四〇年代起，以別林斯基、契尼謝夫斯基、朵布羅留博夫為首的平民知識份子，從解放農奴的立場出發，宣傳自由、平等、博愛與人道主義。然而「沒有沙皇與臣民之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與「解放土地，平分土地，通過村社實現社會主義」的想法都太天真。他們並未意識農奴制度本身就是村社制度的殘餘，高喊推翻農奴制度的同時，卻返回其根源，並希冀以此實現新一代社會主義，如同空談與妄想。不過此理想仍被民粹派吸收，成為其理論基礎。六〇年代，俄國農民的生活並未因沙皇解放農奴獲得改善，反因農奴制度之遺毒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衝擊，遭受更嚴重的剝削與迫害。¹⁹⁵民粹主義運動應運而生，六〇年代中後期成為社會思想主流。

對於俄國未來發展，當時的知識份子持兩種意見：一為普魯士模式，另一為英法模式。普魯士模式是歷代沙皇所傾慕的發展道路，此模式以維護專制統治與貴族利益為前提，廢除農奴制度，逐步實現經濟與國家現代化。全盤西化的英法模式為西歐派所稱道，廢除農奴制度以外，主張推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共和與自由經濟。但知識份子不滿沙皇政府實施的普魯士模式，而英法模式也難以實際推展。革命前，英法兩國的農奴制度都早已解體，因此日後得以順利推行民主共和與自由經濟。農奴制度在俄國

¹⁹⁴ 同註 187，頁 69。

¹⁹⁵ 米豔，〈俄國民粹主義的形成及特徵〉，《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 46 期，2007 年，頁 24。

則成為實行西歐民主政治的絆腳石。此外，資本主義與工業化在西歐國家的發展上帶來種種弊端，亦為俄國知識份子所批判。所以，俄國知識份子選擇以赫爾岑的社會主義為基礎，產生了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的內容主要有下列四項：

一、人民是真理的基石。民粹主義宣傳派之首拉夫洛夫(П. Л. Лавров, 1823-1900)曾言，

由於多數人民鑿石鋪路，採煤挖礦，耕耘土地，受苦受難地養育知識份子，後者才有機會讀書學習，欣賞藝術，進行科學研究，培養文哲素養與崇高情操。所以知識份子應盡力改善人民境遇，為人民謀福利，報答他們的培育之恩。¹⁹⁶

二、主張保存村社制度，以此實行社會主義。民粹派宣揚農村公社與農民生活的美好，強調透過村社制度才能合理分配土地，唯有在此制度下，土地才能獲得最大收益，人民勞動效率才能大幅提昇。

三、譴責資本主義。面對西方社會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發展，民粹主義者見西歐農民及工人經濟陷入赤貧，認為不可信任資本主義可以帶來民主，甚至視資本主義為罪惡的淵藪。民粹派認為，「正因我們（在社會主義發展上）是遲到的民族，我們得救了。我們該感謝命運，因為我們沒有歐洲的生活，歐洲的不幸。歐洲的絕境對我們而言是重要教訓。」¹⁹⁷

四、視農民為實現社會主義之力量。民粹派以「走人民間」(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為號召，所謂「民間」指俄國的廣大農村。赫爾岑說：「俄國農民尚未感染歐洲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惡習。」¹⁹⁸民粹派

¹⁹⁶ 同註 195。

¹⁹⁷ 中共中央編譯局，《俄國民粹派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33-39。

¹⁹⁸ Isaiah Berlin 原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 241。

亦言：「到農夫那裏去！農夫需要知識份子……俄羅斯需要有知識的人組成農村。走向土地的知識份子將為自己找到幸福和寧靜！」¹⁹⁹

民粹派流派紛雜，主要流派有四：一、繼承巴枯寧思想的「無政府暴動派」(Анархистско-бунтар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呼籲學生向農民宣傳革命，聯合全國農民引發暴動，因為「人民愚蠢，必須以行動將他們推入幸福」；²⁰⁰二、拉夫洛夫為首的「宣傳派」(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不贊同暴力，主張革命需要較長的時間準備，堅持和平的宣傳策略；三、以特卡裘夫(П. Н. Ткачёв, 1844-1886)為代表的「密謀派」(Заговорщиц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主張由少數知識份子密謀奪權；四、涅察耶夫(С. Г. Нечаев, 1847-1882)主導的「暗殺派」(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則主張，唯有進行暗殺手段方能達到目的。推行手段各不相同以外，此四派一致認為，必須徹底清除農奴制度，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村社為社會主義的萌芽和基礎。

民粹派初以小組形式進行活動，印發傳單，揭露不平等的社會制度，號召人民推翻沙皇制度。1873~1874年，民粹派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走入民間」運動。他們著農民服裝，深入伏爾加河、頓河與德涅伯河流域間的農村，號召農民革命。但許多農民並不信任他們，甚至主動報警，致使行動一再受挫，無法達到預期目的。後因沙皇政府鎮壓，終於失敗。失敗以後，民粹派知識份子認為，籌辦革命需要嚴密的組織與策劃，第一個具備「黨」形式的組織遂於此時產生。1876年「土地與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於彼得堡成立，主張將土地平分給農民，村社應有完全的自主權；1879年，「土地與自由社」分裂為「黑土平分社」(Чёрный передел)與「民意黨」(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溫和的「黑土平均社」由普列漢諾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 1857-1918)領導。不久以後，普列漢諾夫接觸馬克思主義，退出民粹主義陣營。米哈伊洛夫(А. Д. Михайлов, 1855-1884)為首的民意黨則先後八次擬定暗殺計畫，1881年，終於炸死亞歷山大二世。

¹⁹⁹ Г. В. Плеханов 原著，曹葆華譯，《普列漢諾夫美學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42。

²⁰⁰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台北：三民書局，2006，頁 119。

第三代知識份子幾乎皆來自平民階級，大學生是此時知識份子的中堅力量。六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學生運動盛行，但多以爭取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如爭取大學自治權等。七〇年代末期，民意黨積極吸收大學生參加民粹運動。大學生幫忙籌措資金，散發傳單，教導工人識字，協助工人組成小組，甚至參與恐怖活動，成果斐然。亞歷山大二世身亡，沙皇政府進行積極的鎮壓，民粹主義運動於是沈寂許久。然而，踴躍參與民粹主義運動的大學生引起社會大眾關注。許多大學生被流放或鎮壓，社會各階層為之不滿，也凸顯了當時社會民情的矛盾：積極活動的平民知識份子，處於保守的上層菁英分子與廣大人民之間，不僅是近代俄國現代化不可或缺之推手，也為彌合上、下兩階級的重要力量。

九〇年代初期，民粹運動再起，各種組織以繼承民意黨為號召紛紛湧現，如「舊民意黨」（Группа старых народovolьцев）、「社會革命者聯盟」（Союз социаль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南方社會革命黨」（Южная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俄國政治解放工黨」（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農業社會主義同盟」（Аграр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га），其中以「社會革命者聯盟」最激進。該聯盟綱領宣稱：

政治恐怖為政黨最有利的武器，也是指導革命的最佳手段。系統化的恐怖行動，聯合群眾力量便能瓦解敵人。唯有戰勝專制制度，獲得完全的政治自由後，恐怖行動方能停止。恐怖行動除可瓦解敵人，並具宣傳鼓動的能量，也是所有地下組織防止奸細叛變破壞的手段。²⁰¹

他們強調暴力（насилие）只能以武力（сила）對抗，高喊以惡制惡的合理性，並將殺戮行動「使命化」，塑造革命者「正義使者」的形象。社會革命黨之下的戰鬥隊（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領導者格爾舒尼（Г. А. Гершуни, 1870-1908）甚至公開說：「殺人者是民族英雄！（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ерои—

²⁰¹ Н. Д. Ерофее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т. / Т. 1. 1900-1907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ЕН, 1996, ст.24.

убийцы!)」²⁰²

1902-1907 年，社會革命黨以暗殺、爆炸事件、武裝進攻、敲詐勒索等手段製造了大量恐怖事件。1905 年提出發展「群眾性的恐怖主義游擊戰」（массовая партизанск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號召集結武裝民眾進行恐怖襲擊。1902-1907 年間發生的恐怖行動，78.2%由社會革命黨發起；²⁰³1911 年由該組織公佈的數據顯示，1902 年至 1911 年策動了 213 次恐怖行動，²⁰⁴造成的死傷人數與範圍，前所未有。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1905-1997）²⁰⁵認為，九〇年代後，民粹主義者以革命為聖統，卻演變成為恐怖主義，帶給俄國社會嚴重的不安，實已背棄理想，並非社會之福。



²⁰² О. В. Будниц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начало—XX 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ЕН, 2000, ст.125.

²⁰³ М. 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ЕН, 1997, ст. 23-24.

²⁰⁴ Н. Д. Ерофеев, *ор. Cit. / Т. 2. Июнь 1907 г.—февраль 1917 г.* ст.379.

²⁰⁵ 猶太裔俄國人，哲學家、歷史學家，1921 年移居英國。曾代表英國出使俄國。

第肆章 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沒落

第一節 二十世紀初俄國文化與社會

一、白銀時代的文學流派與蘇聯文藝政策

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末世的悲觀情緒在俄國知識份子之間蔓延。俄國自 1853 年克里米亞戰爭（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後，幾乎每十年便有大事發生：戰爭，沙皇遇刺，共黨革命，人民歷經數次重大戰爭以及革命事件，社會上瀰漫一片低迷愁雲。加上當時流行的唯物論與無神論，以及邁向工業化後產生的弊病，摧毀舊時代的價值觀，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濃厚，進而引發精神危機。赫克教授（Julius Friedrich Hecker, 1881-1953）²⁰⁶在其著作《蘇聯的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1927）中指出，精神上的孤獨感與絕望情緒，在當時的大學生自殺人數上可見一斑：1902 年大學生自殺案例 10 件，至 1908 年，攀升至 237 件。對此，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維約夫、別爾嘉耶夫、羅贊諾夫（В. В. Розанов, 1856-1919）等文化人提出宗教的哲學思維，希望給予陷入悲觀情緒的俄羅斯人民以鼓勵的力量。

1893 年，梅烈日科夫斯基在〈論俄國文學衰微之因與現代文學新趨勢〉（“О причинах упадка и о новых теч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93）一文指出，科學知識使現代人心生不安，需要積極追求精神力的支持。俄國人應回歸東正教信仰，從宗教神聖性尋求心靈的平安。在此文中，他還提出著名的藝術三要素：「神秘的內容、象徵與藝術感染力的擴大」（м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имволы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впечатлительности），此三要素催生了俄國象徵主義（Символизм），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文壇開創新格局。1893 年因此被稱為「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開始的年代，是十九世紀前期浪漫文學黃金時代（Золотой век）以外，俄國文學的又一高峰時期。

²⁰⁶ 赫克出生彼得堡，後赴美求學，1921 年蘇俄內戰結束後返俄，為傑出神學、哲學與社會學者。在其努力奔走下，莫斯科與彼得堡的神學院重新招生。

（一）白銀時代的文學流派

「白銀時代」一詞出自俄國僑民詩人奧楚普（Н.А. Оцип, 1894-1958）之文〈俄國詩歌的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1933），亦有學者認為此詞為別爾嘉耶夫所首用，原指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文學，與黃金時代相呼應。之後俄國文學與文化界將「白銀時代」的概念擴充為文化意涵更深的術語，表徵此一時期「俄羅斯文化藝術、哲學思想與社會生活的發展」。²⁰⁷白銀時代的主要文化特徵有三：

- 一、白銀時代以前，馬克思唯物主義與無神論發揮的影響，使俄國文學與時代精神陷入空虛無依。知識份子積極希望以新思維重新評定傳統文化，審視文化現象，促使文學思潮轉向宗教內容，斯拉夫派思想得以復興。
- 二、不少文化人不滿當時的社會現況，轉而尋求宗教慰藉。多數詩人與作家倡導宗教哲學，他們以直覺為認知世界的唯一手段，將理性昇華為信仰。部份文化人強調的「直覺」玄奧深密，幾乎等同神秘主義，作家筆下的主題亦多探討宗教、生死、命運、幸福與苦難、靈魂與肉體，末日與拯救。其中不少作家與詩人的作品，融合了民間神話與傳說的啟示。
- 三、別爾嘉耶夫認為，白銀時代宗教與詩歌的繁榮代表了「俄羅斯精神文化的復興」（русский духов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ренессанс）。²⁰⁸然而，伴隨這種精神文化復興的現象，卻是對舊俄羅斯瀕臨毀滅的不安定感。²⁰⁹這種頹廢情緒亦是白銀時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特徵。

當時很多知識份子厭惡社會的黑暗，卻同時懼怕社會的變革，表現世紀之交的矛盾心理。²¹⁰他們崇尚正統的斯拉夫理想，主張以宗教思想改造

²⁰⁷ 同註 18，頁 156。

²⁰⁸ 同註 2，頁 244。

²⁰⁹ Н. А. Бердяев 原著，汪劍釗譯，《自我認知》（*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Опыт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1。

²¹⁰ 黎皓智，《20 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56。

俄羅斯，與馬克思主義分庭抗禮。共黨革命成功以後，白銀時代的文化興盛走向下坡。別爾嘉耶夫認為，此與知識份子自我封閉有關聯：

太多知識份子突然變成唯美主義者、神秘主義者、通靈論者，他們鄙夷倫理學，蔑視科學……與世隔絕，脫離人民的生活。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文化復興未能成功，主因為文化菁英隔離在小圈子內，與大時代的社會思潮分離。

學界一般認為白銀時代始於 1893 年，止於列寧逝世的 1924 年（一說止於 1917 年共黨革命成功）。史達林（И. В. Сталин, 1878-1953）上台後，蘇聯的文藝政策與思想箝制達到前所未有的極端，將於下一節敘述。

1. 寫實主義

白銀時代雖由象徵主義揭開序幕，但同一時期，寫實主義在俄國尚為九〇年代的文學主流。²¹¹此時期的寫實主義分為兩種：傳統寫實主義（Реализм）與新寫實主義（Новый реализм）。兩者雖淵源相同，彼此卻有清楚差異：

- 一、新寫實主義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意識，傳統寫實主義則否。
- 二、新寫實作品有明確的社會訴求，傳統的寫實作品則較含蓄。
- 三、新寫實作品主題常是悲情的小人物，傳統寫實著重描繪人性。

新寫實主義受激進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影響很大，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點強調：「文學無法擺脫社會條件的影響與限制……不可避免地受歷史與社會的影響。」²¹²因此，「新寫實作家將注意力集中於內容，力求主題表現激進的政治色彩，以悲觀語調挖掘社會黑暗面，忽略文學藝術的其他價

²¹¹ 同註 144，頁 193。

²¹² 林建光，〈馬克思主義〉，《文訊》，2010 年 2 月號，頁 66。

值，不重視文字修飾或文體完整。」²¹³

事實上，自別林斯基以來，俄羅斯文學普遍強調作品的社會意義與教化。十九世紀末期，由於新寫實主義不注重文學的藝術價值，而知識份子從科學知識轉向追求宗教與哲學的心靈平靜，使得象徵主義一時成為主流。象徵主義盛行於 1900 至 1912 年，為白銀時代時間最長，影響最深的流派。他們將宇宙視為各種象徵的集合體，意義之外尚有影射。各作家的共同特點是文體莊嚴，喜用具重大意義的字眼，與其他作家最大的差別在其高度文化水準。象徵主義作家以提高詩韻技巧和引進新表達方式為己任，文學由此跳脫以平民為中心的狹隘，脫離社會與政治的影響。²¹⁴

2. 象徵主義

象徵主義包括兩代，第一代又被稱為頹廢派（Декаденство）或老輩象徵主義者（старшие символисты），代表人物有詩人安年斯基（И. Ф. Анненский, 1856–1909）、索洛古伯（Ф. Сологуб, 1863–1927）、巴爾蒙特（К. Д.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濟比尤絲（З. Н. Гиппиус, 1869–1945）、布留索夫（В. Я. Брюсов, 1873–1924）與梅烈日科夫斯基；第二代以伊凡諾夫（В. И. Иванов, 1866–1949）、布洛克（А. А. Блок, 1880–1921）、別雷（А. Белый, 1880–1934）為代表。第一代象徵主義作家藉由嶄新詩律表達對美的幻想，喜歡直覺而捨棄理性，喜歡暗喻而不做表面世界的描述。布留索夫偏好帶有神話與傳統風格的詩，格律大膽。巴爾蒙特所寫詩句音樂性強，跌宕昭彰，鏗然有聲，表現出音律變化之美。索洛古伯詩句則短小精悍，修辭不似布留索夫完美，詞句亦無巴爾蒙特冗長，但表現拙樸，別有風味。濟比尤絲的詩思想清晰、尖銳，以冰冷詩句冷靜剝析內心世界。安年斯基身處兩代之間，深受年輕一代敬重，詩歌多寫苦難、死亡與美，認為人生無望，唯有藝術與愛能拯救世人。²¹⁵梅烈日科夫斯基則在〈論俄國文學衰微之因與現代文學新趨勢〉闡釋了象徵主義的基本原則：「未言明之物，與透過象徵之美隱約可見之物，較之用言詞直接表達的東西更能

²¹³ 同註 110，頁 199。

²¹⁴ 同註 110，頁 210。

²¹⁵ 同註 144，頁 195-198。

扣人心弦。「象徵」使詩的風格與藝術層面，變得潔淨、晶瑩……詞句只能限定思想，「象徵」卻能表達思想的無限。」²¹⁶

第二代象徵主義者又稱年輕輩象徵主義者（младшие символисты），深受哲學家索洛維約夫影響，帶有濃厚神秘主義以及親斯拉夫派之思想。伊凡諾夫知識淵博，深入研究神話學。他認為藝術的最高成就是將神話與宗教融入詩歌與戲劇，因此其詩凝重、深沈。別雷的作品則不易捉摸，充分反映其矛盾性格。他將詩當作交響樂般譜寫，不僅以音樂為題，還將詩集稱為交響樂，其韻腳變化，諧音換移，都使詩句變化多端，令人有聆聽樂曲之感。別雷的小說《銀鴿》（*Серебряный голубь*, 1910）與《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 1916），融合果戈里將幻想與現實、理想與象徵並列的手法，韻文音調諧美，文字生動有力，其文體造成「革命」，他的「詩韻化散文」深深影響當時的俄文詩與散文。象徵主義至布洛克而登峰造極，同時開始衰微。年輕時的布洛克詩歌柔美，富含神秘氣息，但 1905 年後，他的詩歌開始帶有民粹主義、斯拉夫派與東正教救世思想，創作主題多討論俄羅斯的民族特徵與命運。²¹⁷

3. 阿克美主義

1909 年，身為兩代象徵派橋樑的安年斯基逝世，象徵派內部出現分裂。許多原為象徵派的年輕詩人不滿象徵派過度使用隱喻，厭倦象徵主義形而上的理論，以及追求神秘主義，他們主張以入世的文字描寫具體之物，認為唯有如此才能以沒有成見的眼光欣賞世界。這些年輕人形成後來的阿克美派（акмеизм），古密略夫（Н. С. Гумилёв, 1886-1921）為其代表人物。「阿克美」一詞源於希臘，意指高峰、成熟。古密略夫於 1913 年在《阿波羅》（*Аполлон*）雜誌上發表〈象徵主義的遺產與阿克美主義〉（“Наследие символизма и акмеизм”，1913）一文，文中表明阿克美派將繼承象徵主義。他們不否定象徵主義的貢獻，但要將詩歌拉回現實世界，要求詞語生動、明確，希望詩歌回歸藝術，詩人不是傳教士，應為純粹的藝術家。因此古

²¹⁶ 翟厚隆選譯，《十月革命前後蘇聯文學流派—上編》。上海：上海譯文，1998，頁 6。

²¹⁷ 同註 144，頁 203-210。

密略夫言：「我們歌頌玫瑰，因為它美麗，並不因為它是純潔的象徵。」²¹⁸

古密略夫以外，阿克美派主要代表者還有阿赫瑪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與孟德斯丹(О. Э.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891-1938)。阿赫瑪托娃詩句簡潔，節奏勻稱，具體精繪真實的感情與日常事件。她從不堆砌詞彙，卻能不落俗套，寫情纏綿縷縷，熱情之餘又有極端的溫柔。²¹⁹蘇維埃時期因共黨認為其詩悲觀空洞，未准出版，至五〇年代後始獲平反。孟德斯丹則音韻謹慎，選字精確，節奏從容不迫，予人氣魄莊嚴之感。²²⁰共黨革命後，他與許多作家一樣對新政權懷抱新希望，幻想美好的新時代到來。1925年出版《時代的喧囂》(Шум времени, 1925)，文字已流露對新政權的不滿，引來當權監視，後來遭二度逮捕流放，最後死於海參崴勞改營。阿克美派的全盛期為1913年至1916年。共黨革命後，號召為藝術而藝術的阿克美派被視為反動，不受鼓勵。²²¹

4. 未來主義

阿克美主義雖然反對象徵主義，但雙方根源相同，前者甚至繼承後者的創作技巧。未來主義(Футуризм)則並不相同，未來主義者主張改革藝術風格，他們鄙視過去，揚言推翻偶像，常口出狂言，以奇特言行吸引世人目光。²²²未來主義原為俄國前衛派(Авангард)分支，為藝術流派之一。1909年起由謝維亮寧(И. Северянин, 1887-1941)引入文學，形成「自我未來主義」(Эгофутуризм)。1912年底，瑪亞科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1893-1930)等人以一篇〈給庸俗耳光〉(“Пощёщи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вкусу”, 1912)奠定「立體未來主義」(Кубофутуризм)基礎。未來主義不曾有過統一的中心與綱領，因此派別眾多，之後還有「離心機派」(Центрифуга)、「詩歌頂樓派」(Мезонин поэзии)等分支，但都持續不久。

未來主義者在〈給庸俗耳光〉中，以激進姿態推翻傳統：「……科學

²¹⁸ 同註 110，頁 226。

²¹⁹ 歐茵西，《浪漫與沉思》。台北：聯經，2001，頁 220。

²²⁰ 同註 144，頁 214。

²²¹ 同註 110，頁 226。

²²² 同註 144，頁 214。

院和普希金比象形文字還難理解。我們要將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從現代生活的輪船上拋出去……我們要從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上，看他們多麼渺小！」²²³高爾基於 1915 年發表文章，表達對未來主義者的看法：

俄國沒有未來主義！有的只是謝維亮寧、瑪亞科夫斯基與布爾柳克（Д. Д. Бурлюк, 1882-1967）等天才……他們年輕，不因循守舊，有嶄新的、奇特的語言……很難說他們將成為什麼，但我希望他們將是年輕、清新的歌手。……不久以前我初次見到他們，他們是活潑的人，不像像外界形容的那般可怕。

不論未來派如何可笑，我們都應當為他們敞開大門，他們是呼喚大眾走向新生活的年輕歌手。²²⁴

未來主義者嘗試擺脫詩韻與文學傳統的束縛，創造新字，進行「字的實驗」。他們探索字源，從中加上前綴或字尾變化，利用這些新字組合成詩歌。²²⁵十月革命以後，未來主義者多數投入新政權的政治運動，組成左翼陣線聯盟（Левый фронт искусств），其中瑪亞科夫斯基非常活躍。然而未來主義自詡為「國家藝術」，加上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態度惹惱了當局，二〇年代初期未來主義終於被迫結束。

5. 其他流派

1919 年，葉謝寧（С. А. Есенин, 1895-1925）與一些作家發表文學宣言，宣稱是「藝術形式之美」的追求者，自稱意象派（Имажинизм）。意象派創於 1918 年，有學者認為其係象徵主義脫胎而來。²²⁶意象派強調，「意象」對詩歌創作的重要性遠超過任何要素。詩人應透過詩歌表現生活的意象，而且意象必須生動、驚人，方能打動讀者心弦。意象派聲勢不大，其中僅

²²³ 同註 216，頁 111。

²²⁴ 同註 216，頁 147-149。

²²⁵ 同註 110，頁 237。

²²⁶ Marc Slonim 原著，湯新楣譯，《現代俄國文學史》（*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 264。

葉謝寧之作廣受矚目。但葉謝寧重要性實與意象派無關。身為詩人，葉謝寧係因鄉村詩歌而富盛名，1925年葉謝寧去世後，意象派便趨沒落。

除了上述派別，同一時期，俄國出現了數十種文藝派別，如尚古主義（Примитивизм）、絕對主義（Супрематизм）、表現派（Экспрессионизм）等。此外，二〇年代初期聲勢漸高的無產階級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左翼陣線聯盟、塞拉皮翁兄弟會（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及同路人（Попутчики）等，紛紛於列寧過世後銷聲匿跡，或被官方文學團體—蘇聯作家協會（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統整。蘇聯文學自此進入冰封期。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進入所謂「解凍」（оттепель）時期，但國家政策並無變化，反因史達林去世而更保守、僵化。真正的文學解禁要到八〇年代中期，戈巴契夫（М. С. Горбачёв, 1931-）上台。戈巴契夫標榜「新思維」，使知識界思想文化重新活躍，禁書得以出版，同時意識形態的分裂已無法壓制，直至蘇聯終於解體，文學文化也進入全新階段。

（二）蘇聯文藝政策

1. 世紀之交的文藝活動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雖然俄國社會動蕩不安，文藝發展卻異常活潑。知識份子聚集在劇院、酒館與文學沙龍，針對社會情勢與文學思潮進行論戰。表演藝術如芭蕾舞、電影、舞台劇等亦大受歡迎，尼津斯基（В. Ф. Нижинский, 1889-1950）與帕弗洛娃（А. П. Павлова, 1881-1931）的舞蹈，令世人首度瞭解俄羅斯芭蕾舞之美。繪畫流派的多元，更是到了可與文學團體匹敵的地步，列賓（И. Е. Репин, 1844-1930）之作如《伏爾加河的繃夫》（*Бурлаки на Волге*, 1873）、《伊凡雷帝弑子》（*Иван Грозный и его сын Иван 16 ноября 1581 года*, 1873）、《普希金在沙皇村的朗讀》（*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читает свою поэму перед Гавриилом Державиным на лицейском экзамене 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 8 января 1815 года*, 1911），及多位名人肖像畫，如托爾斯泰、安東·魯賓斯坦（А. Г. Рубинштейн, 1829-1894）、穆索斯基（М. П. Мусоргский, 1839-1881）等，為俄羅斯的歷史留下珍貴紀錄。音樂方面，五人國民樂派（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музыкальная школа 或 Магучая кучка）²²⁷、史特拉汶斯基（И. Ф. Стравинский, 1882-1971）與拉赫曼尼諾夫（С. В. Рахманинов, 1837-1943），至今仍為人所悉。

1905 年革命事件後，沙皇內務大臣提議建立杜馬國會（Дума），沙皇亦在數月後發表「十月宣言」（октябрь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全稱 высочайший манифест об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орядка），確立一系列基本國民權利，包括媒體出版自由，言論集會自由，組立政黨自由，個人不可侵犯權，選舉權。²²⁸多數知識份子對沙皇政府的讓步感到滿意，但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的鐵腕鎮壓卻使激進份子的顛覆活動復熾，恐怖活動再度壯大。列寧於當年 11 月立即發表〈政黨組織及其文學〉（“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05），號召以

²²⁷ 成員共五人，穆索斯基外，尚有包羅定（А. П. Бородин, 1833-1887）、庫伊（Ц. А. Кюи, 1835-1918）、巴拉基列夫（М. А. Балакирев, 1837-1910）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И. А.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1844-1908）。

²²⁸ Antonella Salomoni 原著，文娟等三人合譯，《列寧與俄國革命》（*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香港：三聯書店，2005，頁 28。

自由寫作（及無產階級寫作）對抗沙皇政府：

我們的出版物仍是違禁品……長久以來我們只能在寫作上屈從——這是思想的農奴制度！我們應將寫作視為政黨事業的一部分，寫作不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我們不歡迎不帶政治色彩的寫作！也許會有知識份子認為，這樣會貶低批評與創作的自由，會使其僵化，形成官僚主義。這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毫無意義的叫嚷。

擺脫農奴制度般的書報檢查制度後，我們要創辦自由的報刊！所謂自由的報刊不僅擺脫員警的壓迫，也擺脫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揭露這種偽善行為，拆除假招牌，以真正自由的無產階級作品對抗資產階級作品。自由的寫作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的「菁英份子」服務，而是為千萬勞動人民，為國家的力量與未來服務……²²⁹

此份宣言不僅是政治宣言，亦可視同共黨文學綱領的前身。列寧顯然相當瞭解文學的力量，符合「政黨文學原則」的作品皆受熱烈推崇，因此高爾基的小說《母親》（*Мать*, 1906）甫發表，立刻被渲染為無產階級文學的範本，此書的確也鼓動了許多激進年輕人投身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軍死傷數百萬，嚴重暴露沙皇政府的無能，列寧的革命聲勢因而水漲船高。1917年3月16日²³⁰沙皇宣布退位，羅曼諾夫王朝結束，百姓翹首企盼復興衰敗多時的工農業，希望新政府帶來改善生活的新氣象。然而共黨先剷除臨時政府，然後以秘密警察（又稱契卡）²³¹排除異己，1918年開啟了紅軍與白軍為期兩年的內戰。1920年11月內戰結

²²⁹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И. Ленин, 1905〉，《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10.04.20

〈<http://www.marxists.org/russkij/lenin/1905/09/part%20lit.htm>〉

²³⁰ 俄國舊曆為3月2日。

²³¹ 契卡，全名為：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附屬全俄羅斯取締反革命及陰謀破壞特別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при Совете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миссаров РСФСР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俄文原文縮寫為 ВЧК СНК РСФСР，一般只取其中兩字 ЧК，意為特別委員會。契卡始於1917年，止於1922年。

束，全國陷入饑餓與混亂，俄共政局岌岌可危。為挽狂瀾，列寧宣佈實施新經濟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暫時放棄共產制度。又為籠絡知識份子，俄共亦對文藝活動採寬容政策，文化現象喧騰一時。此時文學流派豐富，除上述左傾的文學流派左翼陣線聯盟與無產階級文化派外，傳統的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亦得以延續。創作理論也大放異彩，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形式主義文學批評等各家相互論爭。二〇年代上半葉的文學表現毫不遜於白銀時代的巔峰之作，如巴斯特納克的詩集《主題與變奏》（*Темы и вариации*, 1923）、葉謝寧的《普加喬夫》（*Пугачев*, 1921）、蕭洛霍夫（*М.А. Шолохов*, 1905-1984）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 1926）與布爾加科夫（*М.А.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的短篇傑作《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1925）等多數蘇聯作家代表作，均完成於此時期。可惜榮景短暫，1925年，政府發布〈黨的文學政策〉（“*О политике партии в обла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25），1932年發布〈改組文藝團體〉（“*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1932）決議，文藝活動嘎然而止；三〇年代中期開始的大整肅（又譯大清洗）²³²致使無數知識份子無辜喪命，倖存者若非逃往國外，便只能以緘默自保了。

2. 無產階級文化派與〈黨的文學政策〉

1925年，俄共針對無產階級文化派發布〈黨的文學政策〉。十月革命後，以波格丹諾夫（*А·А·Богданов* 1873—1928）為首的文人創立了無產階級文化派，並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進行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活動。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吸引許多工人參與，在全國各地設置分會多達1381個，會員約40萬。此派詩人歌頌機器美學與集體勞動，因此作品多描寫「工廠喧鬧」、「機器運轉的嘰嘎聲」，只言「集體」，不談個人。²³³他們摒棄傳統文學，責備政府出版「假革命作品」，抨擊高爾基與瑪亞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不符合「黨的原則」。²³⁴

無產階級文化派有兩項重要特徵：追求純無產階級的文化，並主張

²³² 大整肅：*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整肅最高峰時，為葉若夫（*Н. И. Ежов*, 1895-1940）出任秘密警察隊長，因此整肅時期又被稱為「葉若夫時期」（*Ежовщина*）。

²³³ 馬龍閃，《蘇聯劇變的文化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47。

²³⁴ 同註226，頁287。

獨立與自治。他們聲稱，唯有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才能創造新文化，才能避免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文化派將農民與知識份子排除於無產階級外，認為唯有無產階級出身的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方能勝任建設新文化的任務。他們反對將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置於蘇維埃政府之下。為此，列寧與波格丹諾夫進行多次論戰，俄共中央亦多次聲明譴責，但他們堅持自己的主張，並未收斂態度。1921年在列寧主導下，雜誌《紅色處女地》（*Красная новь*）創刊；1923年繼承無產階級文化派思想的雜誌《在崗位上》（*На посту*）也出刊，兩方隔空交火。

列寧逝世後一年，以史達林為首的俄共中央在〈黨的文學政策〉中重申立場。首先，俄共批評無產階級文化派摒棄非工人階級作家的作法過於壟斷，此一手段只會加深階級意識，無法打造真正的無產階級，且農民人口仍佔多數，捨農重工可能使兩者分化，無法團結。其次，此派思想過於偏激，俄共強調「黨的文學」不應如此。第三，文學藝術各有特殊性，因此鼓勵各文學流派自由競賽，反對以官僚方法行政干預：「……本黨不介入任何文學流派，也不表態支持任一文學團體。……本黨宣佈支持各流派的自由競賽。」²³⁵

此決議發布後廣受溫和派好評，同時亦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歸屬於政府工會。1932年，俄共正式將其解散。

²³⁵ 〈"О политике партии в обла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 июня 1925 г.〉,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им. М.В.Ломоносова》. 2010.04.20 〈<http://www.hist.msu.ru/ER/Etext/USSR/1925.htm>〉

3. 〈改組文藝團體〉

〈黨的文學政策〉發布後，各文學團體積極表現，力圖穩固文學地位。文學創作數量頗豐，但文藝界仍四分五裂，彼此攻訐。高爾基擔心派別鬥爭的惡性循環將分裂文壇：「各種派別互相抹黑……我認為這是文學災難。看不見任何明白自己真正該做什麼的團體，他們的鬥爭充滿虛榮心和個人主義。」²³⁶1932年，俄共宣佈〈改組文藝團體〉：

經過長久努力，我們已從工農階級培養出新一代作家與藝術家。如今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РАПП—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與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ВОАПП—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ассоциаций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的作用顯得狹隘，並嚴重阻礙藝術創作之發展。

因此俄共中央決議：

1. 取消所有無產階級作家團體（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與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
2. 聯合支持蘇維埃政權及渴望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家，組成以黨領導的蘇聯作家協會。
3. 本決議亦施行於其他藝文團體。
4. 即日制定相關政策，並立即執行此決議。²³⁷

與1925年的政策相較，1932年的政策顯然大有不同。另一方面，此政策也為以後的大整肅鋪路。從此至史達林逝世為止近三十年間，蘇聯文壇上少有佳作。

²³⁶ 葉水夫主編，《蘇聯文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78。

²³⁷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23 апреля 1932 г.〉，《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им. М.В.Ломоносова》。2010.04.20 〈<http://www.hist.msu.ru/ER/Etext/USSR/1932.htm>〉

二、僑民文學：三波流亡潮

早在沙皇時期，已有流亡俄羅斯知識份子海外。十九世紀末期，流亡人數迅速增加，赫爾岑、巴枯寧、拉夫洛夫等人的理論，催生了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革命行動。共黨革命成功以後，知識份子的態度不一：有人振臂擁抱革命，準備迎接新時代，如瑪亞科夫斯基、布洛克、別雷、布留索夫；有人無所適從，暫時選擇觀望；為數眾多的知識份子則因無法接受共黨的意識型態，紛紛移居海外，柏林、巴黎與布拉格一時成為俄僑集中地，他們是蘇聯時期第一批流亡人士。

（一）三波流亡潮

第一波流亡潮（первая волна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發生於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初期，人數最多，人才濟濟，包括哲學家、作家、舞蹈家、音樂家、畫家、社會學家、科學家、發明家……，如：別爾嘉耶夫、弗蘭克、布寧（И. А. Бунин, 1870-1953）、巴爾蒙特（К. Д.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3）梅列日科夫斯基、濟比尤絲、謝維亮寧、亞歷克謝·托爾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 1883-1945）、庫普林（А. Н. Куприн, 1870-1938）、茨薇塔耶娃（М. И.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納博科夫（В. В. Набоков, 1899-1977）、帕弗洛娃、普羅高菲夫（С. С. Прокофьев, 1891-1953）、拉赫曼尼諾夫、史特拉汶斯基、列賓、夏卡爾（М. З. Шагал, 1887-1985）均在其列。他們離開俄國的原因，幾乎都是不贊同共黨革命，無法認同共黨意識形態。1922年，另有160餘名知識份子以「蘇維埃政權敵人的朋友」²³⁸為由，被俄共政府驅逐出境，強行遣送德國。此事件被俄國文化史家稱為「哲學船」（филосовский корабль）事件。²³⁹

第二波流亡潮（вторая волна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發生於二次大戰末期，流亡者身份及流亡原因均較複雜。部份流亡者原曾居住東歐，因俄共將影響力延伸至東歐，他們只得繼續逃亡西歐。另有淪為德國的蘇聯戰俘，戰後留在德國或轉往其他國家。還有部份流亡者曾經歷三〇年代大整肅，

²³⁸ 同註 18，頁 186。

²³⁹ 林賢治，〈蘇聯知識份子的命運〉，《雨花雜誌》，2009年第1期，頁38。

趁戰事結束的機會逃離蘇聯。由於環境艱險，得以順利逃出者為數不多，規模較小，影響力和使命感也遠遜於第一代僑民。

第三波流亡潮（третья волна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發生於六〇年代中期至七〇年代初期，絕大多數出自政治因素流亡：有的與當局不和，更多的是被褫奪公民權並驅逐出境者。主要代表者為索忍尼辛（А. И. Солженицин, 1918-2008）、阿克薛諾夫（В. П. Аксёнов, 1932-2009）、布洛德斯基（И. А. Бродский, 1940-1996）等。

（二）僑民文化特徵

這些流亡海外的俄羅斯知識份子，大多積極投入新生活，以傳承與復興俄羅斯文化自許。第一代僑民原以為出國只是暫時，相信共黨政權必敗，回國之日指日可待。數年以後，他們發現共黨政權日益穩固，返國已不可行，才開始為久居國外作準備，積極籌辦僑民學校，延續俄羅斯語言與文化。另一方面，由於1923年起蘇聯政府禁止僑民文學作品在國內發表，1925年俄共頒布〈黨的文學政策〉，加上史達林的文藝政策愈趨嚴厲，俄國國內外的文化界被迫中斷溝通。無法與蘇聯文藝界取得聯繫的狀態下，流亡海外的俄僑遂發展出另一型態的文化與文學。

這種情況下形成的文化與文學，使命感是一大特徵。例如第一代僑民離開俄羅斯非為了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深感自己肩負神聖使命。梅烈日科夫斯基說：「我們不是被驅逐者，而是使者！」²⁴⁰辦學以外，他們籌建劇院，成立作家協會，舉行文化沙龍。據統計，俄僑在巴黎有57個文學沙龍，²⁴¹其中梅烈日科夫斯基週日讀書會（воскресенья чтения у Мережковских）、綠燈社（зелёная лампа）提攜後進，幫助很大。四〇年代以前遠到巴黎的俄僑，幾乎無人未曾參與此二沙龍。文人聚集沙龍，常嚴肅討論僑民的文化精神，與文化使命。梅烈日科夫斯基呼籲：「文學的任務在重建與保存文化精神的完整性。我們不僅要保護從俄國帶出來的『珍

²⁴⁰ В. В. Агеносов 原著，劉文飛等譯，《俄羅斯僑民文學史》（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107。

²⁴¹ 同註18，頁194。

藏品』，還要步出『俄羅斯小圈子』，因為俄羅斯的文化規模比這小圈子寬廣得多。」²⁴²大家深表贊同，因此凝聚了向心力和互助的力量。

使命感以外，思鄉情與愛國心也是俄僑的文化特色。茨薇塔耶娃的〈祖國〉（“Родина”，1932）便將這種情感融入詩中：

啊，艱深的語言！

真希望能理解—
農人在我之前已唱過：

「俄羅斯，我的祖國！」

但從卡盧茲丘陵起
她便向我展現—
遠方，遙遠的土地，
異鄉啊，我的祖國！

與痛苦一般天生註定的遠方
是祖國，也是厄運，
無論何處，無論遠近，
我要把她整個帶在身上！

化咫尺為天涯的遠方，
說著「回家吧！」的遠方，
到處一直到高高的星辰—
攝取我的形影！

為此，我在額上潑灑
比水更藍的遠方。
妳啊！縱使我截去這手—

²⁴² 同註 240，頁 33。

即便一雙！也要以唇寫在
斷頭台上：那撕裂我心的地方—
是我的驕傲，我的祖國！²⁴³

茨薇塔耶娃知蘇聯形勢不定，卻執意前往「斷頭台」，即因俄羅斯仍是詩人的驕傲。另一位流亡作家納博科夫也在〈槍斃〉(“Расстрел”, 1927)一詩中表達同樣的心情：

那是夜，我剛躺下，
床便飄盪向俄羅斯；
我被引導去深谷，
有人要把我殺死。

我驚醒，漆黑中，椅子上
放著火柴和時鐘，
閃閃發光的指針
瞪視我如火力集中的砲口。

手臂護著頸和胸—
有人要朝我射擊。
我不敢把視線從
渾暗的火圈移走。

鐘的滴答滴答碰觸
我麻木的意識，
我重新知覺
流亡拯救的庇護。

但我的心，多麼希望
一切如此真實：

²⁴³ 歐茵西教授中譯，見註 219，頁 251。

俄羅斯，星星，槍斃之夜，
還有深谷的稠李花香。²⁴⁴

其中有對祖國烈愛，也有對祖國的恨。布寧《被詛咒的日子》(*Окаянные дни*, 1920) 對時局作了詳細記載：「晚上十點讀報。政變！共和國成立！我大大驚嚇。村婦的談話那麼充滿敵意、凶狠、愚蠢。『殺！』— 這個字變得那麼簡單！想到我的世界將成為虛空，我什麼也不想寫了……」²⁴⁵濟比尤絲的短詩〈如果〉(“Если”，1918)，描寫對俄羅斯又愛又恨的心情。她以失去亮光比喻俄國現勢，以人劣於獸喻共產黨徒，詩末卻寫道：倘若我的俄羅斯滅亡—我也將隨她而去。²⁴⁶

僑民文化的第三特徵是宗教性。許多僑外知識份子嚮往宗教的救贖力量。由於流亡的歷程充滿苦難，他們向宗教尋求慰藉。又因為東正教在俄羅斯傳統文化中的深遠影響力，俄僑藉回歸宗教，強調自己的民族性。梅烈日科夫斯基即言：「我們已經走到歷史盡頭，但是，歷史的盡頭即是宗教的開端。」²⁴⁷別爾嘉耶夫亦言：「唯有宗教涵蓋我們俄國人民的價值：我們歷經苦難後領悟的一切、我們的愛、思想、創造性、高昂的動力與想像。」²⁴⁸俄僑文學例如布寧、茨薇塔耶娃等人的作品都繼承了十九世紀作家探索宗教的傳統，以《聖經》的意象為創作靈感的泉源。

俄國僑民文化是蘇聯文化史上複雜而特別的現象。俄羅斯文化飽受共黨政權摧殘之時，俄僑便肩負起保存俄羅斯純正文化的責任。他們在文學、音樂、舞蹈、科學上都甚有成就，例如俄國作家先後五次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其中三人為僑民作家。²⁴⁹唯第一代僑民多殞於三〇年代，文學雖繼承

²⁴⁴ 同註 243，頁 288。

²⁴⁵ 〈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Бунин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2010.04.20
(<http://bunin.niv.ru/bunin/bio/okayannye-dni-1.htm>)

²⁴⁶ 原詩僅四句：Если гаснет свет - я ничего не вижу./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зверь - я его ненавижу./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хуже зверя - я его убиваю./ Если кончена моя Россия - я умираю.

²⁴⁷ Julius Friedrich Hecker 原著，高驊、楊續合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此書為 *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與 *Religion and Communism: A study of Religion and Atheism in Soviet Russia* 兩本專書之合刊)。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 150-151。

²⁴⁸ 同註 247，頁 155。

²⁴⁹ 此三人為布寧(1933年獲獎)，索忍尼辛(1970年獲獎)與布洛德斯基(1987年獲獎)。

革命以前的風格與技巧，但未能開創新局。四〇年代，僑民文化推手的主力，如梅烈日科夫斯基、濟比尤絲、庫普林、巴爾蒙特、茨薇塔耶娃、亞歷克謝·托爾斯泰等人先後辭世，隨後二次大戰予俄國僑民甚大打擊：東歐陷入了共黨之手，柏林、巴黎等地遭德軍佔領，僑民四散，難成氣候。部份移居美洲的知識份子雖有成就，終究孤掌難鳴，力量不足。蘇聯解體前後，大批僑民返國，形成回歸熱潮。但這些返國僑民失去往昔批評與競爭的對手，影響力大不如前，僑民文學終於結束。²⁵⁰



²⁵⁰ 劉文飛，《文學魔方：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2。

第二節 「國內流亡者」

十月革命後，知識份子對革命及隨之而來的政權持不同態度。有人反對、擁護，亦有處於徬徨中不知如何選擇者。無論立場如何，眾人在作品中均有所表現。大整肅前後，知識份子除受迫害而亡，自殺者亦多，顯示當時政治力已經深入影響文藝發展，日後文學更朝「一言堂」情況發展。新歷史主義者格林布拉特曾言：「權力與權威控制文學，利用文學消泯社會中的異己力量，但文學的獨特性往往成為產生反對力量的溫床。」²⁵¹

例如阿赫瑪托娃，一生作品以情詩為多，被蘇聯當局批為腐化學子心靈。但她扛住所有非難，情詩外，更以《安魂曲》（*Реквием*，完成於1940年，1987年才首次於蘇聯發表）打動國內外人心，也揭開大整肅時期與她有相同命運的女性心聲。巴斯特納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三〇年代為明哲保身，以翻譯詩歌為己任，1946年終究提筆創作了一生唯一的長篇小說，希望傳承俄國人用血汗換取的經歷。巴斯特納克雖於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飽受攻訐，1959年留下此詩：

我迷失，如被圍獵的野獸。
某處有人、自由、光，
背後卻是獵人的喧喊，
沒有逃生之路。

漆黑的林，池塘岸旁
是被划落的杉樹幹，
所有道路已被截斷。
要來的，來吧！我不在乎。

我行過什麼齷齪？
是兇手還是惡棍？
我曾使世界哭泣，
為我故土的美麗。

²⁵¹ 同註 11，頁 168。

即使如此，墳墓邊緣，
時刻終將來臨—
善的精神將制伏
卑鄙與邪惡之力。²⁵²

布爾加科夫（М. А.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身後被譽為「魔幻大師」，但生前幾乎所有作品都需經過修改才准發表。即使如此，他不改幽默本性，作品依舊盡嘲諷之能事，以詼諧手法寫出當時代最深沈的痛。

這三位知識份子沒有在關鍵時刻離棄俄羅斯，但在俄羅斯卻都成了與他人格格不入的異類，阿赫瑪托娃更被當時的蘇聯文學批評家指為「蘇聯國內的僑民」。他們不幸活在將知識份子當成工具的蘇聯，卻幸運通過大整肅的考驗，進而用筆將個人生活與歷史用另一種方式傳承下來。生前與名無緣，死後載譽人間。

一、阿赫瑪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

阿赫瑪托娃不僅是傑出的阿克美派詩人，也是俄國近代著名的女詩人，與米拉·洛赫薇茨卡婭（М. А. Лохвицкая, 1869-1905）²⁵³茨薇塔耶娃、濟比尤絲四人並稱俄國的薩福（русские Сапфы）。²⁵⁴她以女性特有的細膩與精煉的語言寫感情的震顫，以溫婉的筆調抒發內心激動，大膽表露激情，熱情之餘有極端溫柔；從不堆砌詞藻卻能不落俗套。²⁵⁵

1910年，阿赫瑪托娃與古密略夫結婚，並由其領進文藝圈，從此大放異彩，在詩歌的成就遠超過古密略夫。1911年最後一天，野狗俱樂部（Бродячая собака）開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野狗俱樂部一度成為俄羅斯先鋒藝術與文學總部，吸引了文化界耆宿與知名人士：瑪亞科夫

²⁵² 同註 243，頁 271-272。

²⁵³ 米拉·洛赫薇茨卡婭（М. А. Лохвицкая, 1869-1905）為蘇聯時期諷刺女作家苔菲（Тэффи, 1872-1952）的姊姊。十月革命後，苔菲流亡巴黎。

²⁵⁴ 薩福（Sappho，約西元前 7 世紀），古希臘著名的女抒情詩人，一生寫過不少情詩、婚歌、頌神詩、銘辭等。薩福在羅德斯島建立了女子學校，專門教導女子寫作詩歌，受當地人敬重。

²⁵⁵ 同註 110，頁 229-232。

斯基、赫列布尼科夫、巴爾蒙特、古密略夫、阿赫瑪托娃……都是當時出入俱樂部名人。阿赫瑪托娃更在此處得到巴爾蒙特的稱許：「迄今，我只認識兩位女詩人：薩福與米拉·洛赫薇茨卡婭。今晚我認識了第三位：安娜·阿赫瑪托娃。」²⁵⁶他的肯定對阿赫瑪托娃是重要的鼓勵。

俄國文學評論家帕夫洛夫斯基（А. И. Павловский）認為阿赫瑪托娃早期的詩歌，常表現出「驚慌」與「恐懼」，詩歌中充滿「不穩定性」。這源自她的寫作背景—社會的動盪與個人生活的艱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阿赫瑪托娃記載：「五月初，彼得堡的季節停頓下來，一切漸漸分崩離析。這次與彼得堡的訣別成為永恆。我們回到的不再是彼得堡，而是彼得格勒了。從十九世紀一下進入二十世紀，城市的外貌變得面目全非。」²⁵⁷就如她在〈紀念 1914 年 7 月 19 日〉（“Памяти 19 июля 1914”，1916）詩中所表現的：

我們衰老了一百年，而這
發生在一點：
短暫的夏天已經結束，
翻耕過的田野冒起硝煙。²⁵⁸

1917 年出版的第三本詩集《白色群鳥》（*Белая стая*, 1917），延續抒情主題，但多了祖國、飢餓、貧困與戰爭。英國學者海特（Amanda Haight）認為，阿赫瑪托娃與大多數俄國人一樣，無法理解戰爭的意義，但對戰爭帶來的後果—死亡，卻有很深的感觸：

這片艱苦不安的土地，
觸發絕望恐怖的瘟疫。
西方，驕陽閃耀，
城市沐浴陽光裡，
而此地，樓房釘上了十字，

²⁵⁶ 汪劍釗，《阿赫瑪托娃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頁 55。

²⁵⁷ 同上註，頁 71。

²⁵⁸ 〈Памяти 19 июля 1914〉，《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Белая стая (1917)》. 2010.05.12
〈<http://ahmatova.niv.ru/ahmatova/text/stihi/1917/1917-61.htm>〉

十月革命爆發前，已有不少知識份子準備移居外國。但阿赫瑪托娃堅持留在祖國，寫下〈我聽到一個聲音〉（“Мне голос был. Он звал утешно”，1917）：

我聽到一個聲音。低聲呼喚。
它說：到這裡來，
捨棄你荒涼與罪惡的故鄉。
永遠離開俄羅斯。
我將洗淨你手上血痕，
拔除你心上黑色恥辱，
我將以新的命名
覆蓋你失敗與委屈的痛苦。
但我無動於衷，
用雙手摀住耳朵，
免得那些卑劣的話語
玷污我悲苦的精神。²⁶⁰

1921年，楚科夫斯基（К. И.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9）發表文章〈兩個俄羅斯：阿赫瑪托娃與瑪亞科夫斯基〉（“Две России. Ахматова и Маяковский”，1921），認為兩位詩人各代表一種創作風格。前者代表傳統，緬懷過去，試圖恢復藝術構造的完整與精確性；後者則著眼未來與革新。楚科夫斯基十分推崇阿赫瑪托娃，曾言「她的名字是俄羅斯文學藝術中最寶貴的名字之一」。²⁶¹楚科夫斯基精確捕捉住阿赫瑪特娃詩歌的風韻，但此篇文章日後卻被大肆濫用，指阿赫瑪托娃不合時宜。1923年，無產階級作家列列維奇（Г. Лелевич, 1901-1945）為文攻擊阿赫瑪托娃：「還能指望有什麼比詩歌更清楚證明阿赫瑪托娃的反革命性呢？她無疑是文學上的國

²⁵⁹ 同註 110，頁 232。

²⁶⁰ 〈Мне голос был. Он звал утешно〉，〈Стихия〉，2010.05.12
〈<http://www.litera.ru/stixiya/authors/axmatova/all.html#mne-golos-by1>〉

²⁶¹ 同註 256，頁 104。

內僑民。」²⁶²

其他無產階級作家更言，她的詩歌除了愛情什麼也沒有，「既無勞動，也沒寫集體」。二〇年代中後期後，阿赫瑪托娃便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為餬口，她翻譯外國詩歌，研究普希金，撰寫論文。此時期她的朋友不是已離開俄羅斯，就是已遭迫害。

（一）《安魂曲》

對阿赫瑪托娃而言，「大整肅」自 1921 古密略夫無端被捕處決後，便已開始。作品被禁止發表，然後兒子多次被捕，1937 年正式被流放。之後 17 個月，她不放過每個探監機會，隨著長長的人龍，只為見兒子一面。這成了她寫下《安魂曲》的動機：

在葉若夫肆虐的年代，我在列寧格勒的探監隊伍中過了 17 個月。某次，有人認出我。當時一個站在我身邊的女人……湊近我耳朵問道：

「喂，您能描述這裡的場景嗎？」

我回：「能。」

於是，曾經有過的笑意，再度拂過她的臉龐。²⁶³

由於古密略夫與其子都因政治因素遭迫害，阿赫瑪托娃亦被列為觀察對象，她本人與朋友也認為安娜必定被監視。為了保存這部作品，阿赫瑪托娃與朋友煞費苦心。阿赫瑪托娃通常會拜訪朋友，或請朋友到家中作客，再大聲聊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趁機將寫滿字的紙片給朋友默讀。他們就這麼一句句默背，直到全背會了，再由安娜親自燒毀。安娜的朋友們，沒人知道除了自己，還有誰受託背下詩句。也因此《安魂曲》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口耳相傳，直到 1987 年才得以全文發表。《安魂曲》之所以能長時

²⁶² 同註 256，頁 109。

²⁶³ 〈Реквием〉，《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2010.05.12
〈<http://ahmatova.niv.ru/ahmatova/stihi/rekviem.htm>〉

間口耳相傳，除了安娜的朋友協助有功，也因此詩寫出了當時所有遭流放家庭的心聲：

靜靜的頓河靜靜地流淌，
澄黃的月亮走進房。
歪帶著帽子走進來，
月兒見到了一個影。
這是一個生病的女人，
這是一個孤苦的女人，
丈夫進墳，兒子入監，
請為我祈禱。²⁶⁴

1940年，安娜的詩集再度獲准發行，然而年底，蘇聯當局又發下禁令，銷毀所有已出版詩集。此時巴斯特納克給了她重要的精神慰藉：「……如何才能提醒您，活著和想要活著，是您對活著的人應盡的義務。生活容易被摧毀，很少人撐得住……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失去希望。」²⁶⁵然而1946年蘇聯當局發布一項決議，聲明阿赫瑪托娃與左琴科之作品對青少年有害，批判她的作品是貴族小女人的詩歌，因此蘇聯作家協會開除兩人的會籍，並停止刊登他們的作品。此決議除影響國內文藝界，對僑民而言，也阻斷了他們回國的想法。

1953年，史達林逝世，對安娜的禁令終於稍有放鬆。六〇年代，列寧格勒開始有地下活動的詩歌小組，其中布洛德茨基等人時常去拜訪安娜，向她徵求意見。布洛德茨基更於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66年安娜病逝，她的一生既漫長又多苦難，但最後幾年享譽國際，多次獲獎。

²⁶⁴ Там же.

²⁶⁵ 同註 256，頁 154-155。

二、巴斯特納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

巴斯特納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出身莫斯科猶太家庭，父為畫家，多次為托爾斯泰作品插畫，母親為鋼琴家，是大師安東·魯賓斯坦（А. Г. Рубинштейн, 1829-1894）的門生。受母親影響，巴斯特納克曾受教於鋼琴家史克里亞賓（А. Н. Скрябин, 1872-1915）學習作曲，歷時六年。1908年，巴斯特納克以音樂家身份加入象徵主義小團體，後轉向詩歌創作。1911年，轉入附屬未來主義的離心派，之後發表詩集《雲中雙子星》（*Близнец в тучах*, 1914）和《超越障礙》（*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 1917）。早期的作品兼受象徵主義、阿克美派及未來主義影響，常使用不尋常的隱喻，艱深難懂，音樂感強烈。²⁶⁶二〇年代初期，巴斯特納克出版詩集《生活—我的姊妹》（*Сестра моя—жизнь*, 1922）及《主題與變奏》（*Темы и вариации*, 1923），並開始嘗試敘事長詩、散文和短篇小說。直到此時，巴斯特納克才開始展現自己的寫作風格。

對於當時眾多的藝術流派，巴斯特納克曾言：「許多現代流派認為，藝術像噴泉，其實藝術是海綿。他們以為藝術應該噴湧而出，其實它應該不斷汲取，充實自己。」²⁶⁷甚至直言：「不管他們尊崇的是索洛維約夫、康德還是馬克思，時下流行的團體與小組，都是庸才的藏身所。只有獨自一人，方能尋著真理……」²⁶⁸

1918年底，巴斯特納克已遭各大文學團體排斥，原因即是他對任何派別都保持疏離。富萊施曼教授（Lazar Fleishman）²⁶⁹認為²⁷⁰，巴斯特納克的文字流露一種羅曼·羅蘭式的“*au-dessus de la mêlée*”，即「超脫於混戰之上，不介入糾紛」的中立性。而當時的作家多少都與政治有所牽連，因此他在團體間變得特立獨行，不受歡迎。他向約翰·哈里斯（John P. Harris,

²⁶⁶ 同註 219，頁 262。

²⁶⁷ В. В. Агеносов 主編，凌建侯等譯，《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頁 453。

²⁶⁸ 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6, ст. 11.

²⁶⁹ 現任史丹佛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²⁷⁰ Lazar Fleishman. *Boris Pasternak— The Poet and His Politic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8.

1923-2003) ²⁷¹言及：「我的人生哲學與其說是某種『信念』，不如說是對事物的某種『看法』。」²⁷²因此，巴斯特納克終其一生從未承認屬於任何文學或哲學團體。

(一) 《齊瓦哥醫生》創作背景

《齊瓦哥醫生》動筆於 1946 年夏。同年 8 月，史達林指派安得列·日丹諾夫 (А. А. Жданов, 1896-1948) 推動並制訂蘇聯文化政策。日丹諾夫進行的第一要務便是打擊「政治中立」的作家，安娜·阿赫瑪托娃 (А. А. 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 與左琴科 (М. М. Зощенко, 1895-1958) 首當其衝。8 月 14 日發布〈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關於雜誌《星》與《列寧格勒》〉(“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1946)，名為對兩雜誌的決議書，矛頭卻直接指向兩作家：

左琴科一向以描寫空虛、無建設性的、低俗的東西見長，並以此散播腐敗、無意義、低下的反政治思想，使青年迷失方向，毒害他們的意識。

阿赫瑪托娃與人民背道而馳，是內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詩歌充滿悲觀與頹廢，表現過時的沙龍詩歌風格，停留在資產與貴族階級的唯美主義、頹廢主義，以及「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不願與人民同步調，對青年教育形成危害，為蘇聯文學界所不能容忍。²⁷³

被點名的作家遭受批鬥與羞辱，²⁷⁴他們的作品禁止刊登，甚至被逐出作家協會。阿赫瑪托娃與左琴科於是停止寫作，以翻譯維生。文學家以外，音樂家亦難逃迫害。例如史特拉汶斯基 (И. Ф. Стравинский, 1882-1971)

²⁷¹ 廣播主持人，曾與巴斯特納克通信一段時間，還為其與湯馬斯·莫頓 (Thomas Merton, 1915-1968, 天主教修士與作家) 互遞信息

²⁷² 同註 270，頁 266。

²⁷³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им. М.В.Ломоносова》. 2009.09.28. 〈<http://www.hist.msu.ru/ER/Text/USSR/journal.htm>〉

²⁷⁴ 阿赫瑪托娃被日丹諾夫公開指作是「穿著修女袍服的蕩婦」。

與蕭士塔高維奇（Д.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1906-1975）也被指拘泥於「形式主義」，其他音樂家亦紛遭批判。1946年9月，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 1901-1956）²⁷⁵在莫斯科作家會議的報告中宣稱：「巴斯特納克的作品與阿赫瑪托娃一樣，『意識形態中立』、『缺乏政治自覺』。」²⁷⁶數月後，連帶巴斯特納克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也被指為「意識形態不正確」。但他置若罔聞，繼續創作，1947年甚至舉行了一次作品朗讀會。

負責執行文化政策的日丹諾夫雖於1947年去世，1949年，蘇聯國內的文學與社會仍壓力重重。一向稱頌共黨政權的法捷耶夫、西蒙諾夫（К. М. Симонов, 1915-1979）、特瓦爾朵夫斯基（А. Т. Твардовский, 1910-1971）亦受批判。國內政治大整肅外，東西冷戰（Cold War）也嚴重影響國內情勢。冷戰導致蘇聯境內強烈仇視西方文化，移居西方的俄國作家亦受指責。巴斯特納克因「政治中立」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²⁷⁷傾向」，並因「作品經常被敵人用來對付蘇聯」，²⁷⁸而被視同賣國賊。冷戰除了提高國內的仇外意識，也使存在已久的猶太問題更形惡化。猶太裔作家備受歧視，巴斯特納克首當其衝，被蘇聯同時代人謾罵指責。有人說「巴斯特納克？我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²⁷⁹官方不容許他出版作品，好友也先他而去，²⁸⁰一連串噩耗對巴斯特納克打擊嚴重，但巴斯特納克堅持如《齊瓦哥醫生》書中的伊弗格拉夫（Эвграф Андреевич Живаго, 尤里·齊瓦哥同父異母弟）所說：「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沮喪。要懷抱希望，然後行動——這是我們絕望中的義務。一事不做，只顧絕望，是忘卻和忽略責任。」²⁸¹此時期，巴斯特納克完成《齊瓦哥醫生》附錄之詩最後四首——〈罪惡的日子〉（“Дурные дни”）、〈抹大拉瑪利亞〉（“Магдалина”兩首）、〈格菲希馬園〉（“Гефсиманский сад”），完成小說第一部。

²⁷⁵ 法捷耶夫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擔任蘇聯作家協會會長。

²⁷⁶ 同註 270，頁 250。

²⁷⁷ 世界主義是一種社會理想，認為全人類都屬於同一精神共同體，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相對立。此詞來源於希臘文 *cosmos*（世界）+ *polis*（城市，人民，市民），以之描述跨越國界的、對全人類的博愛。

²⁷⁸ 同註 270，頁 254。

²⁷⁹ *Ibid.*

²⁸⁰ 1941年瑪琳娜·茨薇塔耶娃（М. И.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自殺身亡。

²⁸¹ *Никогда, ни в каких случаях не надо отчаиваться. Надеяться и действовать — наша обязанность в несчастьи. Бездейственное отчаяние — забвение и нарушение долга.*

巴斯特納克年輕時追求藝術真諦，主張美學意義重於倫理說教。但對《齊瓦哥醫生》的創作，他說：「我想在這部小說中塑造近 45 年俄羅斯的歷史形象……這篇作品將表明我對藝術、聖經、以及對人與歷史的看法。」²⁸²之後巴斯特納克又在幾次不同場合中言，希望《齊瓦哥醫生》比他的詩傳達得更遠，並且讓讀者明白，什麼是他生命中意義非凡的東西：「這本書紀錄我們這一代以血汗為代價換取的經驗，我必須完整、清楚地將它保存下來。」²⁸³

巴斯特納克萃取生活中「原始的、非凡的、無法言喻的東西」，表現「平凡中的不平凡」。²⁸⁴這可從《齊瓦哥醫生》中，他刻意製造的「偶遇」與「錯過」看出。他在小說中以一盞燭火、一個人名、一件道聽塗說的傳聞，製造一幕幕偶遇。這些片段橫跨齊瓦哥（Ю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иваго）一生，綿密織成一個人的命運，一群人的生命，鋪陳了一個世代的俄羅斯風貌。

（二）《齊瓦哥醫生》的生與死

齊瓦哥的姓（Живаго）來自俄文字根 живой，意為「生命的」、「活著的」。巴斯特納克似乎有意藉齊瓦哥探討生死問題，小說開頭，便讓年幼的齊瓦哥先經歷喪母之痛；長大後，又讓齊瓦哥成了醫生。醫生理應拯救生命，但在戰亂的年代，貧瘠醫療設備下，醫生無法救人，只能眼看病人掙扎死去。戰爭中，身為軍醫的他更對生命的脆弱有所體會：「齊瓦哥告訴米沙（齊瓦哥好友），他聽不慣互相殘殺，充滿血的邏輯，不忍看傷員的慘狀。特別是現今的戰爭技術，使倖存的殘廢者變成畸形的肉塊，那種景象真是慘不忍睹。」²⁸⁵不久以後，米沙見一名臉被炸碎，卻還有一絲氣息的軍人，傷者的慘狀讓他也忍不住心中默禱：「上帝，上帝啊！請把他帶走吧，不然我就要懷疑您的存在了！」²⁸⁶後來在戰爭的逼迫下，齊瓦

²⁸² 同註 267，頁 455。

²⁸³ John Gordon Garrard ed. *The Russian Novel from Pushkin to Pasternak*. New York: Vali-Ballou Press, 1983, p. 203.

²⁸⁴ Larissa Rudova. *Understanding Boris Pasternak*.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7, p. 78.

²⁸⁵ 同註 268，頁 114。

²⁸⁶ 同註 268，頁 116。

哥更被迫拿槍射殺年輕生命：

在激烈的戰場上，消極無為非但無法想像，亦非人力可為。他沒有忠於哪一方，也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只是順著事情的走向與法則而行。袖手旁觀超出常理，子彈朝他和同伴射來，他就射回去。²⁸⁷

齊瓦哥一生不斷在類似情況下，反覆見證生與死，反覆瞭解自己的渺小。

巴斯特納克以齊瓦哥與其親友的遭遇，描繪出同時代人的歷史。1905年發生鐵路工人罷工事件，引發「流血的星期天」(Кровав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事件，迫使沙皇做出「十月宣言」(октябрь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然而這一切看在16歲的拉麗薩(Лариса Федоровича Антипова)眼中，卻像兒童的嬉戲：

兩個男孩子玩著最可怕的成年人遊戲——打仗——這是會招致砍頭和流放的遊戲……他們的危險遊戲帶着天真無邪的味道……他們對面的房屋，與在那裡一個勁兒響著的槍聲，都帶着天真爛漫的意味。「孩子們正在放槍呢。」拉麗薩想，她指的不是那兩個男孩，而是正在城裡進行暴動的人群。²⁸⁸

數年後，俄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況激烈，損失重大，人民高度不滿，對沙皇十分失望。書中的齊瓦哥敘述沙皇視察軍隊的情景：

沙皇靦腆地笑，予人遠較硬幣和勳章上更蒼老失神的印象。他精神萎靡，臉面浮腫，略帶慚愧的神色望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似乎想從他那兒求助些什麼；大公恭敬地彎腰，附在沙皇耳邊小聲說話，有時並不言語，只是挑挑眉，聳聳肩，尷尬的氣氛更形困窘。

²⁸⁷ 同註 268，頁 330。

²⁸⁸ 同註 268，頁 50。

山中灰濛濛的清晨，沙皇一副可憐模樣。齊瓦哥想著：君王如此膽小、拘謹、怯懦，這樣的弱者卻掌握逮捕、處死、赦免、剝奪基本人權的大權，真令人不寒而慄。²⁸⁹

齊瓦哥所述，不僅是個人想法，也是當時反沙皇政府人民的心聲。拉麗薩在第四章末感嘆：「最近一切的變化多麼劇烈啊！不久以前還說著對祖國的神聖義務、戰鬥的勇氣、崇高的社會責任。如今卻災難臨頭——我們垮了，哪裡還有光彩和神聖呢……」²⁹⁰不久，彼得堡爆發革命，臨時政府上台，旋即發生十月革命。

對十月革命，齊瓦哥一開始讚嘆：「多麼偉大的手術！一刀劃下去，漂亮地把發臭的癰疽一舉割除！」²⁹¹戰後前幾個月，大多數知識份子都和齊瓦哥一樣，為戰爭帶來的改變感到欣喜。²⁹²然而革命後，到處是新制度、新委員會、新政務委員代表……一切都是新的，百姓企盼的和平與麵包卻仍像神話一樣遙不可及。雪上加霜的是，紅白軍內戰開打，齊瓦哥一家奔向烏拉爾避難。到達烏拉爾不久，齊瓦哥被紅軍擄走，徵為軍醫，三次逃脫未果，齊瓦哥怒喊：「……你們忘記最重要的事實：人心不能被指使！」²⁹³你們認為自己解放人民，為人民謀福利，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人向你們如此要求。」²⁹⁴內戰結束前，齊瓦哥終於逃出，然而家人已被迫出境，拉麗薩也離他而去。他輾轉回到莫斯科，生活卻了無重心，死於 1929 年。

齊瓦哥不是力挽狂瀾的大人物，在歷史洪流中，他顯得渺小、無能為力。身為醫生無法掌握生死；身為男人，追求的感情無法實現；身為一個人，他的命運被戰爭與政權控制，生命中無一樣自己可掌握的東西。但正是這麼一個普通人，維護自己心靈不被時代風潮所左右，以小人物的尊嚴與失序的社會對抗，更能表現出人如何超越死亡的恐懼與哀傷。²⁹⁵齊瓦哥

²⁸⁹ 同註 268，頁 118-119。

²⁹⁰ 同註 268，頁 125。

²⁹¹ 同註 268，頁 180。

²⁹² 同註 270，頁 89。

²⁹³ *Насильно мил не будешь, сердцу не прикажешь* 為俄羅斯諺語，原文僅有前半句。意為：不能強迫一個人去作或愛上某件事。

²⁹⁴ 同註 268，頁 335。

²⁹⁵ Nicola Chiaromonte. "Pasternak's Messag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是所有「接受革命，但未接受共黨統治的知識份子」的代表。²⁹⁶他代表所有被視為次等公民的文人、藝術家、科學家，也無疑是巴斯特納克本人的化身。

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 1888-1938）²⁹⁷於 1934 年在第一屆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發表〈詩，詩學與蘇聯詩歌創作的任務〉（“Poetry, Poe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Poetry in the U.S.S.R.”, 1934）一文，文中針對無產階級作家對巴斯特納克的批評做出維護：

巴斯特納克是一名遠離世事紛擾的詩人，是典型的知識份子。他接受革命的事實，但遠離了革命後喧擾的名利場，也沒有捲入激烈的鬥爭。他的世界有豐富的個人經歷，感情纖細，還有傷感亦碎的靈魂……他嚴肅，專注於自己的創作，作品材料源自過去歲月的珍貴遺產，每一件對他都是深刻的人生體驗。

巴斯特納克就是這麼一個人，他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他的創作像一條線，線上串了許多抒情珍珠，獻出許多深邃真誠的作品。²⁹⁸

布哈林此篇文章，或許可視為蘇聯時期對巴斯特納克唯一的公正評價。

Vol. 188, 2007, p.130.

²⁹⁶ Irving Howe. “Of Freedom and Contempla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63, 1991, p.19.

²⁹⁷ 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 1888-1938），蘇聯政治、革命、經濟學家。列寧死後與史達林、托洛茨基等人並列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1928 年與史達林因經濟政策意見相左遭批；1938 年在大整肅中被秘密槍決，50 年後才恢復名譽。布哈林生前相當讚譽巴斯特納克，因此在他死後，巴斯特納克特別被蘇聯當局關注。

²⁹⁸ 〈N.I. Bukharin: Poetry, Poe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Poetry in the U.S.S.R.〉,《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2010.05.1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bukharin/works/1934/poetry/4.htm>〉

三、布爾加科夫 (М. А.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

米哈依爾·布爾加科夫 (М. А.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1891 年生於基輔，卒於 1941 年。布氏的祖父是東正教神父，父親亦為東正教神父兼神學教授，在俄羅斯宗教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謝爾蓋·布爾加科夫 (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 則為其親戚，因此米哈依爾·布爾加科夫²⁹⁹自幼深受宗教浸潤。

1931 年，布爾加科夫寫了一篇極短的生平自述：

1891 年生於基輔。教授之子。1916 年畢業於基輔大學醫學系，同時轉而研究文學，1919 年開始發表作品。

1919-1921 年居基輔，寫諷刺小品，但幾未發表；研究劇院歷史，偶爾參與演出。

1921 年遷居莫斯科，擔任報社記者，後任專欄小品作家。1922-1924 年繼續於報社工作，寫諷刺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白衛軍》(Белая гвардия, 1925)。

1925 年，根據長篇小說《白衛軍》改編戲劇《圖爾賓一家的生活》(Дни Турбиных, 1926)，1926 年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上演 289 場後遭禁。

《佐依卡的公寓》(Зойкина квартира, 1925) 在巴赫坦戈夫劇院演出，上演 200 場後禁演。

《紫色島》(Багровый остров, 1927) 在卡梅爾劇院演出，上演約 50 場後遭禁。

《逃亡》(Бег, 1928) 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進行第一次彩排後即遭禁演。

《偽聖者的奴隸》(Кабала Святош, 1929) 尚未彩排即遭

²⁹⁹ 以下提及布爾加科夫，皆指米哈依爾·布爾加科夫。

禁演。

《偽聖者的奴隸》禁演後兩個月（1930年5月）獲得莫斯科藝術劇院助理導演一職，並於此劇院上演改編果戈里的《死靈魂》。

1931年3月，助理導演一職外，參與演出。³⁰⁰

二〇年代早期與中期，布爾加科夫創作不少劇本，一度為各大劇院爭相競演之作。《白衛軍》發表後被迫重新修改，以《圖爾賓一家的生活》在劇院上演。1925年起，《致命的蛋》（*Роковые яйца*, 1924）、《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1925）等作品飽受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批判，1927年被認定是反蘇聯作家，創作受阻，連帶被剝奪出國權。據作家本人統計，二〇年代對其作品的評論計301篇，其中敵視漫罵者298篇。³⁰¹至1929年，布爾加科夫的作品全面遭禁，還被同時代人批為「昔日作家」、「今日之敵」，³⁰²對他是很大的打擊與侮辱，也使其生活陷入窘境。沈重的政治壓力下，布氏1929年後不再發表創作，但1928年至1940年間持續寫作《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1940），直至死前仍悉心修改。26年後，1966年蘇聯才允許出版刪節本。

（一）《致命的蛋》

《致命的蛋》描寫一位動物學家柏西科夫（Персиков）發現具強大生長力量的紅外線，適逢國內雞瘟，蘇聯當局便將紅外線運用於孵雞。國營農場負責人洛克（Рок）³⁰³將雞蛋與其他實驗用的鱷魚蛋、駝鳥蛋、蛇蛋搞混，使得接受紅外線照射變種後的鱷魚、駝鳥、蛇大鬧實驗區，異形大軍前往莫斯科。政府派兵鎮壓無效，一片混亂後，八月降雪，變種動物無法耐寒而死，莫斯科恢復平靜。

³⁰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М. А. БУЛГАКОВ》. 2010.04.20
〈<http://www.bulgakov.km.ru/bio.htm>〉

³⁰¹ 嚴永興，《輝煌與失落—俄羅斯文學百年》。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頁73。

³⁰² Lesley Milne 原著，杜文娟、李越峰合譯，《布爾加科夫評傳》（*Mikhail Bulgakov: A Critical Biography*）。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頁5。

³⁰³ Рок 在此為人名，但此字本身有「厄運」、「劫數」之意。小說名 *Роковые яйца*，實有「洛克的蛋」、「厄運的蛋」之意。

布爾加科夫似乎有預感此作品將惹惱當局，曾在 1924 年的日記中寫：「這部作品是諷刺？還是挑釁？……我擔心某天將因為這作品被拖走……消失……」³⁰⁴學界亦認為，《致命的蛋》是導致布爾加科夫日後作品遭禁的主因，因為其中有多處諷刺蘇聯政府。第一、作品提到莫名流行的雞瘟造成大量雞隻死亡，與當時的飢荒及糧食不足問題相呼應。第二、劇中角色洛克身為國營農場負責人，卻無法辨認出雞蛋與鴕鳥蛋等的不同，除了諷刺國營農場的政策外，亦對各國營單位負責人的專業性提出質疑。第三、柏西科夫喜好實驗，並將此實驗運用於動物身上，暗喻史達林將「實驗性」的革命與政策帶到俄國。第四、異形動物經軍隊鎮壓仍無法殲滅，最後只能依靠異變的天氣（*deus ex machina*）³⁰⁵解圍，實為對政府無力收拾新經濟政策失敗³⁰⁶後的社會現象之譴責。

（二）《狗心》

《狗心》寫於 1925 年，一般認為其諷刺主題為「新蘇聯人」（*нов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человек*）。³⁰⁷「新蘇聯人」是蘇聯共產黨理論家提出的觀念，指拋棄與忽視斯拉夫的文化、語言、民族的多樣性，想要創造單一「蘇維埃民族」與「蘇維埃國家」的人。³⁰⁸《狗心》甫發表，蘇聯當局立刻徹查出版社，沒收所有雜誌。1987 年這部作品重見天日，立刻成為蘇聯國內熱烈討論的文化現象，「不論學生或政客都在談論這篇作品」。³⁰⁹故事內容敘述一名醫學教授，將酗酒而死的流浪漢的腦移植到一隻狗身上，這隻狗奇異地以人的身份活下來，但舉止行為極為無賴，儼然是無法無天的流氓。教授不得已，只好動手術將其還原，結束鬧劇。

³⁰⁴ Vitaly Shentalinsky. *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5, p.75.

³⁰⁵ *Deus ex machina*, 或英文 *god from the machine*, 為一種小說情節的表達手法。當作品結尾陷入混亂難解、難以收尾的情形，出現意外的新角色、新力量或新事件將原本混雜的結尾作結。《伊利亞德》、《仲夏夜之夢》、《浮士德》皆運用此手法。

³⁰⁶ 新經濟政策時期適逢俄國飢荒，規模龐大且持續多年，加上新政策未能奏效，國營農場失敗，使得飢荒問題更加惡化。

³⁰⁷ Neil Cornwell and Christian Nicole. *Reference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03.

³⁰⁸ 〈От нэпа к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циализму〉,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тернет-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10.05.10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philos/ustryalov/ustry035.htm>〉

³⁰⁹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СКЕПСИС》. 2010.05.10 〈http://www.scepsis.ru/library/id_848.html〉

與《致命的蛋》相同，《狗心》再次以主角的名字作文章。酗酒而死的流浪漢名為克林·丘貢金（Клим Чугункин），чугун在俄文為「鑄鐵」之意，令人聯想到史達林（Сталин，俄文意為鋼鐵）；Клим與克里姆林宮（Кремль）又有諧音，因此克林·丘貢金有「在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的涵義。讀者雖一開始對丘貢金此人無從瞭解，但從接受移植的狗身上，馬上可瞭解丘貢金生前的個性：無恥、好色，偷竊、吸毒、賭博、酗酒，無惡不作。這隻狗開始像人一樣思考，首先，牠為自己取名為波利格拉夫·波利格拉夫耶維奇·沙里科夫（Полиграф Полиграфович Шариков）。Шариков演變自Шарик，是俄國常見的狗名，在小說中被主角拿來當成姓氏；Полиграф原意是印刷機，當時俄國人常以新事物取名，比如共黨革命後有許多人改名或姓為「十月」（Октябрь），這裡刻意讓主角以「印刷機」為名，顯然間接嘲諷了當時的取名原則。以波利格拉夫為名，又將此名轉變為父稱，這種唸起來令人發笑的名字，使人想起果戈理《大衣》（Шинель，1842）的主角阿卡其·阿卡其耶維奇（Акакий Акакиевич），為作者刻意之安排。姓名以外，布爾加科夫將沙里科夫安排為「無產階級者」。沙里科夫打著無產階級的招牌，自視高人一等，並以此恫嚇醫學教授，威脅要向蘇聯當局告密……。這樣的場景在蘇聯時期屢見不鮮，無數知識份子因「無產階級者」的告密失去生命；因不符「無產階級」創作原則而被迫停止創作的文人更不在少數。

先後發表的《致命的蛋》與《狗心》都未能通過國家政治安全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簡稱 ГПУ，為前述秘密警察「契卡」的改組單位）審查，無怪乎日後布爾加科夫的作品都被密切觀察，甚至遭禁。因為不能發表作品，貧困潦倒的布爾加科夫於1930年致信當局：「如果我的諷刺文學才能不能在蘇聯境內使用，那麼請准許我出國……或在劇院謀職。」³¹⁰史達林並未核准出國，但為其在劇院安插職務。1932年，一封致友人的信裡布爾加科夫嘲諷自己：「文學生涯中，我一直被迫改寫劇本，這真是個輝煌的結局！」³¹¹

³¹⁰ 〈 Биография Булгакова (1921-1930) 〉, 《 Булгак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2010.05.10
〈 <http://www.bulgakov.ru/biography/1921-1930/> 〉

³¹¹ 同註 302，頁 210。

(三)《大師與瑪格麗特》

1928年，布爾加科夫著手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寫作，前後歷經12年。《大師與瑪格麗特》集布爾加科夫哲學、宗教及道德的探索和魔幻藝術之大成，被認定為二十世紀俄國經典文學之作。³¹²2005年，俄國將《大師與瑪格麗特》改編為一部將近九小時的影集，美國資深駐俄記者宋保羅（Paul Sonne）為此寫了一篇觀察報導：

「對蘇聯時期的人來說，1966年讀到《大師與瑪格麗特》，就像初嚐自由滋味一般。」影集導演耶里卡洛夫（Роман Ерикалов）接受採訪時說，「就像接觸到一個新世界，從來沒有人寫出像布爾加科夫一樣的作品。他把讀者帶入一個從前沒人敢深入的禁地。」

……對很多蘇聯時期的人來說，是因為讀了《大師與瑪格麗特》，才有機會讀到福音故事。這對很多人來說是第一次。³¹³

書中背景為三〇年代，時值大整肅時期。魔王沃蘭德（Воланд）與其手下現身大鬧莫斯科，看似荒謬，卻沖淡了當時人心惶惶的歷史氛圍。主角「大師」（Мастер）無名無姓，直到小說後半段才出現，俄國研究布爾加科夫的學者楚達蔻娃（Мариэтта Чудакова）接受莫斯科回聲（Эхо Москвы）電台採訪時言：

布爾加科夫並未對『大師』作完整描述，讀者甚至無從得知他的姓名與生平經歷。但是我們卻感覺對『大師』十分熟稔，為什麼呢？因為布爾加科夫巧妙地利用當時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建構出『大師』的形象，讓我們每讀一分鐘，就多認識『大師』一些。³¹⁴

³¹² 同註 110，頁 258。

³¹³ 〈Russians Await a Cult Novel's Film Debut With Eagerness and Skepticism〉，《The New York Times》. 2010.05.12.

〈http://www.nytimes.com/2005/12/19/arts/television/19mast.html?_r=1〉

³¹⁴ 同註 313。

「大師」的處境與當時多數知識份子的相同：在報上發表一些文章，受到愈來愈多的批鬥，被稱為「敵人」、「宗教狂」……「大師」驚恐之下焚毀手稿，進入精神病院。「大師」的遭遇係藉其愛人瑪格麗特（Маргарита）之口說出，她還道出文學界的弊病，描述「大師」遭人陷害過程。小說中，自認為握有極大權力的文學團體得到報應：先是莫斯科文聯會（МАССОЛИТ）主席白遼士（Берлиоз）死於「意外」，後文學批評家拉銅斯基（Латунский）的住處被砸毀。其他平時作威作福的公家單位，也在沃蘭德一群人的搗亂下，各自受到輕重不一的懲罰。

布爾加科夫可能預測自己無法親見此書出版，因此下筆鋒利，以諧謔筆調寫下當時醜惡的人性與共產制度下的官僚惡習。此外，他在鼓吹無神論的政治環境下，藉魔王之口證明上帝的存在。魔鬼原是「惡」的代表，在小說中卻譴惡助善，如小說首頁引《浮士德》之言：「我屬於力的一部分，它總想作惡，卻又總施善於人」。布爾加科夫以此重申對俄羅斯傳統宗教信仰的堅持，在積極宣揚無神論的蘇聯時代，意義特別深長。

布爾加科夫曾在一封寫給史達林的信中說：

在蘇聯文學遼闊的草原上，我是唯一的一匹狼。人們曾勸我將毛皮染色，但這是荒謬的建議。不論是染色的狼，或是剪了毛的狼，狼永遠不可能變成鬃毛狗。人們對付我像對付狼一樣……我沒有怨恨，但我很疲倦，因此，在 1929 年末倒下了……³¹⁵

但布爾加科夫沒有真正倒下。為了讓後代人能看到三〇年代的俄國，理解諷刺下的無奈，他潛心寫作，原稿焚毀一次，重寫後修改八次，26 年後作品面世，終於如他所願，為俄國人開拓了新視野。

³¹⁵ 同註 256，頁 127。

第五章 結論

長期以來，俄國的知識份子在社會及歷史上均曾扮演積極角色。不僅因為舊時代的知識份子代表文化內涵，更因為他們願意獻身大眾福利，追求知識與真理的信念產生強烈的使命感。但隨時代變遷，知識成為專業技術的生產品，與文化的聯繫已逐漸模糊。蘇聯時期，知識份子更形式微，重要性為各行各業的專家及專業技術人員所取代。知識一旦職業化，便出現官僚性質，喪失質問的能力，失去維護和推動知識的使命感，甚至深受束縛，導致真理的追求受侷限，藝文型態產生變化，蘇聯時期的文學與藝術即是證明。然而，正因藝文活動有其獨特價值，雖易為政權所利用，知識份子卻也往往不願受制於主流勢力，蓄積能量反擊。

知識份子的定義，諸如：文化標準的守衛者、永遠的批評者、社會良心、異議者……都常被提及。美國社會學者科塞（L. A. Coser, 1912-2003）將知識份子定義為「從不滿足現狀的人」。³¹⁶他說，知識份子沒有唯一不變的哲學觀和政治觀，但追尋真理是普遍的共識。另一方面知識份子可能夸夸其談、自命不凡，他們的矯飾也常遭訕笑，例如十九世紀的多餘人物與虛無主義者。另一位美國社會學者古德納（A. W. Gouldner, 1920-1980）認為，自主性（autonomy）是知識份子的核心價值，也是知識份子文化意識的支柱，³¹⁷包括以自己的信仰與思考為行動依據。因此，一旦知識份子遭受主流體制壓迫，他們的創作往往立即出現緊張狀態。³¹⁸當然，知識份子絕非全是真理鬥士，與一般大眾一樣，他們之中不少人選擇了向主政者妥協，以換取現實利益。

蘇聯時期，與政府態度對立的知識份子大多於二〇年代初期即移居國外，滯留國內者因三〇年代的大整肅飽受迫害，另有人順從共黨，成為政府的傳聲筒，甚至仗勢欺壓他人，小說家法捷耶夫便是典型的例子。法捷

³¹⁶ Frank Furedi 原著，戴從容、王晶譯，《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台北：聯經，2006，頁 46。

³¹⁷ A.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9, p.33.

³¹⁸ 同註 316，頁 42。

耶夫長期擔任重要黨職，在「個人崇拜」時期，大批文化人無辜受害，作為文藝界領導人，他不能不執行上級命令，但難免負有一定責任。1953年史達林死後，局勢丕變，法捷耶夫承受極大壓力，1956年自殺。赫魯雪夫（Н. С. Хрущёв, 1894-1971）上台後，開始了「解凍期」。「解凍」一詞出自愛倫堡（И. Г.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的小說《解凍》（*Оттепель*, 1954），以「解凍」隱喻史達林時代的結束。此語遂成流行語，概括赫魯雪夫執政初期的政治與文化現象。

1956年，赫魯雪夫首度公開批判史達林及大整肅的錯誤，許多知識份子獲得平反，遭禁的作品得以出版。電影導演也對歷史進行反思，影片宣揚正面的人性光輝。如《雁南飛》（*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 1958）、《士兵的歌謠》（*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 1959）、《第四十一》（*Сорок Первый*, 1957），主角都是被戰爭毀去一切的平常人，不是特殊的英雄。描述這些弱小人物承受的巨大傷痛，表現對每一個人的珍惜，對戰亂下弱者的憐憫。藝術方面，抽象派活躍，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在莫斯科舉行畫展是蘇聯文化界的「革命」。文壇上，戰爭小說與鄉村小說成為主流，不再寫無產階級與工人，轉而關注鄉村與農民，小說題材較史達林時代新穎活潑，並常具諷刺色彩。³¹⁹葉夫圖申科（Е. А. Евтушенко, 1933-）、阿克薛諾夫、索忍尼辛（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 1918-2008）各有重要創作，對史達林作直率批判，對歷史作嚴肅探討。

不過，「解凍」看似牽連廣，規模大，卻未產生實質性變革，原因在於：一、官方文化政策未真正解禁。二、「解凍」使人民開始審視蘇聯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引起赫魯雪夫警覺，甫放鬆思想箝制，立即又表現遲疑的態度。三、保守派視西方文化為大敵，試圖阻撓政策開放。四、因「解凍」浮現的民主思潮使國際共黨出現分裂。³²⁰為加強控制，赫魯雪夫逮捕知識份子，包括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大城市的教師和大學生，並發生巴斯特納克事件。1958年，巴斯特納克因《齊瓦哥醫生》獲諾貝爾文學獎，卻遭赫魯雪夫痛斥，御用文人立即群起圍剿。巴斯特納克被迫放棄領獎，兩年後病逝，26

³¹⁹ Walt G. Moss 原著，張冰譯，《俄國史：1855-1996》（*A History of Russia*）。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頁 476。

³²⁰ 同註 18，頁 268-269。

年後（1988），《齊瓦哥醫生》俄文版在俄國首度出版。1964年10月，赫魯雪夫去職，蘇聯政府對知識份子的箝制並未稍緩，類似情況再現：猶太裔詩人布洛德斯基1964年即曾入獄，因阿赫瑪托娃及多名文化人士奔走，引起國際注意，五年流放減刑為一年半。1972年布洛德斯基被迫流亡美國，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此外，1963年起，索忍尼辛作品不再通過檢查。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亦未能親赴瑞典領獎。1974年亦遭驅逐出境，兩年後移居美國，1994年返鄉，2008年病逝。索忍尼辛一生擇善固執，歷經癌症、流放等種種困厄，堅持捍衛道德與正義，被譽是「俄羅斯最偉大的良心之一」，是俄國當代知識份子的重要代表者。³²¹

知識份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為俄國文化特殊一環，如第貳章所述，他們不僅心懷使命感與道德感，與其他各國的「知識份子」相較，他們還背負強烈罪惡感。俄國由於長期處於君主專制，遲至1861年解放農奴後，始緩慢展開工業革命，比起西方晚了將近一百年，也因此，俄國社會缺乏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³²²「中產階級」為一種社會階層，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並具專業知識及職業能力，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起很大作用。二十世紀前的俄國僅有上層與下層社會，沒有如西方一般的中產階級。取而代之夾在兩者間的，便是俄國知識份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國知識份子人數並未多到足以成為一個「社會階層」，大多數人亦無穩定經濟來源，因此很難如中產階級一般達到穩定社會的力量。他們僅能憑藉滿腔熱忱，以自身智識為力量為大眾謀福利。教育普及後，知識份子的成份不再限於貴族與僧侶，因此俄國知識份子並不屬於特定階級。以上原因，說明了為何俄國知識份子一直無法融入上層社會或下層社會，只能在兩邊徘徊，與一般大眾疏離。表現出這種疏離感的知識份子便是「多餘人物」，此亦為俄國文化上另一特殊現象。

知識份子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活躍，斯拉夫派、西歐派、虛無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皆為代表，然而時至今日，持有與上述派別相同思想者還是在少數，這說明文化雖是一連串的發展過程，卻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消滅。

³²¹ 同註 110，頁 285。

³²² 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bourgeoisie）不同，中產階級意義如後段所述。資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者用法，與工人階級相對，特指富有階級。

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將文化視為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主流文化（dominant）、殘餘文化（redidual）與新興文化（emergent）。以俄國知識份子為例，第一代知識份子出現時，斯拉夫派思想與西歐派思想為當代主流文化，然而當第二代知識份子出現時，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者變成了新的主流文化，舊的主流文化退到第二線，變成殘餘文化。但於此同時，民粹主義者繼承了第一代知識份子的思想，受到第二代知識份子「否定一切」的啟發，融合兩者，形成新興文化力量。這三股力量不斷持續交錯，在創新的同時也保留舊傳統，十九世紀知識份子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選擇，白銀時代各種文藝流派的興起，至今日俄國文壇的傳統與改革之爭，皆可印證。

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文學是各種力量的角力場（field of force），因為文學本身是歷史與作者意識形態的結合，因此在文學作品裡同時可見傳統與反傳統的主題。舉例說明，蘇聯文學受官方箝制，因此文學應符合官方規定方屬「正統」，但我們仍可透過研究當時作品找出與官方型態相左的看法。例如《齊瓦哥醫生》表面上是描述齊瓦哥一生經歷的小說：齊瓦哥曾為沙皇的懦弱感到失望，也為共黨革命而歡欣鼓舞，小說至此看似符合官方標準，然而巴斯特納克也描寫革命後齊瓦哥個人的觀感，包括對共黨的失望、憤怒，對自己無力對抗大時代的無奈。在這部作品中，讀者清楚可見「文本世界」與「真實世界」如何交互影響，歷史事件如何轉化為小說場景，而小說又是如何表達出大眾心聲。此即為新歷史主義重要論點：歷史中有文學（History in Literature）、文學中有歷史（Literature in History），也稱為歷史中的文本性（textuality）、文本中的歷史性（histoticity）。歷史環境影響了文學作品的創作，然而，文學也有形塑歷史的力量。這點，透過俄國知識份子的作品得到充分的表達。

1985年戈巴契夫掌政，在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與開放（гласность）兩大原則下進行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並停止干預東歐諸國內政，於是冷戰結束，東西雙方迅速交流。國內電視節目多元化，人民可以收聽外國節目。搖滾樂，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蒙太奇（Montage）³²³等藝術風格

³²³ 蒙太奇為電影拍攝手法，將數個剪接鏡頭並列一起，對觀看者而言比一鏡到底更有想像空間。此手法後來廣泛運用在各領域，如建築、藝術及音樂。

均不再被隔離。電影探討道德與人性，甚至一向迴避的酗酒、毒品、娼妓等問題被搬上銀幕，反映了新生代追求物質享受、道德淪落的現象。文壇出現傳統與改革兩大流派，前者固守俄羅斯傳統信仰與民族精神，抵制西方的通俗文學與大眾文化，自由派強調創作自由，引進西方文學技法。這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又一次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大爭論，本國傳統與西方文化孰重孰輕，孰是孰非又成為討論焦點。當然，這也一定程度地證明了俄國知識份子在政治、社會及文化領域上的影響力。

戈巴契夫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及大眾文化進入俄羅斯，當然也引起憂慮。商業導向可能影響純文學的生存空間，傳統文學的教化功能似難再現。另有人將現今俄羅斯犯罪率上升，青少年拜金，歸因於俄羅斯文化「美國化」(американизация)傾向，以及大眾文化取代正統文化的影響。俄羅斯知識份子是否能繼續堅持使命，嚮慕美好，精緻書寫，展現真實的力量？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一) 文本

-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原著，滿濤譯，《文學的幻想》。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
- Блок, А. А. 原著，林精華、黃忠廉譯，《知識份子與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Бунин, И. А. 原著，李輝凡譯，《蒲寧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 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原著，呂紹宗譯，《當代英雄》。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原著，力剛、冀剛譯，《齊瓦哥醫生》。台北：林鬱文化，1999。
- Пушкин, А. С. 原著，鄭清文譯，《永恆的戀人》。台北：志文，1993。
- Тургенев, И. С. 原著，力岡等譯，《屠格涅夫全集》第十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Тургенев, И. С. 原著，江子野譯，《父與子》。台北：大漢出版社，1979。
- Тургенев, И. С. 原著，蔣路譯，《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二) 專書

- Alexander, Jeffrey C. and Steven Seidman 主編，呂建忠譯，《文化與社會》。台北：立緒文化，1997。
- Barker, Chris 原著，羅世宏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2004。
- Berlin, Isaiah 原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1987。
- Furedi, Frank 原著，戴從容、王晶譯，《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台北：聯經，2006。
- Julius Friedrich Hecker 原著，高驊、楊續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1999。
- Lesley Milne 原著，杜文娟、李越峰譯，《布爾加科夫評傳》。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 Moss, W. G. 原著，張冰譯，《俄國史（1855—199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 Salomoni, Antonella 原著，卡佳、吉娜、文娟合譯，《列寧與俄國革命》。香港：三聯書店，2005。
- Sardar, Ziauddin 原著，陳貽寶譯，《文化研究》。台北：立緒文化，2004。
- Shils, Edward 原著，傅鏗等人合譯，《知識份子與當權者》。台北：桂冠，2004。
- Slonim, Marc 原著，張伯權譯，《俄羅斯文學史》。新竹：楓城出版社，1975。
- Slonim, Marc 原著，湯新楣譯，《現代俄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 Агеносов, В. В. 主編，凌建侯等譯，《20世紀俄羅斯文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 Агеносов, В. В. 原著，劉文飛、陳方譯，《俄羅斯僑民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 Бердяев, Н. А. 原著，安啟念、周靖波譯，《精神王國與凱撒王國》。浙江：浙江人民，2000。
- Бердяев, Н. А. 原著，汪建釗編選《別爾嘉耶夫集：一個貴族的回憶和思索》。上海：上海遠東，2004。
- Бердяев, Н. А. 原著，汪劍釗譯，《自我認知》（*Самопознание (Опыт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Бердяев, Н. А. 原著，雷永生、邱守娟譯，《俄羅斯思想》。北京：新華，2004。
-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ронов 原著，張廣翔等譯，《俄國社會史（上卷）——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治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 Георгиева, Т. С. 原著，焦東建、董茉莉譯，《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Зезина, М. Р. 等著，劉文飛、蘇林譯，《俄羅斯文化史》。上海：上海譯文，1999。
- Наумова, Н. Н. 原著，劉石冰譯，《屠格涅夫傳》。台北：國際文化事業，1984。
- Франк, С. Л. 原著，徐鳳林譯，《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上海：學林，1999。

- 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山東教育，2001。
- 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2000。
-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朱達秋、周力，《俄羅斯文化論》。重慶：新華，2004。
- 余志森主編，《俄羅斯史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 吳恩遠，《蘇聯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台北：亞太圖書，2000。
- 李毓榛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李邁先，《俄國史（上卷）》。台北：正中書局，1969。
- 汪劍釗，《阿赫瑪托娃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 沐濤，《俄羅斯史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
- 孟迎輝，《政治信仰與蘇聯劇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台北：淑馨，1995。
- 段昌國，《變局與突破—近代俄國思想與政治》。台北：歷史智庫，2009。
- 孫乃修編著，《屠格涅夫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
- 徐稚芳，《俄羅斯詩歌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高莽，《白銀時代》。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07。
- 馬瑩伯編譯，《別、車、杜文藝思想論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 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7。
- 馬龍閃，《蘇聯劇變的文化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
- 張捷，《熱點追蹤—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2003。
- 曹靖華主編，《俄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 賀允宜，《俄國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
- 葉水夫主編，《蘇聯文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4。
- 葉書宗、張盛發，《錘子與鐮刀—蘇維埃文化與蘇維埃人》。台北：淑馨，

1991。

- 翟厚隆選編，《十月革命前後蘇聯文學流派》。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 劉文飛，《文學魔方—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
- 劉文飛，《伊阿諾斯，或雙頭鷹—俄國文學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對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劉文飛編，《蘇聯文學反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
- 劉放桐等，《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北京：人民，2000。
- 劉炳均，《俄國歷史概論》。台北：國立編譯館，1999。
- 劉祖熙主編，《斯拉夫文化》。台北：淑馨，1994。
- 劉煜卿，《俄羅斯知識份子的悲劇》。北京：俄羅斯文藝，2002。
-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2007。
- 歐茵西，《浪漫與沉思》。台北：聯經，2001。
- 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台北：書林，1993。
- 黎皓智，《20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薛軍智主編，《歐美學者論蘇聯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 聶茂、厲雷，《俄羅斯玫瑰》。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
- 嚴永興，《輝煌與失落—俄羅斯文學百年》。南京：譯林，2005。

（三）期刊

- 米豔，〈俄國民粹主義的形成及特徵〉，《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46期，2007年。
- 李小桃，〈也談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發軔〉，《俄羅斯研究》，第158期，2009年。
- 林建光，〈馬克思主義〉，《文訊》，2010年2月號。
- 林賢治，〈蘇聯知識份子的命運〉，《雨花雜誌》，2009年第1期。
- 陳超明，〈狄更斯小說中的性關係〉，《第五屆英美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書林，1994。

二、外文部分

1. 英文

(1) Text

Muraviev, N. M. Eds. and trans. W. J. Leatherbarrow and D. C. Offord. "A Project for a Constitution (Extract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Ann Arbor: Ardis Publisher, 1987.

(2) Book

Berlin, Isaiah. *Russian Thinkers*. London: Penguin, 1994.

Berlin, Isaiah. *The Soviet Min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Billington, James H. *Russian in Search of Itself*.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annigan, Joh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Carr, E. H. *Michael Bakuni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Chances, Ellen. *Conformity's Children: An Approach to the Superfluous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1978.

Cornwell, Neil and Christian Nicole. *Reference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Crone, Anna Lisa, and Catherine V. Chvany, eds. *New Studies in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umbus,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1986.

Crouch, Martin, and Robert Porter, comps., eds. *Understanding Soviet Politics through Literature*. London and Bost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4.

Fleishman, Lazar. *Boris Pasternak: The Poet and His Politic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rank, Joseph. *Through the Russian Prism: Essay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Garrard, John Gordon ed. *The Russian Novel from Pushkin to Pasternak*. New York: Vali-Ballou Press, 1983.

- Gouldner, A. W.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9.
- Graham, Robert.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Volume One: From Anarchy to Anarchism (300CE to 1939)*. Toronto: Black Rose Books, 2005.
- Guerin, Daniel.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 Guerin, Wilfred L. et al eds.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erzen, A.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Vol IV.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8.
- Hogarth, C. J. *A History of Russia*, Vol. 5.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 Hughes, Olga R. *The Poetic World of Boris Pasterna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Kagarlitsky, Boris. *The Thinking Reed: Intellectuals and the Soviet State-1910 to the Present*. Trans. Pearce B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8.
- Kaplan, Steven, ed. *The Imag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Literature, Media, and Society*. Pueblo, Colo.: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0.
- Lehning, A. ed.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4.
- Marlia, Martin. *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1812-185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Matlaw, Ralph E. ed. *Belinsky, Chernyshevsky and Dobrolyubov: Selected Criticism*.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y*. London: Freedom Press, 1996.
- Mazour, Anatole.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 The Decembrist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oser, Charles 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Offord, D. *Portraits of Early Russian Libera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 Patterson, David. *Exile: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in Modern Russian Letter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 Pipes, Richar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Raeff, Marc. *The Decembrist Movemen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6.
- Read, Christopher. *Culture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Russia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sarism to Commun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 .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1900-1912: The Vekhi Debate and it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 Riasanovsky, Nicholas.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 - 18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Routh, Jane and Janet Wolff, eds.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Keele,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of Keele, 1977.
- Rudova, Larissa. *Understanding Boris Pasternak*.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7.
- Rzhevsky, Nicholas, ed. *An Antholog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Earliest Writings to Modern fiction: Introduction to a Culture*.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6.
- Schapiro, Leonard. *R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n 19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ciabarra, Chris Matthew and Ayn Rand. *The Russian Radical*.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halin, Dmitri N. ed. *Russian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 Paradox of Postcommunist consciousnes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 Shentalinsky, Vitaly. *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5.
- Shlapentokh, Vladimir. *Soviet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Post-Stalin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ompkins, Stuart Ramsay.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 Veeser, H. Aram.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89.
- Wood, Alan. *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61-191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Wood, Anthon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6.

Yarmolinsky, Avrahm ed. *Russians: Then and Now*.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 *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3) Periodical

Myers, D. G. "The New Historicism in Literary Study", *Academic Questions* 2 (Winter 1988-89).

Howe, Irving. "Of Freedom and Contempla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63, 1991.

Chiaromonte, Nicola. "Pasternak's Messag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88, 2007.

(4) Internet

A. Text:

〈 God and the State by Michael Bakunin 〉, 《 Anarchy Archive 》 . 2010.01.12
〈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akunin/godandstate/godandstate_ch1.html 〉

〈 Man, Society and Freedom- Mikhail Bakunin 1871 〉 , 《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 . 2010.01.12
〈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1/man-society.htm> 〉

〈 N.I. Bukharin: Poetry, Poetics and the Problems of Poetry in the U.S.S.R. 〉 , 《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 . 2010.05.12
〈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bukharin/works/1934/poetry/4.htm> 〉

〈 On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Polish Insurrection of 1830- Mikhail Bakunin 1847 〉 , 《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 . 2010.01.12
〈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47/poland-speech.htm> 〉

〈 Petr Chaadaev, Philosophical Letters Addressed to a Lady, 1829. 〉 , 《 DOCUMENTS IN RUSSIAN HISTORY 》 2009.10.02
〈 <http://artsci.shu.edu/reesp/documents/radishchev.htm> 〉

〈 Revolutionary Catechism-Mikhail Bakunin 1866 〉 , 《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 . 2010.01.12

〈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6/catechism.htm> 〉

B. Commentary:

- 〈 Russians Await a Cult Novel's Film Debut With Eagerness and Skepticism 〉,
《 The New York Times 》 . 2010.05.12.
〈 http://www.nytimes.com/2005/12/19/arts/television/19mast.html?_r=1 〉
- 〈 The Decembrists 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 , 《 Internet History Sourcebooks Project 》 . 2010.03.01
〈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ayrapetova-dec.htm> 〉

2. 俄文

(1) Текст

- Аскольдов, С. А., Н. А. Бердяев, С. А. Булгаков и др.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1.
- Булгаков, М. 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Москва: АСТ МОСКВА, 2008.
- 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4.
-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6.
- Радищев, А. 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7.

(2) Книга

- Будницкий, О. 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начало—XX 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ЕН, 2000.
-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Москва: Аграф, 1999.
- Ерофеев, Н. Д.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т. Москва: РОССПЕН, 1996.
- Кормилов С. И.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 20—9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1998.

Леонов, М. И.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ЕН, 1997.

Нечкина, М. В. *Движе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55.

Николюкин, А.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НПК, Интелвак, М., 2001.

Плоткин Л. *Парт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60.

Соловьёв В. М. *Тайны русской души: вопросы ответы верс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о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01.

(3) Периодика

Меметов, В. С.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ваново, ИвГУ, 1997.

Каган, М. С.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приро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Изд-во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1.

(4) Интернет

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 《 М. А. БУЛГАКОВ 》 . 2010.04.20
〈 <http://www.bulgakov.km.ru/bio.htm> 〉

Б. Роман:

〈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 , 《 Lib.Ru: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 .
2010.04.12 〈 http://az.lib.ru/t/turgenew_i_s/text_0040.shtml 〉

〈 Михаил Лермонтов.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Lib.Ru: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
2010.04.12 〈 <http://lib.ru/LITRA/LERMONTOW/geroi.txt> 〉

〈 ОКАЯННЫЕ ДНИ 〉 , 《 Бунин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 . 2010.04.20
〈 <http://bunin.niv.ru/bunin/bio/okayannye-dni-1.htm> 〉

В. Статья:

- 〈 Классика: Акса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О русском воззрении〉 ,
〈 Lib.ru〉. 2010.03.09. 〈 http://az.lib.ru/a/aksakow_k_s/text_0150/shtml〉
- 〈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И. Ленин, 1905〉 ,
〈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 2010.04.20
〈 <http://www.marxists.org/russkij/lenin/1905/09/part%20lit.htm>〉

Г. Стихи:

- 〈 Мне голос был. Он звал утешно〉 , 〈 Стихия〉 . 2010.05.12
〈 <http://www.litera.ru/stixiya/authors/ahmatova/all.html#mne-golos-by1>〉
- 〈 Памяти 19 июля 1914〉 , 〈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Белая стая (1917)〉 . 2010.05.12
〈 <http://ahmatova.niv.ru/ahmatova/text/stihi/1917/1917-61.htm>〉
- 〈 Реквием〉 , 〈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 2010.05.12
〈 <http://ahmatova.niv.ru/ahmatova/stihi/reqviem.htm>〉

Д. Указ:

- 〈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23 апреля 1932 г.〉 , 〈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им. М.В.Ломоносова〉 . 2010.04.20
〈 <http://www.hist.msu.ru/ER/Etext/USSR/1932.htm>〉
- 〈 "О политике партии в обла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 июня 1925 г.〉 , 〈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им. М.В.Ломоносова〉 . 2010.04.20
〈 <http://www.hist.msu.ru/ER/Etext/USSR/1925.htm>〉
- 〈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 〈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МГУ им. М.В.Ломоносова〉 . 2009.09.28.
〈 <http://www.hist.msu.ru/ER/Etext/USSR/journal.htm>〉

Е. Критика:

- 〈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 〉, 《СКЕПСИС》 .
2010.05.10 〈 http://www.scepsis.ru/library/id_848.html 〉
- 〈 Биография Булгакова (1921-1930) 〉 , 《Булгак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2010.05.10 〈 <http://www.bulgakov.ru/biography/1921-1930/> 〉
- 〈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 ,
《Единое Окно》 , 2009.12.30
〈 http://window.edu.ru/window/library?p_rid=38403 〉
- 〈 От нэпа к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циализму 〉 ,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тернет-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2010.05.10
〈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philos/ustryalov/ustryalov035.htm>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ЖЭНЧЖИ

Факультет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

Ту Юан Жон

**КУЛЬ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ПАД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Доктор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Профессор Оу Инь С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Магист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Тайвань, Тайбэй—Июнь 2010 г.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моти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ая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изучению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пад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з всех русских царей Пётр I был наибол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реформатором. Он прорубил окно в Европу, и ввёл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образ мысли в Россию. Годы правления Екатерины II нередко называют эпохой просвещенн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Екатерина в жизнь много реформ, основанных на идеях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Петров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Екатерины к идея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приводят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период, начавшийся правлением Екатерины II и до правления Николая I, появились пионеры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Н. Н. Новиков (1744-1818), 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 декабристы. Хотя движе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имело печальный финал, декабристы явились примером и оказали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юношей из дворянских семей. У них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к реформам, направленным на борьбу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и ведущим к отмене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Бесспорно, сила, ускорившая процес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рожден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ей. На эту тему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пример, Christopher Read,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1900-1912: The Vekhi Debate and it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1979) Vladimir Shlapentokh, *Soviet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Post-Stalin Era*. (1990) Boris Kagarlitsky (Trans. Pearce Brian.), *The Thinking Reed: Intellectuals and the Soviet State-1910 to the Present*. (1988) В эт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освещены только разрозне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раз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пох.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мало внимания уделено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оценке начиная с времен Петра I и до периода СССР.

В связи с вышеизложенным, весьма интересна попыт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пад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Цель и задач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Целью настоящ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выявлен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между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немец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дее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с целью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ешались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дачи:

1.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смысл и ценность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уществуют три поняти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интеллигент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Хотя их значения абсолютно разные, переводятся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они одинаково. Освещение различия понятий и глубокий смысл понят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ой задаче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 Изучи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18-ом веке,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ения классового состава обществ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оявления разночинцев, сыгравших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развитии культуры.

3. Определить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ных поколени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менялись и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ию Raymond Williams,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оциа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рус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грессом в развитии культуры.

4.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как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начала 20-ого века повлияли н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ю и их воззрения на общество и жизнь.

Подход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Подходом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ы является новый историзм. Новый историзм—это один из подходов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зданный Stephen Greenblatt (1943-) в 1986, сочетающий три компонента:

1.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ый (intertextual) анализ – анализ типологии текста и связь его с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м других текстов;
2. дискурсивный (discourse) анализ, который размы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жанра, реконструируя прошлое как единый, многоструйный поток текстов;
3.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который размы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жизни, связывая её с дискурсами и текстами,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она проходит и которые она продуцирует.

Новый историзм ищет в тексте не 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но воплощения ситуативных проблем автора и его времени. Это подход сравнивает идеи авторов с их жизнями, сравнивает чтение эпохи с его общество. Поэтому, примеры из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более прозрачны, чем примеры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ни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и людей и ситуаций своей эпохи, их точные или, напротив, намеренно искаженные портреты.

Только с помощью этого подхода, у нас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нять часть настоящей истории.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от подход и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ы являются: анал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нализ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текста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й метод.

1. Анал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обрать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ьш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теме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чтобы тщательно изучить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ричины и процесс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2. Анализ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текстов: через прямое чте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жно выявить в нём образы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3.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й метод: сравнить и сопоставить разные образы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чтобы показать различие и сходство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эволюцию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работы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впервые столь подробно знакомит тайваньцев с историей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этот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первый раз исследуетс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ультуры.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работы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работы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ак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ак и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х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Структура диссертации

- Первая глава Введение
- Первый раздел Мотив и задач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Второй раздел Подходы и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 Подх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вый историзм
 2.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1) Анал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 (2) Анализ текстов
- Третий раздел Раздел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Вторая глава XVIII ве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Первый раздел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18-ом веке
1. Петровские реформы
 - (1) Рефор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 (2) Рефор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культуры
 2. Рефор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культуры во время Екатерины II
- Второй раздел Значение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Третий раздел Пионеры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 В правление Екатерины II
 - (1) Н. Н. Новиков
 - (2) А. Н. Радищев
 2. От Александра I до Николая I: декабристы

- Третья глава XIX век: эволюц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Первый раздел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19-ом веке
1. Влия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2. Колыбель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ружок Станкевича
 3.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азночинцев
- Второй раздел Покол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 Пер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и западники
 - (1) Славянофилы
 - 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 Б. Типичны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 а. А. С. Хомяков
 - б. К. С. Аксаков
 - (2) Западники
 - 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 Б. Типичны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 а. А. И. Герцен
 - б. М. А. Бакунин
 - г.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2. Второе поколение: 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и нигилисты
 - (1) 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 (2) Нигилист
 3. Третье поколение: народники

Четвёртая глава XX век: пад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ервый раздел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начале 20-ого века

1.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школы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и совет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литики

(1)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школы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А. Реализм и новый реализм

Б. Символизм

В. Акмеизм

Г. Футуризм

Д. Другие течения

(2) Совет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олитики

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Б. Пролеткульт и “О политике партии в обла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2. Эмигран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ри волны

(1) Три волны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2)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торой раздел “Внероссийские эмигранты”

1. А. А. Ахматова

(1) *Реквием*

2. 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1) Социальное окружение создания роман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2) Тема о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 в романе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3. М. А. Булгаков

(1) *Роковые яйца*

(2) *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

(3)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ятая глава

Заключ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состоит введения (первая глава), трёх глав, заключения (пятая глава), и спи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 введении (в первой главе) об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мотив, цел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XVIII ве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начал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условия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т.е. реформы Петра I и Екатерины II в XVIII веке. Далее изучается значение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Массов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понят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началось с 1860-х, когда писатель П. Д. Боборыкин (1836-1921) стал употреблять его в журнальных статьях. Сам Боборыкин объявил, что заимствовал этот термин из немец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о по взглядам Боборыкин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 это чисто русский морально-э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В третьем разделе показаны пионеры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Н. Н. Новиков и А. Н. Радищев в правлении Екатерины II, и декабристы во времени Николая I.

В третьей главе «XIX век: эволюц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ак следует из названия глав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прогресс эволюц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эт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относятся люди разных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групп,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е к раз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ям, но имеющие общую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ую основу. В XIX век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три покол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пер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и западники; второе поколение: «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и нигилисты; третье поколение: народники. Хотя между славянофилами и западникам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серьезн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и конфликты, по мнению А. И. Герцена (1812-1870), они «как двуликий Янус, смотрели в разные стороны,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ердце билось одно»...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вывод, что «корень» у них одинаков. «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появился ранее чем нигилисты, и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ичин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ью. Нигилисты были популярны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в рома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1862) назвал «нигилистом» Базарова, отрицавшего взгляды «отцов».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нигилистами стали называть молоды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хотели измени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й в стра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отрицали право, проповедовали атеизм, а также не признавали нормы морали. За вторым поколением последовали народники, провозглашавшие идеи «сближения» с народом в поиске своих корней и своего места в мире. Идеология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основывалась на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минуя капитализм. Основы эт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были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ы на рубеже 40—50-х годов А. И. Герценом. В рамках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течения — умеренное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и радикальн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умеренного течения стремились к не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ам, чтобы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у и экономику.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радикального течения стремились к быстрому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му свержению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го режима и немедленному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идеалов социализма. Радикальные народники встали на путь терроризма, представив это как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актов самозащиты и мести за злодеяния цар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Одна из их партий «Земля и вол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сторонники террора создали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 В 1881 году народовольцами был убит 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

В четвёртой главе «XX век: пад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а рубеже 19-20 веков.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закончился абсолютизм, вскоре началась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илась до 1922 года, потом возник СССР... Межд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ей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разные мнения: за/против СССР или безразличие. Многие выбрали эмиграцию из России. Выделяют три волны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понятие «э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оставшаяся в СССР подверглас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 репрессиям и преследовалась безжалостно, особенно в 1930-е годы.

В XIX век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ей являлась силой, ускорившей процес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о временем и в связи с новой и слож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теряла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Анализ процесса паден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является целью данной главы.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в пятой главе)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подводятся итоги проведё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аётс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работы в будущем.